副 编

对若干历史事件、
人物及文献著作的评述

目 录

一、历史事件	(2183)
鸦片战争	(2183)
太平天国运动	(2184)
义和团运动	(2185)
辛亥革命	(2185)
五四运动	(2189)
国民党一大及大会宣言	(2196)
五卅运动	(2199)
大革命失败	(2199)
南昌起义	(2202)
八七会议	(2202)
中共六大	(2203)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2205)
九一八事变	(2206)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	(2206)
五次反“围剿”	(2207)
长征	(2209)
遵义会议	(2211)
一二九运动	(2214)
西安事变	(2218)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2221)
卢沟桥事变	(2221)

-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2221)
- 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 (2222)
-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2222)
- 国民党三次反共高潮 (2223)
- 中共七大 (2226)
- 重庆谈判 (2229)
- 北平和平解放 (2230)
- 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2231)
- 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 (2232)
- 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2234)
- 高岗、饶漱石事件 (2234)
- 炮击金门 (2236)
- 西藏平叛 (2238)
- 巴黎公社 (2242)
- 第一次世界大战 (2244)
- 十月革命 (2245)
- 第二次世界大战 (2250)
-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2251)
-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战场的开辟 (2254)
- 共产国际及其解散 (2255)
- 苏共二十大和批判斯大林问题 (2259)
- 苏伊士运河事件 (2262)
- 匈牙利事件 (2264)
- 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 (2265)
- 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及
会议宣言 (2265)

古巴革命	(2267)
反对新的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	(2269)
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	(2270)
二、人物	(2274)
纣王	(2274)
孔子	(2275)
墨子	(2279)
屈原	(2280)
孟轲、韩非、叔孙通	(2281)
秦始皇	(2281)
刘邦	(2282)
项羽	(2284)
曹操	(2284)
李世民（唐太宗）	(2285)
李隆基（唐明皇）	(2285)
王勃	(2285)
韩愈	(2286)
唐玄奘（唐僧）	(2287)
岳飞、文天祥	(2288)
李自成	(2288)
徐霞客	(2288)
林则徐	(2288)
洪秀全	(2289)
曾国藩	(2289)
梁启超	(2290)
康有为	(2290)
严复	(2291)

孙中山	(2291)
袁世凯	(2301)
章炳麟 (章太炎)	(2301)
宋庆龄	(2301)
鲁迅	(2302)
何香凝	(2310)
蒋介石	(2311)
汪精卫	(2317)
陈独秀	(2319)
李大钊	(2321)
萧楚女	(2322)
瞿秋白	(2322)
李立三	(2322)
王明	(2324)
张国焘	(2330)
王稼祥	(2332)
陈毅	(2334)
徐特立	(2335)
吴玉章	(2336)
刘志丹	(2336)
张学良	(2337)
冯玉祥	(2337)
邓宝珊	(2338)
傅作义	(2338)
邹韬奋	(2339)
闻一多	(2339)
李公朴	(2340)

章士钊	(2340)
蔡元培	(2341)
柳亚子	(2341)
黄炎培	(2342)
朱自清	(2342)
徐志摩	(2343)
胡适	(2343)
郭沫若	(2344)
黎锦熙、杨昌济	(2345)
陶行知	(2345)
萧军	(2345)
赫拉克利特	(2346)
苏格拉底	(2347)
德谟克里特	(2348)
柏拉图	(2348)
亚里士多德	(2349)
鸠摩罗什	(2349)
释迦牟尼	(2350)
克伦威尔	(2350)
康德	(2351)
黑格尔	(2351)
海克尔	(2351)
华盛顿	(2352)
马克思、恩格斯	(2352)
列宁	(2355)
斯大林	(2357)

普列汉诺夫	(2368)
季米特洛夫	(2369)
德波林	(2369)
高尔基	(2370)
伏罗希洛夫	(2371)
赫鲁晓夫	(2371)
杜勒斯	(2372)
尼赫鲁	(2373)
戴高乐	(2373)
纳赛尔	(2374)
尼克松	(2374)
蒙哥马利	(2374)
斯诺	(2375)
斯特朗	(2375)
杜波依斯	(2375)
柯棣华	(2376)
白求恩	(2376)
马丁·路德·金	(2377)
三、文献、著作	(2378)
望厦条约	(2378)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2378)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2379)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2379)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2381)
共同纲领	(2382)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2382)
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2385)

- 第一个五年计划 (2386)
-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2386)
- 屈原《天问》 (2389)
- 李斯《谏逐客书》 (2389)
- 司马迁《史记》 (2389)
- 贾谊《治安策》 (2389)
- 枚乘《七发》 (2390)
- 陈寿《三国志·张鲁传》 (2391)
- 裴松之注《三国志》 (2393)
- 范晔《后汉书》 (2393)
- 酈道元《水经注》 (2393)
- 慧能《六祖坛经》 (2394)
- 施耐庵《水浒传》 (2394)
- 吴承恩《西游记》 (2395)
- 笑笑生《金瓶梅》 (2395)
- 冯梦龙《东周列国志》 (2396)
- 蒲松龄《聊斋志异》 (2396)
- 曹雪芹《红楼梦》及《红楼梦》研究 (2397)
- 李宝嘉《官场现形记》 (2401)
- 邹容《革命军》 (2401)
- 鲁迅《阿Q正传》 (2401)
- 赫胥黎《天演论》 (2402)
-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2402)
- 马克思《资本论》 (2402)
- 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2403)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	(2404)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	(2405)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2405)
罗森塔尔、尤金主编《简明哲学辞典》	(2408)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	(2408)

一、历史事件

鸦片战争

自从一八四〇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6页

资本主义外国侵略中国，则差不多有了一百年。一百年来，中国的斗争，从鸦片战争反对英国侵略起，后来有太平天国的战争，有甲午战争，有戊戌维新，有义和团运动，有辛亥革命，有五四运动，有北伐战争，有红军战争，这些虽然情形各不相同，但都是为了反抗外敌，或改革现状的。但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才有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青年运动的方向》（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63—564页

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至现在的抗日战争，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32页

近代中国最著名的斗争，有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光绪二十年的甲午战争，后头又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以后接着是辛亥革命。革命是反对两个东西：一个叫做外国的压迫，一个叫做封建制度的压迫。中国人民对这两个东西总是不满意，总是要起来反抗。起来一次，被打下去，再起来一次，又被打下去，这样的历史差不多有八十年。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8页

太平天国运动

太平王洪秀全号召广西一班失业农民起来革命，大有社会革命的意义，孙总理也很佩服他。大家只知道打倒他的是清朝政府，而不知真正打倒他的主力军，却是地主阶级。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袖。曾国藩是练团练出身，团练即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武力，他们见洪秀全领导一班农民革命，于他们不利，遂出死力来打倒他。故太平天国之事，不是满汉的战争，实是农民和地主的阶级斗争。

《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5页

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9页

我们今天的公祭可以一直上溯到一八四一年平英团那些英

雄们，也祭奠他们。平英团的反英斗争，太平天国运动，都是英勇的斗争。太平天国有几十万军队、成百万的农民，打了十三年，最后南京城被清兵攻破的时候，一个也不投降，统统放起火烧死了，太平天国就这样结束的。他们失败了，但他们是不屈服的失败，什么人要想屈服他们，那是不行的。

《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演说》（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35—436页

义和团运动

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也是这样。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89页

辛亥革命

辛亥年的革命，虽然其本质应该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然因当时多数党员还没有看清此点，黄兴、章炳麟、宋教仁等一班右倾的领袖们只知道国内清朝贵族阶级是敌人，革命的口号变成简单的“排满”，党的组织和内容是极其简单，作战的队伍是极其孤弱。这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有组织的工农群众；当时国内还没有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国际的局面是几个强国霸占了全世界，只有压迫阶级反革命的联合，没有被压迫阶级革命的联合，只有资产阶级的国家，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因此中国当时的革命没有国际的援助。

《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九二五年冬），《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5页

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九二七年三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6页

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远的如辛亥革命，因为那时还没有无产阶级的自觉的参加，因为那时还没有共产党，所以流产了。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45页

很清楚的，中国现时社会的性质，既然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它就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改变这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第二步，使革命向前发展，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社会。中国现时的革命，是在走第一步。

这个第一步的准备阶段，还是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即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改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就开始了的。中经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直到今天的抗日战争，这样许多个别的阶段，费去了整整一百年工夫，从某一点上说来，都是实行这第一步，都是中国人民在不同的时间中和不同的程度上实行这第一步，实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为了完成第一个革命而斗争。而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了这个革命。这个革命，按其社会性质说来，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革命。这个

革命，现在还未完成，还须付与很大的气力，这是因为这个革命的敌人，直到现在，还是非常强大的缘故。孙中山先生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就是指的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66—667页

辛亥革命发生在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觉醒，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全世界无产阶级在巴黎公社失败以后，还没有实际革命行动，只是准备革命的时候；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还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的时候。……辛亥革命只是在政治上推翻了清朝皇帝，没有彻底。我们写历史时常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其实并不能说完全失败，辛亥革命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但后来失败了，没有巩固它的胜利，封建势力代替了革命，袁世凯代替了孙中山。那时无产阶级没有以一个觉悟的阶级走上政治舞台。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2—403页

辛亥革命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辛亥革命只推翻一个清朝政府，而没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11页

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对英国鸦片侵略的战争，反对英法联军侵略的战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太平天国战争，

反对法国侵略的战争，反对日本侵略的战争，反对八国联军侵略的战争，都失败了，于是再有反对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辛亥革命，这就是到辛亥为止的近代中国史。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13页

孙中山先生是个好人，但他领导的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了？其原因：一、没有分土地；二、不晓得镇压反革命；三、反帝不尖锐。

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的讲话要点（一九五二年八月四日）

有相当一部分朋友对我们讲“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觉得不妥，在感情上有些过不去。但从社会发展历史上说，辛亥革命确实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

《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44页

孙中山及其一派人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人类历史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一次。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还有过改良派。对改良派也应该估计有进步的一面。戊戌变法在当时受压迫，为什么？就是因为它有进步性，它受到顽固派的仇恨。孙中山比改良派又更进一步，他公开号召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和临时革命政府，并制定了一个《临时约法》。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45—346页

辛亥革命没有成功，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孙中山的领导集团犯了错误，有缺点。关于这一点，孙中山有过自我批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上曾经说，当时向袁世凯妥协是不对的。

《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
第6卷第346页

我国辛亥革命的时候，无产阶级的数量还很小，还没有自己的政党。那次革命是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无产阶级跟着资产阶级走。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没有其他阶级、其他政党站在他们的前面，来同他们争夺革命的领导权。那个时候，他们最有生气。他们所办的《民报》、《苏报》、《大江报》，表现得很有朝气，很活跃。辛亥革命以后，资产阶级的政党走向堕落。正如孙中山说的：“革命功成，革命党消”。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二）》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党的文献》1992年
第4期

五四运动

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那个时期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而在“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有数十万的学生。

这是五四运动比较辛亥革命进了一步的地方。

《五四运动》(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58页

五四运动所反对的是卖国政府,是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政府,是压迫人民的政府。这样的政府要不要反对呢?假使不要反对的话,那末,五四运动就是错的。这是很明白的,这样的政府一定要反对,卖国政府应该打倒。……五四运动正是做了反对卖国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运动。全中国的青年,应该这样去认识五四运动。

《青年运动的方向》(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61—562页

在二十年前的今天,由学生们参加的历史上叫做五四运动的大事件,在中国发生了,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运动。

《青年运动的方向》(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65页

五四运动之成为新文化运动是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所决定,他反过来又推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原是中国资本主义本身的要求。

《读艾思奇编〈哲学选辑〉一书的批注》(一九三九年五月以后),《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377页

五四运动为北伐战争作了准备。如果没有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是不可想像的。有些人以为学生运动没有力量,但是事实怎样呢?广大学生群众的五四运动,推动“六三”全国性的罢工、罢市、罢课的反帝和反卖国政府的斗争,发展成为全民族

的运动。五四运动以后，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掀起了五卅运动，发动了北伐战争，造成了第一次大革命。那末，很明显，没有五四运动，第一次大革命是不可能的。五四运动的的确确给第一次大革命准备了舆论，准备了人心，准备了思想，准备了干部。

《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51—252页

五四运动是反帝国主义的运动，又是反封建的运动。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五四运动所以具有这种性质，是在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已有进一步的发展，当时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眼见得俄、德、奥三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瓦解，英、法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受伤，而俄国无产阶级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德、奥（匈牙利）、意三国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因而发生了中国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

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当时以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文化革命的两大旗帜，立下了伟大的功劳。这个文化运动，当时还没有可能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它提出了“平民文学”口号，但是当时的所谓“平民”，实际上还只能限于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即所谓市民阶级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
第699—700页

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在那时，这个运动是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那时的统治阶级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学生，把孔夫子的一套当作宗教教条一样强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总之，那时统治阶级及其帮闲者们的文章和教育，不论它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条式的。这就是老八股、老教条。揭穿这种老八股、老教条的丑态给人民看，号召人民起来反对老八股、老教条，这就是五四运动时期的一个极大的功绩。五四运动还有和这相联系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大功绩；这个反对老八股、老教条的斗争，也是它的大功绩之一。但到后来就产生了洋八股、洋教条。我们党内的一些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人则发展这种洋八股、洋教条，成为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东西。这些就都是新八股、新教条。这种新八股、新教条，在我们许多同志的头脑中弄得根深蒂固，使我们今天要进行改造工作还要费很大的气力。这样看来，“五四”时期的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的、反对封建

主义的老八股、老教条的运动，后来被一些人发展到了它的反方面，产生了新八股、新教条。它们不是生动活泼的东西，而是死硬的东西了；不是前进的东西，而是后退的东西了；不是革命的东西，而是阻碍革命的东西了。这就是说，洋八股或党八股，是五四运动本来性质的反动。但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反对旧八股、旧教条，主张科学和民主，是很对的。但是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但在共产党内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发生偏向，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这样看来，党八股这种东西，一方面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或发展，并不是偶然的東西。我们懂得这一点是有好处的。如果“五四”时期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是革命的和必需的，那末，今天我们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也是革命的和必需的。如果“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中国就不会有自由独立的希望。这个工作，五四运动时期还不过是一个开端，要使全国人民完全脱离老八股和老教条主

义的统治，还须费很大的气力，还是今后革命改造路上的一个大工程。

《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31—832页

五四运动是发生在欧洲大战、十月革命之后，这时的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运动，已不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后备军，而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后备军了。五四运动是俄国十月革命的响应，所以比辛亥革命更深刻。……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之下发生的。十月革命对世界的觉醒，对中国的觉醒，影响是很大的。五四运动时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有了觉悟，五四运动发生在一九一九年，一九二一年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五四运动是广泛的统一战线，内部有左翼、右翼和中间势力。在“五四”以后一个月发生了六三运动，全国罢工、罢课、罢市。那时的罢工还是无产阶级自发的运动。我们应该把五四运动中工人的态度研究一下。那时罢工虽然没有共产党领导，但其中总有领头的人。在五四运动里面，起领导作用的是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学教授虽然不上街，但是他们在其中奔走呼号，做了许多事情。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国民党没有在五四运动中起领导作用，它是站在旁边的。

五四运动准备了大革命，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大革命。中国共产党是产生在“五四”之后，五四运动又是产生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

……

五四运动是有群众，还是没有群众？我认为五四运动是有广大的群众性的，比起大革命来自自然是差些。那时资产阶级、小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统一战线，还没有农民参加，只有广大的工人。到大革命，就有农民参加了。土地革命时，参加的农民就广泛多了，但是统一战线不够广。到抗战，农民参加得更广泛了，比大革命时广，比土地革命时也广，同时有了比过去更广大的统一战线。

五四运动是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统一战线，带着自发的性质。但是这种自发性和以前的不同，它多少有些觉醒，许多人赞成十月革命，赞成列宁的革命。孙中山曾说，列宁是革命的圣人，共产主义是三民主义的好朋友。他是作为同盟者来赞成共产主义的。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当时的人们有一个很大的觉醒。五四运动发展到共产党的成立，工人运动向前发展了，这才有后来的国共合作。所以不说明以前的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于共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也就不能说得清楚。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3—404页

中国从五四运动起，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是群众发动的，是群众的队伍在街上公开反对自己的敌人。开始只是觉悟的、先进的学生参加，发展到“六三”时，在上海已经不只是学生，而且有广大的工人、商界参加，后来，汉口、长沙，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都卷进这个潮流里去了。五四运动有中国最觉悟的分子参加，当时的觉悟分子有陈独秀、李大钊。在五四运动中有左翼、右翼，陈独秀、李大钊是代表左翼的。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共产党，但已经有少数人有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9—290页

国民党一大及大会宣言

中华革命党改成中国国民党时，又加入一批中产阶级的非革命派，此时而且有一部分代表买办阶级的分子混了进来，他们站在党的支配地位，孙先生及少数革命派领袖拿了仍不能革命。乃于去年一月毅然召集第一次党的全国大会，明白决定拥护工农阶级的利益，从工农阶级中扩张国民党的组织，并且容纳共产派分子入党。

《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九二五年冬），《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7页

我们共产党人承认“三民主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承认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和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基本上相同。但是这种三民主义是什么三民主义呢？这种三民主义不是任何别的三民主义，乃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我愿顽固派先生们，于其“限共”、“溶共”、“反共”等工作洋洋得意之余，也去翻阅一下这个宣言。原来孙中山先生在这个宣言中说道：“国民党之三民主义，其真释具如此。”就可知只有这种三民主义，才是真三民主义，其他都是伪三民主义。只有《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对于三民主义的解释才是“真释”，其他一切都是伪释。这大概不是共产党“造谣”吧，这篇宣言的通过，我和很多的国民党员都是亲眼看见的。

这篇宣言，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历史时代。在这以前，三民主义是旧范畴的三民主义，是旧的半殖民地资产阶级民主革

命的三民主义，是旧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89页

国民党不懂得组织国民党，致力于国民革命三十九年，就是不开代表大会。我们加入国民党以后，一九二四年才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由我们帮它办好，其中有一个鲍罗廷，当顾问，是苏联共产党员，有一个瞿秋白，是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员。孙中山这个人有个好处，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找我们。鲍罗廷说的话他都听。那时候叫做“以俄为师”，因为他革命三十九年老是失败。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3页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订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黄埔军校，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因而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扫荡了广东的反动势力，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举行了胜利的北伐战争，占领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打败了北洋军阀政府，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斗争。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35页

孙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

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这是孙先生的伟大的政治指示。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及其他一切民主分子，必须尊重这个指示而坚决地实行之，并同一切违背和反对这个指示的任何人们和任何集团作坚决的斗争，借以保护和发扬这个完全正确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原则。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1056—1057页

孙中山先生在一九二四年《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里所解释的三民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我党在现阶段的纲领即最低纲领里的若干基本原则，是互相一致的。应当指出，孙先生的这种三民主义，和我党在现阶段上的纲领，只是在若干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东西，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东西。我党的新民主主义纲领，比之孙先生的，当然要完备得多；特别是孙先生死后这二十年中中国革命的发展，使我党新民主主义的理论、纲领及其实践，有了一个极大的发展，今后还将有更大的发展。但是，孙先生的这种三民主义，按其基本性质说来，是一个和在此以前的旧三民主义相区别的新民主主义的纲领，当然这是“中国今日之必需”，当然“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对于中国共产党人，为本党的最低纲领而奋斗和为孙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即新三民主义而奋斗，在基本上（不是在一切方面）是一件事情，并不是两件事情。因此，不但在过去和现在已经证明，而且在将来还要证明：中国共产党人是革命三民主义的最忠诚最彻底的实现者。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1061页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亲自领导的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著名的宣言。这个宣言上说：“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除了谁领导谁这一个问题以外，当作一般的政治纲领来说，这里所说的民权主义，是和我们所说的人民民主主义或新民主主义相符合的。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7—1478页

五卅运动

五卅运动 空前的反帝。在此运动中提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内容：如收回租界，收回海关，收回司法权，撤退驻华海陆军等。民众因此认识什么是不平等条约。此运动因奉系军阀高压失败。但有一成绩：即上海、香港的工人起来了。

《两年来宣传工作的回顾》（一九二六年一月八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8—9页

大革命失败

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失败，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工农运动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而只依仗其暂时的同盟者国民党。其结果是帝国主义命令它的走狗豪绅买办阶级，伸出千百只手来，首先把蒋介石拉去，然后又把汪精卫拉去，使革命陷于失败。那时的革命统一战线没有中心支柱，没有坚强的革命的武装队伍，四面八

方都造起反来，共产党只得孤军作战，无力抵制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各个击破的策略。那时虽然有贺龙、叶挺一支军队，但还不是政治上坚强的军队，党又不善于领导它，终归失败了。这是缺乏革命中心力量招致革命失败的血的教训。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6—157页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战争，基本地说，是在国际无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影响和政治合作之下进行的。然而当着革命和战争的紧急关头，首先由于大资产阶级的叛变，同时也由于革命队伍中机会主义者的自动地放弃革命领导权，这次革命战争就失败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84页

这里要了解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经验。

那时，精神上没有准备，是失败的主要原因；现在，必须要有准备。

那时，不能再是民族战线，但我们也有太绝对的地方；现在，必须坚持长期的民族战线。

那时，是革命的整个失败，党的路线是退却然后进攻；现在，没有路线上的退却问题，现在是继续进攻中发生局部的暂时的战术上的保守或隐蔽随即准备进攻的问题（如果投降变为事实的话）。

那时，因为反动时期到来，党又没有准备，没有经验，以致队伍混乱，步骤错误（如盲动主义）；现在，则在沦陷区，并

准备在投降者占领地，应该作有秩序的退守（有的暂时的，有的长久的）或反攻，而在其他区域则继续进攻方针。

那时，新党员大批脱党或叛变；现在则在某种情况下也有可能发生这类事情，故须先有准备。历史经验——革命转变关头（哪怕是暂时的局部的转变）垃圾的跌落是不可避免的，也不是坏事；但须注意好好带领新党员，尤其是大批青年学生，他们将来是有用的。

那时，国内国际的情况是黑暗的，现在基本上是光明的。

那时，中央是被机会主义统治着，改造后的中央亦无经验；现在没有这种情形。

那时，尚没有造成大批干部骨干；现在已经造成了。

《反投降提纲》（一九三九年六月），《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18页

过去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特点，就是引导无产阶级适合资产阶级一群一党的私利，这也就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

《〈共产党人〉发刊词》（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08页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因为这时有了无产阶级的自觉的参加和领导，因为这时已经有了共产党，所以能在一个时期内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又因为大资产阶级后来背叛了它和无产阶级的联盟，背叛了共同的革命纲领，同时也由于那时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还没有丰富的革命经验，结果又遭到了失败。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45页

大革命为什么失败？除了客观原因之外，还有主观原因，就是蒋介石不让我们放手，汪精卫也不让我们放手，我们自己也就不敢放手。那时我们应该大大放手，但我们却不敢放手，所以失败了。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77页

北伐战争为什么没有成功，没有解决吃饭问题呢？是因为蒋介石背叛革命，投降帝国主义，成了压迫和剥削中国人的反革命首领。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11页

南昌起义

南昌起义及当时全国各地的许多起义，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决定的。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反动派宣布了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即决定率领人民反抗蒋介石反革命。八一南昌起义就是当时一连串革命起义的第一个起义。

《我们是能够克服困难的》（一九四九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14页

八七会议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名义上反对政治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实际上重新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两个会议的内容和历史作用

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两个会议都没有着重地涉及战争和战略的问题，这是当时党的工作重心还没有放在战争上面的反映。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48页

中共六大

六次大会指示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是十分对的：革命的现时阶段是民权主义，党的目前任务是争取群众而不是马上武装暴动。

《红军第四军前委给中央的信》（一九二九年四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54页

我们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所规定的十大政纲，不但代表了工农的利益，同时也代表了民族的利益。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58页

当着一九二七年冬天至一九二八年春天，中国游击战争发生不久，湖南江西两省边界区域——井冈山的同志们中有些人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这个疑问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指出来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因为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題，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一九二八年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把这个问题又作了一次答复。中国革命运动，从此就有了正确的理论基础。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88页

我认为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指出了革命的性质，提出了十大政纲，指出形势是两个高潮之间，反对速胜论，指出要争取群众。六大的基本精神是有群众观点的，不要群众的是李立三。在蒋冯阎战争爆发后，李立三便认为革命形势到了高潮，没有准备好群众条件也要暴动。

《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95页

应该指出，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是基本上正确的，因为它确定了现时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确定了当时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批判了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发布了十大纲领等，这些都是正确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亦有缺点，例如没有指出中国革命的极大的长期性和农村根据地在中国革命中的极大的重要性，以及还有其他若干缺点或错误。但无论如何，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我党历史上是起了进步作用的。

《学习和时局》（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
3卷第939页

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未解决根据地问题，而提出准备暴动，夺取大城市。这在六大到现在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但将在七大以后去实行，七大以后我们必须实行这条方针。

《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工作报告》（一九四四年五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41页

六大决议案有一些错误，但根本上是对的。它根据对于当

时形势的估计提出了中国革命的十大纲领，今天我们所做的基本上仍未超过这个纲领。第一条我们正在做，第二条也在做，但策略上可以考虑，还有第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条，今天我们基本上还是这十条。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一九四八年九月），《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39页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一九三一年一月的六届四中全会，在名义上反对政治上的“左”倾机会主义，在实际上重新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这两个会议的内容和历史作用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两个会议都没有着重地涉及战争和战略的问题，这是当时党的工作重心还没有放在战争上面的反映。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48页

过去有同志认为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非法的。现在看到洛甫在他的反省笔记中说到，对临时中央共产国际来电批准过，五中全会也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根据这一点应当说是合法的，但选举手续不完备。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应该报告有关的情况，他们没有报告是不好的。确定了上述问题后，就好检讨四中全会是不是政治路线的错误。四中全会得到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承认，这在形式上是合法的，但政治内容是不好的。

《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92页

四中全会是否根本错了？现在弄清楚了，四中全会在根本上是错误的。共产国际的问题为什么不提？故意不提的。共产国际现在不存在了，我们也不把责任推给共产国际。

《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3页

九一八事变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只是日本侵略的范围暂时还限于东北四省，就使人们觉得似乎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一定再前进的样子。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43页

自从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中国以后，中国又变成了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社会。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26页

中共六届五中全会

在苏维埃运动后期，五中全会的精神，提倡搞社会主义革命，否认革命发展不平衡，认为当时的斗争是两条道路的决战。这些都比立三路线的“左”倾在政治上表现得更完备。

《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2页

过去有同志认为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非法的。现在看到

洛甫在他的反省笔记中说到,对临时中央共产国际来电批准过,五中全会也经过共产国际的批准,根据这一点应当说是合法的,但选举手续不完备。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后应该报告有关的情况,他们没有报告是不好的。

《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92页

关于一九三一年上海临时中央及在其后由此临时中央召开的五中全会是否合法的问题。中央认为是合法的,但应指出其选举手续不完备,并以此作为历史教训。

《学习和时局》(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
3卷第939页

五次反“围剿”

丧失根据地的最显著的例子,是在反对第五次“围剿”中丧失了江西中央根据地。这里的错误是从右倾的观点产生的。领导者们畏敌如虎,处处设防,节节抵御,不敢举行本来有利的向敌人后方打去的进攻,也不敢大胆放手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结果丧失了整个根据地,使红军做了一万二千多公里的长征。然而这种错误,往往有一种“左”倾轻敌的错误为之先行。一九三二年进攻中心城市的军事冒险主义,正是后来在对付敌人第五次“围剿”中采取消极防御路线的根源。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198页

江西第五次反“围剿”,我军全然不讲退却,原因在于对局部形势和整个形势都不注意,实在是一种鲁莽灭裂的干法。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09—210页

由于干部没有经验，对于战略退却不相信，在第一次和第四次反“围剿”的初期，第五次反“围剿”的整期，在这个问题上都遭遇了很大的困难。第一次反“围剿”时，由于立三路线的影响，干部的意见，在没有被说服以前，不是退却而是进攻。第四次反“围剿”时，由于军事冒险主义的影响，干部的意见是反对准备。第五次反“围剿”时，干部的意见开头是继续军事冒险主义反对诱敌深入的观点，后来是变成了军事保守主义。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13页

军事平均主义，到一九三四年第五次反“围剿”时，发展到了极点。“六路分兵”，“全线抵御”，以为可以制敌，结果为敌所制，原因在于惧怕丧失土地。集中主力于一个方向，其他方向剩下了钳制力量，自然不免使土地受到损失。然而这是暂时的局部的损失，其代价是突击方向取得了胜利。突击方向胜利了，钳制方向的损失就可以恢复了。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都使我们遭受了土地的损失，特别是在敌人第三次“围剿”时江西红军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了，然而结果我们的土地不但都恢复了，而且还扩大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25—226页

统治着第五次反“围剿”时期的所谓“正规战争”的战略

方针，否认这种流动性，反对所谓“游击主义”。反对流动的同志们要装作一个大国家的统治者来办事，结果是得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大流动——二万五千华里的长征。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29页

对于第一、二、三、四次“围剿”，我们的方针都是歼灭战。每次歼灭的敌人对于全敌不过是一部分，然而“围剿”是打破了。第五次反“围剿”时，采取了相反的方针，实际上是帮助敌人达到了他们的目的。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237页

长征

差不多一年半以来，中国的三支主力红军都在作阵地的转移。从去年八月任弼时同志等率领第六军团向贺龙同志的地方开始转移起，接着就是十月开始的我们的转移。今年三月，川陕边区的红军也开始转移。这三支红军，都放弃了原有阵地，转移到新地区去。这个大转移，使得旧区域变为游击区。在转移中，红军本身又有很大的削弱。如果我们拿着整个局面中的这一方面来看，敌人是得到了暂时的部分的胜利，我们是遭遇了暂时的部分的失败。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对的，因为这是事实。但是有人说（例如张国焘）：中央红军失败了。这话对不对呢？不对。因为这不是事实。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一个虾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说：

“天的某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我们说，红军在一个方面（保持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在另一个方面（完成长征计划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敌人在一个方面（占领我军原有阵地的方面）说来是胜利了，在另一个方面（实现“围剿”“追剿”计划的方面）说来是失败了。这样说才是恰当的，因为我们完成了长征。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

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49—150页

红军经过了万里长征，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吴起镇。当时敌人还在进攻我们，那年的十一月下旬，在富县我们还打了三个胜仗。在祝捷声中，在十二月十日，一听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我们心里好不欢喜！红军同志完成了这么伟大的长征，学生同志在北平发动了这样伟大的救亡运动，两者都是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而斗争，其直接意义都是推动抗日战争。

《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51页

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不简单的，假定我们这里在地球上对钻一个洞，从美国钻出来，恰好是一万二千五百公里多一点。长征结束时，我们的军队没有剩下多少。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打我们，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政治上军事上都犯了错误，才被迫来了个大搬家。到了遵义，进行了自我批评，才纠正了错误。

《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56—357页

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纠正了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中所犯的“左”倾机会主义性质的严重的原则错误，团结了党和红军，使得党中央和红军主力胜利地完成了长征，转到了抗日的前进阵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由于巴西会议和延安会议

(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是从巴西会议开始而在延安会议完成的)反对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起,全党更加团结起来,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斗争。这两种机会主义错误都是在国内革命战争中产生的,它们的特点是在战争中的错误。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0页

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则主要地是反对战争中的机会主义,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这是战争环境的反映。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48页

由此看来,国内战争和抗日战争两个过程和四个战略时期之间,共存在着三个战略的转变。第一个,国内游击战争和国内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二个,国内正规战争和抗日游击战争之间的转变。第三个,抗日游击战争和抗日正规战争之间的转变。

三个转变中,第一个转变曾经遇到很大的困难。这里有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要反对沉溺于游击性而不愿向正规性转变的右的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的倾向,这是由于干部对已经变化的敌情和任务估计不足而发生的。这一方面,拿中央红色区域来说,曾经作了艰苦的教育工作,才使之逐渐地转变过来。又一方面,则要反对过分地重视正规化的“左”的集中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倾向,这是由于一部分领导干部对敌情和任务估计过分,并且不看实情,机械地搬用外国经验而发生的。这一方面,在中央红色区域,曾经在三年的长时间内(遵义会议以前),付

出了极大的牺牲，然后才从血的教训中纠正过来。这种纠正是遵义会议的成绩。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50页

只在到了遵义会议（一九三五年一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党才彻底地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奠定了后来战胜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共产党人〉发刊词》（一九三九年十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11—612页

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

《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73页

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就是积极拥护四中全会的人，也就是在第三次“左”倾路线中犯过路线错误的人，出来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他们和其他同志一道反对这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个账挂在我身上，我要声明一下，没有这些同志以及其他很多同志——反“左”倾路线的一切同志，包括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中的很重要的某些同志，没有他们的赞助，遵义会议的成功是不可能的。

《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59页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会。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好多别的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和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

《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24—425页

真正懂得独立自主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会议批判了教条主义。教条主义者说苏联一切都对，不把苏联的经验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一九六三年九月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39页

一二九运动

第一，一二九运动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同志们都知道，刚才李昌同志也讲过。然而，我们应该进一步了解：它是在什么政治环境下产生的呢？它有什么政治意义呢？它给中国政治上一个什么样的影响呢？……

红军经过了万里长征，在一九三五年十月到达陕北吴起镇。当时敌人还在进攻我们，那年的十一月下旬，在富县我们还打了三个胜仗。在祝捷声中，在十二月十日，一听到北平一二九

运动的消息，我们心里好不欢喜！红军同志完成了这么伟大的长征，学生同志在北平发动了这样伟大的救亡运动，两者都是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而斗争，其直接意义都是推动抗日战争。所以，一二九运动在历史上讲，是抗日战争准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有些人说，一二九运动不如五四运动，就是说，前者不及后者的政治意义伟大。这对不对呢？不对。我们认为这两者的意义是同样伟大的。

……

至于一二九运动，它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

我们看看，一二九运动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发生的。一方面，它是在共产党被认为绝对无权、绝对不合法的国民党统治区，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剿共”战争时期，在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双管齐下的情况之下发生的。在过去的所谓“剿共”战争中，共产党和红军处境的艰难是无须多说的。后来红军长征了，一走走了二万五千里，人家在后面也“欢送”了二万五千里，并且在前面还有“欢迎”的，在天上加上“送礼”的，这礼物名曰炸弹。尽管“欢送”者一程一程地相送，“欢迎”者一站一站地相迎，红军仍然到了陕北。但敌人还是用子弹作礼物，前后迎送。这就是说，红军到了陕北，还是处在被“围剿”的环境中。这就是军事“围剿”的情形。文化“围剿”怎么样呢？敌人的“碉堡”是建筑在学校里、书报杂志上以及社会文教团体里，也大有“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之势。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鲁迅先生的杂感，就可以知道。他的抨击时弊的战斗的杂文，就是反对文化“围剿”，反对压迫青年思想的。另

一方面，日本帝国主义已占领了东北，酝酿着“华北特殊化”，并积极准备灭亡全中国。因此，四万万五千万人民，大家都要干，要打日本帝国主义。可是，有一些人偏偏不赞成。不过，他们也是要打的，打的是谁呢？是共产党，是青年学生，是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全国老百姓对他们说：你们打的方向弄错了，我们坚决反对。这就是一二九运动所处环境的另一方面。一二九运动以后，事情就逐渐好办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政府只打共产党不打日本帝国主义的办行不通了，不得不放弃“剿共”政策而走准备抗战的路，这就开了国民党的三中全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在事实上宣告成立。对于这些，一二九运动的功劳都是很伟大的。

这里，有一点应该特别注意，就是红军长征和一二九运动的密切关系。一二九运动发生在红军北上抗日到达了陕北之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帮助了一二九运动，同时，一二九运动也帮助了红军，这两件事的结合，就帮助了全民抗战的发动，帮助了中华民族，增进了全民族的利益。

中共中央的八一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推动了全国团结抗战潮流的发展。一二九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红军走到陕北打了胜仗，而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加紧侵略中国的情况之下发生的。广大青年学生起来反对当局对他们的压迫，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个运动的发生，轰动了全国。它配合着红军的北上抗日行动，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使抗日运动成为全国的运动。所以，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要拿五四运动和北伐战争的关系相比，那末很明显，一二九运动和抗日战争的关系更密切，两者相隔的时间更短，因为一二九运

动有红军长征的胜利互相配合。总之，一二九运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在一二九运动以后，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反帝国主义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第二，反对黑暗势力压迫青年学生和压迫知识分子，这件事情现在也是更好办了；而黑暗势力压迫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这件事情却是更难办了。一二九运动就证明了这一点。黑暗势力压迫进步思想，压迫到最后，黑暗势力总是失败的。一二九运动前，他们进行了八年多的反共教育，是有计划地进行的。学校里的一切有政治倾向的课程，首先都是以反对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为原则；对教员中被认为是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者的人都要排斥和迫害。从一九二七年下半年起，他们用这种教育训练了八年多，不幸得很，却训练出一个“一二九”来。这在国民党内那些反共的先生们看来，当然是一件天大的憾事。有些人说，“一二九”是学生造反。这一点学生们是承认的，的确是造反。但是，造谁的反呢？是造压迫学生者的反，造思想“围剿”者的反，造宣传假三民主义的人们的反。他们造反的目的就是要实行真三民主义，也就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民主义。他们为铲除一切实行真三民主义的障碍而造反。这样的反要不要造呢？要造的，要造的，第三个还是要造的。

……

第三，一二九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是怎样呢？毫无疑问，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首先是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给了青年学生一个明确的政治方针；其次是红军到了陕北，配合了北方的救亡运动；再次是共产党北方局和上海等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这样，才使一二九运动发生，并使之在全国各阶层开展起来，形成了全民族救亡运动的巨大政治力量。青年学生好比

是一二九运动的柴火，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差用火一点。点火的人是谁呢？就是共产党。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同样，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只有知识分子跟工人、农民正确地结合，才会有无攻不克、无坚不摧的力量。因此，知识分子要同共产党结合，要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要同革命武装队伍结合，要同八路军新四军结合。

《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51—256页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群众，在我们党领导之下，发动了英勇的爱国运动，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把这种爱国运动推广到了全国各大城市。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36—1037页

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惊传蒋氏被幽，事出意外。然此实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张杨均贵党中央委员，且属“剿共”军领袖，然亦坚请停止“剿共”，一致抗日；观其宣布之八项主张，实为全国人民之所言，厉行不暇，何可厚非。今日之西安事变，不过继福建事变、两广事变之后，鼎足而三耳。三者皆贵党中抗日救国之贤豪，不满蒋氏降日卖国

之所为而蹶然掲出正义之旗耳。若漫不加察，一意孤行，行见同类之事变，将遍发于国中，祸患之纷乘，欲收拾而无术。

《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68页

西安事变的发动，确系受下列数种势力的影响：（一）张杨部队及西北革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二）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的高涨；（三）国民党左派势力的发展；（四）各省实力派的抗日救国的要求；（五）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六）世界和平阵线的发展。这些都是无可讳言的事实。

《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46页

西安事变爆发，国家处于重大危险面前，其危险性就在日本必然地乘机进攻，其得和平解决，实是如天之福。

《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81页

自从日本侵略开始以来，我们就是愿意停止内战的，因为只有国内和平，才能对日抗战。四年前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军队订立抗日协定的宣言，前年的八一宣言，去年的致国民党书等等，无不是表示我们诚恳地愿意同国民党建立新的统一战线。西安事变中，国内一部分人极力挑拨内战，内战危险是很严重的。如果没有十二月二十五日张汉卿送蒋介石先生回京一举，如果不依照蒋介石先生处置西安事变的善后办法，则和平解决就不可能。兵连祸结，不知要弄到何种地步，必然给日本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中国也许因此亡国，至少也要受到极大损害。当西安事变中，日本军阀方面，宁、沪、平、津一部分中国人方

面，都说西安事变是共产党的阴谋。这种说法完全不合事实。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与国内改革问题上，因政见不同而发生的，完全是一件突发的事变，我们事前全不知道。

《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88页

伟大西安谈判顺利地和平解决，成为开始在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也走到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举国抗战开始一个过渡的时期。

同张闻天关于国内和平实现后的形势及党与红军的任务给任弼时的电报（一九三七年三月六日），《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上卷第659—660页

直至西安事变发生，在一九三六年年底，中国共产党的全权代表才同国民党的主要负责人取得了在当时政治上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即是两党停止内战，并实现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

《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62—363页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国民党政府只打共产党不打日本帝国主义的办行不通了，不得不放弃“剿共”政策而走准备抗战的路，这就开了国民党的三中全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就在事实上宣告成立。

《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53页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国民党内部主张抗日的两派爱

国分子——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合起来，勇敢地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对日妥协和对内屠杀的反动政策，举行了有名的西安事变。同时，国民党内的其他爱国分子，也不满意国民党当局的当时政策。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当局被迫地放弃了内战政策，承认了人民的要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37页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

在卢沟桥事变的前夜，即一九三七年五月，我们党召集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代表会议，这个会议批准了党中央自一九三五年以来的新的政治路线。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37页

卢沟桥事变

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卢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

《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52页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国民党中国民革命军中的抗日情绪在日益增涨，大多数的领袖与党员是能够和我们及人民一道从事于抗日救亡的事业

的。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诚然至今还不满人意，但是业已开始了它的转变，三中全会的决议，可以看作这种开始转变的证据。

《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90—491页

三中全会在法律上确认伟大西安谈判顺利的和平解决，成为开始在全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与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新阶段，也走到全国统一战线的实际建立，举国抗战开始的一个过渡的时期。

《国内和平实现后的形势和任务》(一九三七年三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95页

中共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

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

《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25页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六中全会是一个重要的关键，没有六中全会，今天的局面不会有这样大。当时如果不克服那么一种倾向，即对放手动员

群众这样一条路线不赞成、有所畏惧、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束缚起来的倾向，如果不赞成放手动员群众，发展自己，发展八路军、新四军，扩大解放区，不被国民党反动派的政策所束缚同时又不脱离统一战线这个原则，那末，今天的局面就不一样。参加六中全会的是一些什么人呢？还不就是这么一批人。没有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对这条路线的赞助和拥护，六中全会就不可能纠正右倾投降倾向。但是，在六中全会的文件上，在六中全会的记录上，看不出我们尖锐地批评了什么东西，因为在那个时候，不可能也不应该提出批评，而是从正面肯定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在实际上解决了问题。

《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方针》（一九四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59—360页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会。

《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24页

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在苏联养病后回国带回来的，由王稼祥同志传达的。

《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25页

国民党三次反共高潮

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

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自日寇和德意订立三国同盟之后，为急谋解决中日战争，遂积极努力，策动中国内部的变化。其目的，在借中国人的手，镇压中国的抗日运动，巩固日本南进的后方，以便放手南进，配合希特勒进攻英国的行动。中国亲日派首要分子，早已潜伏在国民党党政军各机关中，为数颇多，日夕煽诱。至去年年底，其全部计划乃准备完成。袭击皖南新四军部队和发布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不过是此种计划表面化的开端。最重大的事变，将在今后逐步演出。

《为皖南事变发表的命令和谈话》(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71—772页

(一) 从何白《皓电》(去年十月十九日)开始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至皖南事变和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达到了最高峰；而三月六日蒋介石的反共演说和参政会的反共决议，则是此次反共高潮的退兵时的一战。时局可能从此暂时走向某一程度的缓和。……

(二) 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

《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的时局》(一九四一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78页

自武汉失守以来，国民党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在这三次反共高潮中都有国民党军队袭击共产党军队的事实。第一次是在一九三九年冬季至一九四〇年春季，那时国民党军队袭占了陕甘宁边区八路军驻防的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城，并且使用了飞机。在华北，派遣朱怀冰袭击太行区域的八路军，而八路军仅仅为自卫而作战。第二次是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先

是何应钦白崇禧以《皓电》（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九日）送达朱、彭、叶、项，强迫命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限期一个月一律开赴黄河以北。我们答应将皖南部队北移，其他部队则事实上无法移动，但仍答应在抗战胜利后移向指定的地点。不料正当皖南部队九千余人于一月四日遵命移动之时，蒋先生早已下了“一网打尽”的命令。自六日起十四日止，所有皖南国民党军队果然将该部新四军实行“一网打尽”，蒋先生并于十七日下令解散新四军全军，审判叶挺。自此以后，华中华北一切有国民党军队存在的抗日根据地内，所有那里的八路军新四军无不遭受国民党军队的袭击，而八路军新四军则只是自卫。第三次，是从本年三月至现在。除国民党军队在华中华北继续袭击八路军新四军外，蒋先生又发表了反共反人民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调动了大量河防部队准备闪击边区；发动了全国各地所谓“民众团体”要求解散共产党；动员了在国民参政会内占大多数的国民党员，接受何应钦污蔑八路军的军事报告，通过反共决议案，把一个表示团结抗日的国民参政会，变成了制造反共舆论准备国内战争的国民党御用机关，以至共产党参政员董必武同志不得不声明退席，以示抗议。总此三次反共高潮，都是国民党有计划有准备地发动的。

《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一九四三年十月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922—923页

六中全会来了一个纠正，许多同志了解了这个问题。六中全会以后，还有人觉得国民党很好，很漂亮，后来出了一个《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又出了一个第一次反共高潮，出了这两件事情以后，国民党“跳加官”戴的一副假面具脱掉了，他那个不好看的样子就露出来了，这时我们一些同志就逐渐觉悟了。

以后又有第二次反共高潮即皖南事变，第三次反共高潮，一九四三年七月要解散共产党，取消边区。到这个时候，我们党内就大体上肃清了对国民党的幻想。消除了认为国民党不要改造，中国就可以有救，日本就可以被赶出去的思想；改变了认为主要的不是依靠我们自己，发展我们的力量，发展解放区，使八路军、新四军不受限制的思想；树立了要放手动员人民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的领导下打倒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思想，在广大的人民中间，在同志们的脑子中间，展开了一幅新图画。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13页

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这个党过去打过整整十年的反革命内战。在抗日战争中间，在一九四〇年、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三年，它发动过三次大规模的反共高潮，每一次都准备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内战，仅仅由于我党的正确政策和全国人民的反对，才没有实现。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23—1124页

中共七大

我们这个大会有什么重要意义呢？我们应该讲，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出来。我们这个大会要打

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

《两个中国之命运》（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025页

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大会。我们做了三件事：第一，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第二，通过了新的党章。第三，选举了党的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今后的任务就是领导全党实现党的路线。我们开了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代表们对三个报告发表了很好的意见。许多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从团结的目标出发，经过自我批评，达到了团结。这次大会是团结的模范，是自我批评的模范，又是党内民主的模范。

《愚公移山》（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101页

现在中国正在开着两个大会，一个是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一个是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两个大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这两条路线在互相斗争着。我们坚决相信，中国人民将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的路线的领导之下，得到完全的胜利，而国民党的反革命路线必然要失败。

《愚公移山》（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1103页

这一次我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套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路线、纲领、政策。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少数个人的头脑里想出来的和发明的，而是亿万中国人民在他们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几十年奋斗的结果，取得了经验，才形成我们现在七大的决议案和文件。

《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演说》（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31—432页

七大把七大以前所存在的问题都讲了，没有那一次的总结，就不能有日本投降后的大进步。我们党现在与抗日时期不同了。那时，在一九四〇年以前，就别扭得很，在军事上，在政策上，例如群众运动、减租减息，许多地方都不一致，对党的历史上前两个时期都没有总结。七大作了总结，这才有了抗战胜利后这三年解放战争的胜利。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一九四八年九月），《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141页

我们这次大会跟七大有相同的性质。那一次，为了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我们开了一个团结的大会。那一次对政治问题的解决、对党内历史问题的解决，那一次的选举，达到了团结全党、使革命在全国胜利的目的。

《关于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问题》（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00页

在七大召开以前，作出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七大成为团结的大会，实现了全党思想的统一。

《总结经验，教育干部》（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75页

重庆谈判

这一次，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谈了四十三天。谈判的结果，已经在报上公布了。现在两党的代表，还在继续谈判。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这是达成了协议的。还有没有达成协议的。解放区的问题没有解决，军队的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

《关于重庆谈判》（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56页

这次我到重庆，见了蒋介石，我们的代表和他们的代表谈了四十多天，谈出了一点东西。有两条，第一条中国要和平，第二条中国要民主，我们提出来，他们没有理由反对，只好赞成，在双十节签订了协定。但同时他们又准备了很多军队进攻解放区，共有八十万，包围陕甘宁边区的还不算，要算进去就有一百万以上。已经打了好几仗，头几仗他们都没有争到面子。仗还要打下去，如果我们打赢了，可能会得到和平，那时候我们派代表同他说：“蒋委员长，我们从前谈判过，我们还是和平吧！”我们是不要打的，那时候就可能和平了。如果是他们打赢了，我们解放区就要变成黑暗的地方，……

《在抗大七分校的讲话》（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47—48页

双十协定没有解决解放区问题，因为他们不愿承认解放区。几个月后，我们还要要求他们承认解放区，不承认是不行的，这是中国的大势。这就是共产党、八路军的任务，解放区人民的任务。

《在抗大七分校的讲话》（一九四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48—49页

北平和平解放

用谈判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使人民少受痛苦，当然是比较好的和有利于人民解放事业的。最近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就是一个实例。

《中共发言人就和平谈判问题发表谈话》（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44页

战败了，一切希望都没有了，比较好的一条出路，是军队离城改编，让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和平地接收城防和市政，这是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为什么天津不肯这样做呢？难道天津的“工业商业基础与文物古迹”不应当保全吗？难道天津的“国家元气”应当受损伤吗？为什么一月二十二日应当“促成全国彻底和平之早日实现”，而在一月十三日就不应当，而令天津的和平解决不能实现呢？基本的原因是傅作义将军还想打一打。天津打败了，二十九个钟头内十几万人解除武装，陈长捷、林伟俦、杜建时等一齐被俘，北平孤立了，毫无希望了，决心走第二条路，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可能性从此产生。……和平地解决北平问题的基本原因是人民解放军的强大与胜利，难道还不明显吗？

北平人民，包括劳动人民、资产阶级及绅士们在内，一齐渴望和平解决，又是一个原因。……

北平和平解决的又一个原因，是近二十万的国民党军队除少数几个死硬分子外，从兵士们到将军们，一概不愿打了。天津失守后的傅作义将军代表了这种情绪，下了出城改编的决心。

《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49—251页

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

此次人民解放战争之所以胜利，是由于全国人民不畏强御，团结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致奋起，相与协力，从而使人民解放军获得各方面的援助，使人民的敌人完全陷于孤立，胜负之数，因以判明。……欲求人民解放斗争获得最后胜利，必须全国一切民主力量同德同心，再接再厉，为真正民主的和平而奋斗。

《复李济深等五十六人电》(一九四九年二月二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53页

全国人民拥护自己的人民解放军，取得了战争的胜利。这一次伟大的人民解放战争，从一九四六年七月开始，到现在，业已三年了。这一次战争是由国民党反动派在获得外国帝国主义的援助之下发动的。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撕毁了一九四六年一月的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发动了这一次反人民的国内战争。可是，仅仅三年时间，即已被英勇的人民解放军所打败。不久以前，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和平阴谋被揭穿以后，人民解放军即已奋勇前进，横渡长江。国民党反动派的都城南

京，已被夺取。上海、杭州、南昌、武汉、西安，已被解放。现在，人民解放军的各路野战军，正在向南方和西北各省，举行着自有中国历史以来未曾有过的大进军。三个年头中，人民解放军共已消灭反动的国民党军五百五十九万人。截至现时为止，残余的国民党军，包括它的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和后方军事机关军事学校等在内，只有一百五十万人左右了。肃清这一部分残余敌军，还需要一些时间，但已为期不远了。

这是全中国人民的胜利，也是全世界人民的胜利。整个世界，除了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对于中国人民的这个伟大的胜利，没有不欢欣鼓舞的。中国人民反对自己的敌人的斗争和世界人民反对自己的敌人的斗争，其意义是同一的。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一齐看见了这样的事实：帝国主义者指挥中国反动派用反革命战争残酷地反对中国人民，中国人民用革命战争胜利地打倒了反动派。

《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
《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64—1465页

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这是值得庆祝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胜利，因为这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胜利。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80页

全国政协一届一次会议

我们的会议之所以称为政治协商会议，是因为三年以前我们曾和蒋介石国民党一道开过一次政治协商会议。那次会议的

结果是被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破坏了，但是已在人民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次会议证明，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一道，是不能解决任何有利于人民的任务的。即使勉强地做了决议也是无益的，一待时机成熟他们就要撕毁一切决议，并以残酷的战争反对人民。那次会议的惟一收获是给了人民以深刻的教育，使人民懂得：和帝国主义的走狗蒋介石国民党及其帮凶们决无妥协的余地，或者是推翻这些敌人，或者是被这些敌人所屠杀和压迫，二者必居其一，其他的道路是没有的。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2—343页

现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在完全新的基础之上召开的，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自己的议程中将要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法，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组织法，制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选举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国委员会，选举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国徽，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的所在地以及采取和世界大多数国家一样的年号。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3页

我们的会议包括六百多位代表，代表着全中国所有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各民族和国外华侨。这

就指明，我们的会议是一个全国人民大团结的会议。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2页

在人民领袖毛泽东主席领导之下，我们的会议齐心协力，按照新民主主义的原则，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制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于北京，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采用了义勇军进行曲为现时的国歌，决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世界公元，选举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选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中国人民大团结万岁》（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347—348页

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我们这次会议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次会议是标志着我国人民从一九四九年建国以来的新胜利和新发展的里程碑，这次会议所制定的宪法将大大地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

《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49—350页

高岗、饶漱石事件

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象，它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

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全党在中央委员会团结一致的领导下，已经把这个反党联盟彻底地粉碎了，我们的党因此更加团结起来和巩固起来了。这是我们在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中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对于我们的党说来，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为鉴戒，务必使党内不要重复出现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他们的这种活动完全是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常常采取的那一类丑恶的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上说过：“共产党人认为隐秘自己的观点与意图是可耻的事。”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91页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一九五三年，我们党内又出现了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这个反党联盟代表国内外的反动势力，而以危害革命事业为目的。如果不是党中央发觉得早，及时地击破了这个反党联盟的话，党和革命事业的损失将会是不堪设想的。

《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六年四月二日、四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5页

炮击金门

金门打炮，这是真打，但是基本上还是文打。我们没有跟任何外国人开战。美国人要我们停火，每天都要我们停火。我们没有跟你打仗嘛！为什么停火？我们中国就没有跟你美国人开过战，就没有打枪，我们只是跟我们的蒋委员长、蒋总统打。

《杜勒斯是世界上最好的反面教员》（一九五八年十月二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55页

金门战斗，属于惩罚性质。你们的领导者们过去长时期间太猖狂了，命令飞机向大陆乱钻，远及云、贵、川、康、青海，发传单，丢特务，炸福州，扰江浙。是可忍，孰不可忍？因此打一些炮，引起你们注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告台湾同胞书》（一九五八年十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20页

接着就是金门事件。我们不想叫美国休息，在联合国通过美国军队撤出黎巴嫩决议的第二天，我们就向金门岛开炮，闹得全世界摸不到我们的底。杜勒斯也忙得很，从东太平洋调动兵力，兵力不够，又从地中海调。杜勒斯自己讲，这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一次海、空军的集中，美国把它仅有的十二艘航空母舰中的六艘开来了。

《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一九五九年三月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9—20页

去年打金门，那里没有美国军队，只有美国一个工作组，十几个人。这个地方和美国没有条约关系，而台湾却和美国有条

约关系。我们打金门是内战问题。杜勒斯的方针是叫我们和蒋介石都不打。我们说，你们管不着，这是我们中国的地方，我们打不打是我们的事，你们不要多管；我们和你们美国只在一点上有关系，就是要求你们从台湾撤军。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在日内瓦、华沙同美国谈判。美国要签订一个声明，要蒋介石不打我们，要我们也不打蒋介石。我们说不行，金、马、台、澎问题是我们的内政，你们管不着，惟一的问题就是请你们搬家。

看来我们和美国还得谈下去。它不赞成我们，我们也不赞成它，谈多久我们不知道。已经谈了三年半，恐怕还会谈十年，这是世界上最长的谈判。你们不要怕我们会打台湾。我们打金、马是为了帮助蒋介石，因为美国想把金、马让我们，自己占据台湾。我们放弃金、马，都给蒋介石。蒋介石一困难，我们就打金、马，美国就可以让蒋介石继续做总统。

美国有“战争边缘政策”，主要是为台湾问题而想出来的。去年我们也采取“边缘政策”。我们打金、马和蒋介石的增援船只，蒋介石就请美国帮助。美国人来了，但只在十二海里以外。我们光打蒋介石的船，不打美国船。美国船升起国旗，叫我们不要打它。美国一炮也没有打我们，我们也没有打它。所以大家都在战争边缘上。

《关于西藏问题和台湾问题》（一九五九年五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63页

我们历来都讲，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中国一定要解放台湾，解放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用和平的方法，一个是用战争的方法。万隆会议时，周恩来总理就声明过，愿意同美国坐下来谈判。后来就谈了，一气谈了四年，先在日内瓦，后到华沙；先是一个星期一次，后来是两个星期一次、一个月一次，现

在是两个月一次。双方都不想中断谈判，美国曾经中断过一个时期，后来我们去了一封信，说不谈不好，并且提出了谈判时间。他们说，限定时间，他们不能遵守，但是谈判可以恢复。我们说谈判可以拖一年，后来金门一打炮，谈判就恢复了。谈判地点，根据美国的意见迁到了华沙。在谈判中，我们只是向他们提出一点，就是要他们从台湾撤军，撤军就没事了嘛。剩下的就是我们同蒋介石的事了，我们可以同蒋介石公开谈判。可是，美国不干，他们怕蒋介石同我们谈判。我们在金门打了炮，实际上并不是战争。我们并不想一下子把台湾等地拿下来，可以把它们放在蒋介石的手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没有关系。金门、马祖可以不拿下来，并不想为此而打仗。

《关于台湾问题》（一九五九年五月、十月），《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80—381页

西藏平叛

我们希望达赖回来，还建议这次选举不仅选班禅，而且要选达赖。他是个年轻人，现在还只有二十五岁。假如他活到八十五岁，从现在算起还有六十年，那个时候二十一世纪了，世界会怎么样呀？要变的。那个时候，我相信他会回来的。他五十九年不回来，第六十年他有可能回来。那时候世界都变了。这里是他的父母之邦，生于斯，长于斯，现在到外国，仰人鼻息，几根枪都缴了。我们采取这个态度比较主动，不做绝了。

总理的报告里头要讲希望达赖回国。如果他愿意回国，能够摆脱那些反动分子，我们希望他回国。但是，事实上看来他现在难于回国。他脱离不了那一堆人。同时，他本人那个情绪，上一次到印度他就不想回来的，而班禅是要回来的。那时，总

理劝解，可能还有尼赫鲁劝解，与其不回不如回。那个时候就跟他这么讲：你到印度有什么作用？不过是当一个寓公，就在那里吃饭，脱离群众，脱离祖国的土地和人民。现在，还看不见他有改革的决心。说他要改革，站在人民这方面，站在劳动人民这方面，看来不是的。他那个世界观是不是能改变？六十年以后也许能改，也许不要六十年。而现在看来，一下子要他回来也难。他如果是想回来，明天回来都可以，但是他得进行改革，得平息叛乱，就是要完全站在我们这方面来。看来，他事实上一下子也很难。但是，我们文章不做绝了。

《关于西藏平叛》（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
第45页

西藏叛乱，世界资产阶级找到了好题目。中国有句老话：虱多不痒。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反动派，骂我们骂得太多了，也就不痒了。你们了解西藏问题吗？

……

四月十八日，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已占领了所谓的麦克马洪线的几个重要据点。广大的西藏群众与解放军站在一起，他们痛恨他们的领导者——农奴主。西藏叛乱有很多地方与匈牙利事件不同。只讲一点，即群众基础不同。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匈牙利事件时，群众思想混乱，一九五七、一九五八两年经过了党的工作才转变过来。西藏的农奴并不站在西藏教皇大炮那边，大多数站在我们这边。也有些人看不清楚。大部分同我们站在一起要求解放。西藏事件很好，我们很乐观。当然，要消灭农奴制，进行社会改革，要向群众讲道理，这还需要时间。有这样一个问题，解放军到西藏已经九年了，西藏为什么不改革？这是我们有意的，把这块地方放慢一步，这是有计划地放慢。这

倒不是因为没有群众基础。西藏的一些上层分子心在外国，不在中国。我们放慢改革，原来讲一九六二年以后再商量改革问题。现在他们打了炮，就把改革提前了四年。因此，打炮也是好事。世界上的资产阶级对我们平叛总是要大叫大骂的，因为他们认为西藏实际上是他们的地方，不是我们的。他们的第一个论据说西藏人不是中国人，西藏人是西藏人，不是汉人。其实，我们国家里不是汉人的多得很，内蒙古是蒙古族人，维吾尔族是突厥族系的人，还有其他少数民族，都不是汉人。在中国六亿七千万人口中，少数民族有三千六百万人。不仅一百二十万西藏人不是汉人，其他三千四百多万人也不是汉人。叛乱分子说西藏要求独立，而所谓“独立”，就是要把西藏给外国。

《同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的谈话》(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九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83—184页

雅鲁藏布江以南、喜马拉雅山国境线以北广大地区平叛战斗，已经基本结束，得到很大胜利。这是当地人民群众对平叛战争热烈拥护与人民解放军英勇战斗两方面相结合而完成的。……全世界反动派，以胡适为代表，忘记了一件事，日本打中国，反革命打革命，中国平叛匪，以革命打反革命，二者完全相反，胜败判然不同。

《西藏人民群众拥护人民解放军平叛，亲如家人》(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189页

达赖上次来北京时，我同他谈过话，谈得很好。他向我保证，回去一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实行改革，但看来他还是处在一种矛盾当中。在他下面的索康、赤江、帕拉这些人都是很坏的。达赖有那样一个很坏的环境。这些人是把他向外、向反

对中央的方向拉的；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聪明人，他能够想到，他离开西藏、离开人民、离开祖国之后，下面的文章不好做。他写给谭冠三的三封信就流露了这个思想。

达赖，现在一个可能是回来，一个可能是不回来。最近印度报纸放出来的空气是他要回来。但是，达赖的两个声明，完全是反对中央，反对祖国大家庭，要求西藏独立的。这样，回来的路，达赖就自己堵塞了。据我看，达赖的声明是索康、帕拉等人的作品，同时得到印度某些人的同意。达赖如果赞成这两个声明，就不能回来，要回来就要改变态度，站在反对这两个声明的立场，拥护中央。要达赖从那个环境出来，离开索康、赤江、帕拉等人，办法很难想，这全靠他个人的意志，个人想办法。我们是留有余地的，还选举他做人大副委员长，自治区筹委会主任委员的位子也给他留着。留有余地，我们的态度就很主动。其他的叛国分子，他们也可以回来，但是要改变态度。回来也不能再当噶伦，要不然和你们就没有区别了。

《西藏平叛后的有关方针政策》（一九五九年五月七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56—57页

如果达赖赞成我们的主张，我们希望达赖回来。只要他赞成两条，第一，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第二，在西藏要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革，他就可以回来。尼赫鲁对于这两条并不反对，尼赫鲁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也说应当在西藏进行改革。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两条达赖都反对。世界上的事是常常有变化的。西藏惟一的女活佛已经从印度回来。所以，留有余地，比较好。……如果达赖对以上两条不改变他现在的态度，我们就不欢迎他；如果他改变态度，我们就真正欢迎他。现在要达赖改变态度，赞成不分裂国家，赞成在西藏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革，是很难的。但是，

世界形势一变，情况就会不同。许多白俄不是已经回国了吗？达赖还年轻，他才二十多岁。

《关于中印关系和达赖喇嘛回国问题》(一九五九年十月六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206—207页

达赖周围有许多人，对达赖影响不好。当然也不能说达赖是进步的，他自己不那么进步。他到外国去发表的一些言论，做的一些事，是反对祖国的。他们说，西藏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是独立王国。第二就是改革问题，他们不赞成。

《同班禅额尔德尼等的谈话》(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208页

巴黎公社

巴黎公社，是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巴黎工人阶级起来的第一次革命的运动。那年正当前清同治十年，到今日恰是五十五年了。我们要问，这种运动为什么不发生于百年以前，而发生于五十五年前的今日呢？我们知道，凡属一种运动发生，不是无缘无故的，必有客观的条件。查巴黎公社，在中国鸦片战争之后三十年，这三十年中，继续订有《南京条约》、《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足证明欧洲各国，已有能力向东方猛烈地发展，已由资本主义进为帝国主义，国内已形成伟大的工人阶级，所以才有此种壮烈的工人革命运动产生。

《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3—34页

民国六年俄罗斯工人起来革命，推翻资本家政府，成功了劳工专政，使世界上另开了一条光明之路，其价值的重大为何

如?俄国的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以自己的力量,来求人类真正的平等自由,它们的意义是相同的,不过成功与失败不同而已。所以我们可以说: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果——俄国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继承者。

《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4页

人类由原始社会进化为家长社会、封建社会以至于今日之国家,无不是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阶级斗争的演进。巴黎公社便是工人阶级第一次起来打倒统治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革命。

《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4页

巴黎公社存在不过七十二天,何以失败这样快呢?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作指挥——我们欲革命成功,必须势力集中行动一致,所以有赖于一个有组织有纪律的党来发号施令。当时巴黎公社,因为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党,以致内部意见纷歧,势力分散,而予敌人以可乘之机,这是失败的第一个原因。(二)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我们对敌人仁慈,便是对同志残忍。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十四年国民政府打倒杨、刘肃清反革命派的胜利,全赖对于敌人取绝对严厉的手段,不丝毫妥协,因为我们不用严厉的手段对付敌人,敌人便要用极残酷的手段对付我们了。巴黎公社,对于敌人不取严厉处置,还容许敌人占住金融机关,调集军队,所以终被敌人覆灭了。各同志要鉴往知来,惩前毖后,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

致命的打击”这句话。我们要革命，便要从此学得革命的方法。

《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5—36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

历史上的一切战争，依其性质可以分为两类，一是正义的战争，一是非正义的战争。例如二十几年前的欧洲大战，就是一个非正义的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那时各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强迫人民为帝国主义的利益作战，违反人民的利益；……

《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83—384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非正义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那时世界上还只有一个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党和别国的很少数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那时各国社会民主党的领袖都是赞成帝国主义战争的，其党员则绝大多数是还不觉悟的。这是三十年前的情形。

《英勇斗争的二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七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0页

文明社会五千年来，才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次世界大战，是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二十世纪的时代，资本家撞了资本家，市场少了，有的抢到的地方广一些，有的抢到的地方狭一些，因此打起来。这就是所谓帝国主义时代。整个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性的大战，是在一九一四年发生的，在座的凡是三十岁以上的人就会知道，记得此事。这次战争，刚才讲了，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反映，世界经济发展到那种程度，就

要出这种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者早已预料到了这一点。这次战争是破坏的战争，是非正义的战争，是损害人类利益的战争，是抢夺市场的战争，这是它的消极方面。但是它也产生了积极的方面，就是出现了俄国十月革命，在很多国家中产生了共产党，很多国家的无产阶级产生了自己的先锋队，我们中国就是一个。跟着世界战争来了一个世界革命时期。首先在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后来接着有德国革命、匈牙利革命、意大利革命，但是这些都被打垮了。因为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还是分裂的，有共产党，有社会民主党，无产阶级的觉悟也不够。胜利的只有俄国的十月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世界的面目、历史的方向就变了。世界历史几千年以来都在发展着，进步着，但只有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才产生了新的方向。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8—289页

十月革命

民国六年俄罗斯工人起来革命，推翻资本家政府，成功了劳工专政，使世界上另开了一条光明之路，其价值的重大为何如？俄国的十月革命和巴黎公社，是工人阶级以自己的力量，来求人类真正的平等自由，它们的意义是相同的，不过成功与失败不同而已。所以我们可以说：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果——俄国革命是巴黎公社的继承者。

《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4页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不只是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而且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影响到世界各国内部的变化，同样地而且还特别深刻地影响到中国内部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通过了各国内部和中国内部自己的规律性而起的。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3页

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第一次胜利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的时代。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67页

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将世界历史划分为两个时代，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流行了。

《时局问题及其他》（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49页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胜利之后，世界的面目、历史的方向就变了。世界历史几千年以来都在发展着，进步着，但只有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之后，才产生了新的方向。奴隶社会及其以后的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人剥削人的社会。十月革命后的新的历史方向，就是取消人剥削人的制度。俄国人民已经得到了胜利。许多国家都有了共产党。我们党一九二一年建立，到今年已经有了二十四年的历史。日本共产党一九二二年建立，印度共产党一九二〇年建立。东方几个大国如此，其他如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美国的共产党，大体上都是这个时期产生的。一九一九年，列宁组织了第三国际。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9页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全世界无产阶级及其他先进分子上了共产主义的一课。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学说始于一八四三年（鸦片战争后三年），但由一八四三年到一九一七年，七十四年之久，影响主要限于欧洲，全世界大多数人还不知道有所谓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产生于欧洲，开始在欧洲走路，走得比较慢。那时我们中国除极少数留学生以外，一般人就不知道，……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比飞机飞得还快。飞机从莫斯科到这里也不止一天吧，但这消息只要一天，即是说，十一月七日俄国发生革命，十一月八日中国就知道了。那个时候，把俄国的革命党叫做过激党。七十多年马克思主义走得那样慢，十月革命以后就走得这样快。因为它走得这样快，所以一九一九年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就不同了，五四运动以后，很快就晓得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势力的口号。在这以前，哪个晓得提这样的口号呢？不知道！这样的口号，这样明确的纲领，从中国无产阶级产生了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起，就提出来了。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0—291页

从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四年，十一年后，世界上来了一次世界大战，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七年，又是三年，来了一个十月革命。一九〇三年到一九一七年，十四年，十月革命胜利了。没有一九〇三年在俄国出现布尔什维克派，没有布尔什维克在俄国革命中的活动，就没有十月革命。没有十月革命，我们中国会不会有共产党呢？当然中国大批的无产阶级产生了以后，总

会产生党的，所以不能说不会产生共产党，但要拖到什么时候才能产生，就不知道了。一九〇三年产生了布尔什维克，一九一七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就使得全世界历史改变了方向。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97页

十月革命给世界人民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十月革命建立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这条革命战线是在列宁，而在列宁死后是在斯大林的英明的指导之下建立起来和发展起来的。

《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57页

十月革命的光芒照耀着我们。苦难的中国人民必须求得解放，并且他们坚信是能够求得解放的。一向孤立的中国革命斗争，自从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就不再感觉孤立了。我们有全世界的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援助。

《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59页

关于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关系，十月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时代人类第一个最伟大的胜利，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倒德、意、日帝国主义是第二个最伟大的胜利，中国革命是第三个最伟大的胜利。历史的次序也是如此排列的。不能设想，没有十月革命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反法西斯的胜利而有中国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十月革命，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61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精力，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这时，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0页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0—1471页

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以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就进入政治斗争，经过曲折的道路，走了二十八年，方才取得了基本的胜利。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2页

一九一七年的俄国革命唤醒了中国人，中国人学得了一样

新的东西，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孙中山也提倡“以俄为师”，主张“联俄联共”。总之是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14页

四十年前，苏联人民在伟大的革命导师列宁和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作为新世界的开路先锋，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是人类历史的转折点。

《欢迎、欢送伏罗希洛夫的四次讲话》（一九五七年四月、五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27页

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它附带地完成了民主革命遗留下来的任务。十月革命一开始，就宣布了土地国有令，但是完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在革命胜利以后还用了一段时间。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3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世界的面貌全变了，反法西斯的同盟国中有社会主义国家，有资本主义国家，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这些国家的共产党都参加了这个反法西斯战争，这是一个正义的战争。

《英勇斗争的二十二年》（一九四三年七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0页

如果说，十月革命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那末，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就是给全世界工人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开辟了更加广大的可能性和更加现实的道路。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的意义估计不足，将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全世界革命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57—1358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和许多国家得到了解放。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两种结果：第一，产生了像中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由共产党管事的国家；第二，像在印尼、印度、缅甸这样的许多亚非国家中，民族主义者所领导的运动使这些国家成为独立自主或者接近独立自主的国家。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埃及有了很大的改变，许多近东和中东国家也是如此。虽然美国强了起来，但是西方国家的阵营总的说是削弱了。

《同印尼总理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的谈话》（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11页

斯大林格勒保卫战

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而有些革命的人们也往往在一个期间内被这种外强中干的现象所迷惑，看不出敌人快要消灭，自己快要胜利的实质。整个法西斯势力的兴起及其进行了几年的侵略战争，正是这种最后挣扎的表现；而在战争中，又以攻击斯大林格勒表现它自己的最后挣扎。在这个历史的转折点面前，全世界反法西斯阵线内的人们也有许多被法西斯的凶恶面孔所迷

惑，看不出它的实质。自从八月二十三日德军全部渡过顿河河曲，全面地开始攻击斯大林格勒，九月十五日德军一部打入该城西北部工业区，至十月九日苏联情报局宣布红军突破该区德军包围线为止，共计进行了四十八天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空前苦战。这一战终于胜利了。在这四十八天中，这个城市每天的胜负消息，紧系着无数千万、万万人民的呼吸，使他们忧愁，使他们欢乐。这一战，不但是苏德战争的转折点，甚至也不但是这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在这四十八天中，世界人民的注视斯大林格勒，和去年十月间世界人民的注视莫斯科，其关心程度，是有过之无不及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84—885页

四十八天中，红军的保卫斯大林城，和去年保卫莫斯科市有某种相同。这就是说，它使得希特勒今年的计划也像他的去年计划一样，归于失败。其不同点，则在莫斯科保卫战之后，虽然接着举行了冬季反攻，可是还要遭到今年德军的一个夏季进攻，这是因为一则德国及其欧洲伙伴尚有余勇可贾，二则英美拖延开辟第二条战线的缘故。而在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之后，则形势将和去年完全两样。一方面苏联将举行极大规模的第二个冬季反攻，英美对第二条战线的开辟将无可拖延（虽然具体时间仍不能计算），欧洲人民也将准备着起义响应。另一方面，德国及其欧洲伙伴再也无力举行大规模的攻势了，希特勒只好把整个方针转入战略防御。只要迫使希特勒转入战略防御，法西斯的命运就算完结了。因为像希特勒这样法西斯国家的政治生命和军事生命，从它出生的一天起，就是建立在进攻上面的，

进攻一完结，它的生命也就完结了。斯大林格勒一战将停止法西斯的进攻，这一战是带着决定性的。这种决定性，是关系于整个世界战争的。

希特勒面前遇着的，是三个强大敌人：苏联、英美及在其占领区的老百姓。在东线，是屹立不动的红军壁垒和整个第二冬季以及连续下去的红军反攻，这是整个战争和人类命运的决定力量。在西线，即使英美还采取着观望和拖延的政策，但等到有死老虎可打的时候，第二条战线总是要建立的。希特勒还有一个内部战线，就是德国、法国及欧洲其他部分正在酝酿着一个伟大的人民起义，只待苏联举行全面反攻和第二条战线炮响，他们将以第三条战线出来响应。这样，三条战线夹击希特勒，就将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以后的伟大历史过程。

拿破仑的政治生命，终结于滑铁卢，而其决定点，则是在莫斯科的失败。希特勒今天正是走的拿破仑道路，斯大林格勒一役，是他的灭亡的决定点。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87—888页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苏联红军从斯大林格勒开始进攻，扭转了世界的历史，随后又有英、美在北非与太平洋的进攻，把联合国的防御与退却形势，转变到了进攻形势，苏联红军的伟绩，起了决定作用。

《纪念联合国日，保卫西安与西北！》（一九四四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72页

四十年前的十月革命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怎么现在又有转折点呢？还是有的。打希特勒，在一个时期，有一二年

时间，希特勒占了上风。那时，希特勒不但占领大半个欧洲，而且打进苏联，苏联让出了一大块土地，可见希特勒一时占了上风。斯大林格勒一战成为转折点，从此希特勒就走下坡路，苏联就势如破竹一直打到柏林。这不是一个转折点吗？据我看来，斯大林格勒一仗，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

《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21—322页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第二战场的开辟

第二战场的开辟，其影响不仅在欧洲，而且将及于太平洋与中国。中国要前进，世界要前进，我们必须取得最后胜利。

第二战场的开辟，是经过长期发展的结果，是经过莫斯科、德黑兰会议发展而来的，在这些会议上决定了从东、西、南三面打击敌人。第二战场现在是实现了，三面打击希特勒的计划是实现了，……

全中国所有抗战的人们，应该集中目标，努力工作，配合欧洲的决战，打倒日本军阀。现在时机是很好的。

《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讲话》（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67页

第二战场的开辟是同盟国战争合作的发展，其总的性质，现在与过去比较，是没有变化的。但是第二战场开辟有与斯大林格勒反攻某种相同的意义。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以前，是法西斯凶焰高涨，反法西斯力量被打与退却的时期，赖有苏联的进攻结束了过去的阶段，开辟了新的阶段。接着，北非与太平洋相继有了进攻。这是同盟国从防御到进攻的一个大转变。第二战

场开辟，在进攻中又前进了一大步，如果没有它，就不能打倒希特勒。现在欧洲已进到了决战阶段了，在这个意义上说，它是一个新阶段，特别在军事方面。我已说过，第二战场开辟的影响会是很广泛的，直接影响欧洲，将来亦会影响到太平洋与中国。但就目前来说，对中国的影响似乎不会很大，你们可以看见，外面情况虽然甚好，但是中国的问题还要靠中国人自己努力，单有国外情况的好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的讲话》（一九四四年六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68—169页

共产国际及其解散

共产国际的解散，正如外国通讯社所报道的，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从四天以来全世界各国，不论是反法西斯阵营中的还是法西斯侵略者阵营中的，不论何党何派，对此问题都加以极度注意，就可以证明这一点。

共产国际为什么要解散呢？难道它不是为全世界工人阶级谋解放和为反法西斯战争尽力的吗？

是的，它是这样的。共产国际是列宁手创的。在它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在帮助各国建立真正革命的工人阶级政党上，在组织反法西斯斗争的伟大事业上，有其极巨大的功劳。共产国际在中国人民中的影响，是很大的。其原因就在于，中国虽然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却在二十二年中连续不断地进行了三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这就是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而共产国际对于这三次革命运动都给予了很大的帮助。在北伐战争前夜，共产国际帮助了孙中山先生及其领导下的国民党，促使国民党在一九二四年实行改组，并缔结了国共两党的

合作。当时蒋介石先生曾衔中山先生之命到过莫斯科，国民党的代表还曾列席过共产国际的会议。这些就足以证明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和在中国人民中的影响是何等巨大，再不必说对以后的土地革命战争和近年的抗日战争的援助了。

《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9—20页

既然共产国际对中国以及各国有很大的功劳，那末，为什么又要宣布解散呢？按照马列主义的原则，革命的组织形式应该服从于革命斗争的需要，如果组织形式已经与斗争的需要不相适合时，则应取消这个组织形式。现在，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斗争的需要了，如果还继续保存这个组织形式，便反而会妨碍各国革命斗争的发展。现在需要的是加强各国民族共产党，而无须这个国际的领导中心的必要了。其所以如此，主要的是由于以下三个理由：第一，因为各国内部以及各国之间的情况，都比过去更为复杂，其变化也更为迅速，统一的国际组织已无法适应这种非常复杂而且变化迅速的情况。正确的领导需要从仔细研究本国情况出发，这就更加要由各国共产党自己来做。远离各国实际斗争的共产国际，在过去情况比较单纯，变化比较还不很迅速的时候是适合的，现在就不适合了。第二，法西斯强盗在法西斯阵营和反法西斯阵营各民族之间划分了深刻的鸿沟，反法西斯国家中有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的、殖民地的、半殖民地的各种类型的国家，法西斯国家及其附庸国中也有很大的差别，此外还有各种情况的中立国。为了迅速地 and 有效地组织一切国家的反法西斯斗争，国际性的集中组织早已感到不大适宜，这种情况至近来乃特别显著。第三，各国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已经成长起来，他们在政治上已经

成熟。以中国共产党为例可以说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经过三次革命运动，这些革命运动是连续不断的，是非常复杂的，甚至比俄国革命还更复杂。在这些革命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自己的身经百炼的优秀干部。自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共产国际即没有干涉过中国共产党的内部问题，而中国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

《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0—21页

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削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更加适应于反法西斯战争的需要。

《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2页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总的来说是功大过小，犹如玉皇大帝经常下雨，偶尔不下雨还是功大过小。没有共产国际的成立和帮助，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是不能有今天的。他们需要我们，我们也需要他们。

《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3页

过去共产国际对中国无产阶级、中国人民有很大的帮助，帮助中国无产阶级创造了中国共产党，有过很大的功劳，共产国际解散时我们党的决定上说到了这一点。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18页

我们党有这样一段历史。在北伐战争时期，我们党是比较活泼的，五万多党员，生气勃勃，但是由于后一个时期陈独秀的右倾路线错误，革命失败了。后来我们就搞武装斗争，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这个时期，党内出现过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一连搞了七八年。当然，这中间也有正确的时候，例如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后有一个短时期，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有一个短时期，六届三中全会以后有一个短时期。三中全会也有缺点。这三次“左”倾路线都跟共产国际有关系，特别是王明路线。第一次“左”倾路线同共产国际的关系不是很大；第二次“左”倾路线从共产国际学了一些东西，但那个总的路线算是中国自己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就不同了，连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案都是俄国人给写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长达四年之久，造成的损失最大，革命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50—51页

过去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它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了百分之九十，把白区几乎搞垮了百分之百。少奇同志在八大的报告中也谈到这一点。为什么不公开说明这就是斯大林的路线呢？这也有原因。苏联可以公开批评斯大林，我们公开批评就不那么好。我们应该和苏联搞好关系。也许过一些时候可能公开提出。世界上的事总是这样，事实就是事实。那时第三国际做了许多错事。第三国际前后两段还好，中间有一大段不好：列宁在世的时候好，后来季米特洛夫负责的时候也较好。中国第一次王明路线搞了四年，对中国革命的损失最大。

《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20页

共产国际解散后我们比较自由些。

《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21页

苏共二十大和批判斯大林问题

共产党人对于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发生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是也是一个犯了几个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不论是他的正确的地方,或者错误的地方,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整个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三十九年的时间,许多革命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是还有缺点和错误。如同一个成绩出现了接着又创造新的成绩一样,一个缺点或错误克服了,新的缺点或错误又可能产生,又有待于我们去克服。而成绩总是多于缺点,正确的地方总是多于错误的地方,缺点和错误总是要被克服的。好的领导者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认真地对待错误。完全不犯错误的人在世界上是从来没有的。列宁说:“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郑重的党的标志,这才是党执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

级，以至于群众。”苏联共产党遵循列宁的遗教，现在正在认真地对待斯大林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犯的某些性质严重的错误及其所遗留的后果。由于其后果的严重性，所以苏联共产党有必要在肯定斯大林的伟大功绩的同时，又尖锐地揭露斯大林所犯的错误的实质，号召全党以此为戒，坚决地消除这种错误所造成的不良后果。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深信，经过苏联共产党二十次代表大会这一次尖锐的批判之后，过去被某些错误政策所严重地压抑了的一切积极因素，必将普遍地活跃起来，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将比较过去更好地团结一致，为了建设一个人类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伟大的共产主义社会和争取全世界的持久和平而奋斗。

《共产党人对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21页

关于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我想讲一点。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

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去年这一年，国际上闹了几次大风潮。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大反斯大林，这以后，帝国主义搞了两次反共大风潮，国际

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两次大的辩论风潮。在这几次风潮中，欧洲美洲有些党受的影响和损失相当大，东方各国的党受的影响和损失比较小。苏共“二十大”一来，有些从前拥护斯大林非常积极的人，这时候也反得很积极。我看这些人不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问题不作分析，也缺乏革命道德。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包括无产阶级的革命道德。你从前那么拥护，现在总要讲一点理由，才能转过这个弯来吧！理由一点不讲，忽然转这么一百八十度，好像老子从来就是不拥护斯大林的，其实从前是很拥护的。斯大林问题牵涉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各国党都牵涉到了。

对苏共“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太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正常的反映。但是，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它们“鼻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后头帝国主义几棍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几棍子，连赫鲁晓夫的腔调都不得不有所改变，他们又摇过来了。大势所趋，不摇过来不行。墙上一菟草，风吹两边倒。摇过来不是本心，摇过去才是本心。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十八日）

一九五六年，斯大林受到批判，我们一则以喜，一则以忧。揭掉盖子，破除迷信，去掉压力，解放思想，完全必要。但一棍子打死，我们就不赞成。他们不挂斯大林的像，我们挂。一九五〇年我和斯大林在莫斯科吵了两个月，订立了中苏友好同

盟互助条约。对中长路、合股公司、国境问题，我的态度是：第一，你提出，我不同意者要争；第二，如果你一定要坚持，我可以接受，但保留意见。这是因为要顾全整个社会主义的利益。还有两处势力范围，东北和新疆，不准第三国的人住在那里，现在取消了。批判斯大林，使那些迷信他的人清醒了一些。要使我们的同志认识到，老祖宗也有缺点，要加以分析，不要那样迷信。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
第370页

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见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

《对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六三年九月），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373页

苏伊士运河事件

埃及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全中国人民都支持埃及，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和全世界人民都支持埃及。全世界最少有百分之八十的人支持埃及，只有一小部分国家反对埃及，另外有一部分国家采取中立。

据我看，美国也同意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它不会帮助英国从埃及手里把运河夺回去，这样对美国也没有好处。美国另外有它的目的。对美国说来，运河在英、法手里和在埃及手里没有什么区别。它本来就不期望实现“杜勒斯计划”。美国是想借这机会把英、法从中东赶出去，以便建立它自己的势力。苏联、阿拉伯国家、印度和科伦坡国家都支持埃及，有苏联在，英国、美国、法国就不敢轻易行动。这次埃及巧妙地利用了帝国主义国家间、帝国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间、帝国主义国家和民族独立国家间的矛盾。你们还要利用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内部是不统一的。

《中国人民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七日），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247—248 页

在中东，出了一个苏伊士运河事件。一个人，叫纳赛尔，把运河收归国有了；另外一个人，叫艾登，出一支兵去打；接着，第三个人，叫艾森豪威尔，要赶走英国人，把这个地方霸起来。英国资产阶级历来老奸巨猾，是最善于在适当的时候作出妥协的一个阶级。现在它把中东搞到美国人手里去了。这个错误可大啦！这样的错误，在它历史上数得出多少呀？这一回为什么冲昏头脑犯这个错误呢？因为美国压得太凶，它沉不住气，想把中东夺回去，阻止美国。英国的矛头主要是对埃及的吗？不是。英国的文章是对付美国的，美国是对付英国的。

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当前世界斗争的重点。当然，帝国主义国家跟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是很厉害的矛盾，但是，他们现在是假借反共产主义之名来争地盘。争什么地盘呢？争亚洲非洲十亿人口的地盘。目前他们的争夺集中在中东这个具有重大

战略意义的地区，特别是埃及苏伊士运河地区。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87—188页

匈牙利事件

匈牙利事件是出了好，还是不出好呢？既然有问题就不能不出，出了反而好，有脓包总要出脓。匈牙利事件主要是因为本国的工作没有做好，一概硬套苏联的办法，没有照顾到本国的具体情况。因此得出一条教训，我们要根据马列主义普遍真理，结合本国的具体情况来办事。

《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78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苏联共产党，东欧一些国家的党，不讲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了。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民主集中制，党与群众的联系，这些他们都不讲了，空气不浓厚了。结果出了个匈牙利事件。我们一定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匈牙利事件不是好事，这是大家清楚的。但是它也有二重性。由于匈牙利的同志们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间处理得正确，结果匈牙利事件由坏事转变成了一件好事。匈牙利现在比过去巩固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也都得了教训。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8页

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

苏联发射第一个人造地球卫星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人类进一步征服自然界的新纪元从此开始了。

《在莫斯科机场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13页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苏联的两颗人造卫星上了天，这两件事标志了两大阵营力量对比的新的转折点。

《在莫斯科大学会见中国留学生时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49页

莫斯科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及会议宣言

我们这回十二国是不是开谈判？六十几个党是不是开谈判？实际上是在开谈判。也就是说，在不损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下，接受人家一些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自己一些可以放弃的意见。这样我们就有两只手，对犯错误的同志，一只手跟他作斗争，一只手跟他讲团结。斗争的目的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叫原则性，这是一只手。另一只手讲团结，团结的目的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讲妥协，这叫做灵活性。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这是一种对立面的统一。

《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32页

六十八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参加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四十周年的庆祝，这是一个有伟大意义的事件，它表现

了社会主义国家以苏联为首的团结一致，表现了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团结一致。社会主义阵营必须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也必须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共产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和苏联的两颗人造卫星上了天，这两件事标志了两大阵营力量对比的新的转折点。十月革命产生了新世界，经过四十年，新世界的力量已经超过了旧世界。现在全世界有二十七亿人口，社会主义各国的人口将近十亿，独立的旧殖民地国家的人口有七亿多，正在争取独立或者争取完全独立的国家的人口有六亿，帝国主义阵营的人口不过四亿左右，而且他们的内部是分裂的。现在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

《在莫斯科大学会见中国留学生时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49页

六十几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开会是从从来没有过的事，从来也没有这样大的规模。

《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22页

我非常高兴，非常庆幸我们的会议开得很团结。这次大会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的上升的朝气、东风压倒西风这么一种形势。我们有很多缺点和错误，但是我们的成绩是主要的，是年年见成效的。于是乎反映在我们六十几国共产党大会上一股朝气，并且一致承认要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就是苏共中央。

《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29页

现在很好，在莫斯科开了一次会，很多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决定了一个根本的纲领。刚才讲的，纲领上也有：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要与各国情况相结合；国际主义同爱国主义是统一的。过去一个很长时期没有这样的纲领，现在有了这个纲领，它已经成为全世界各国共产党所接受的纲领。

《要学习世界各国的先进经验》（一九五八年四月二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14页

“每一个”国家都“具有自己特别的具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这个提法好。一八四八年有一个《共产党宣言》，在一百一十年以后，又有一个“共产党宣言”，这就是一九五七年各国共产党的莫斯科宣言。在这个宣言中，就讲到了普遍规律和具体特点相结合的问题。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6页

古巴革命

古巴革命是在美国身边放炸弹。不能把它看作只是古巴的事件或只是拉丁美洲的事件，这也是世界性的事件。

《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一九五九年三月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0页

请你们看一看古巴。古巴在什么地方？离美国很近，飞机航行距离只要半小时。古巴人民原来是手无寸铁的，古巴的统治者巴蒂斯塔在几年中杀死古巴人两万之多。你们也可能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多。古巴可不是大国，只有六百多万人口，离美国那么近，巴蒂斯塔又杀死过两万人。但是，一九五六年十

一月，古巴的民族英雄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八十二人，从墨西哥坐了一只船，到古巴登陆。同政府军作战打了败仗，八十二人只剩下十二个人，其中有菲德尔·卡斯特罗和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他们只好转入山区，开始游击战争，打了两年多，抢了许多枪炮，还抢了坦克，巴蒂斯塔只好跑了。你们看，古巴人民原来是手无寸铁，而巴蒂斯塔政权是武装到牙齿的，美国那么大的国家支持它，又离得那么近，但是人民团结起来就把巴蒂斯塔赶跑了。你们有没有人到古巴去过？如果没有人去过，我建议你们到古巴走一趟。这么个小国敢于在美国身旁搞革命，所以研究古巴的经验很有必要，古巴的革命有世界意义。

《帝国主义是不可怕的》（一九六〇年五月七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72页

古巴革命是民族民主革命，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和反对巴蒂斯塔集团、买办资本、封建主义的斗争。今后它走哪个方向还得看。它反帝、反封建是肯定的、坚决的。

《中间地带国家的性质各不相同》（一九六二年一月三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88页

对被压迫人民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是支持的。对古巴、阿尔及利亚的革命战争，我们是支持的……这些革命是他们自己搞起来的。比如古巴，不是我们叫卡斯特罗起来革命，是他自己起来革命的。你们相信吗？是美国叫他革命的，是美国走狗叫他革命的。

《支持被压迫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78页

反对新的日美“安全条约”的斗争

新的日美“安全条约”是为了压迫日本广大人民，是以中苏为敌、以亚洲人民为敌的侵略性的军事同盟条约，它对亚洲和世界和平是严重的威胁，同时也必将把严重的灾难带来给日本人民。中日两国人民和亚洲人民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当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

《坚决支持日本人民反对日美军事同盟条约的斗争》（一九六〇年五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79页

去年日本社会党领袖浅沼稻次郎访华时在北京发表演讲，说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当时一部分人认为这种说法太过火。现在日本人民的斗争，大大超过了去年的这种说法，斗争的范围和规模之大，是去年所没有想到的。这次斗争是从反对“安全条约”爆发的，其基本性质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它在日本的代理人岸信介，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因为条约是日美反动派在众议院强行通过的。就是说日本革命的性质是民族民主革命。工人罢工不是提经济口号，而是提的政治口号，这在世界上是少见的。并且，有高级知识分子参加斗争，如东京大学校长茅诚司在“六一五”惨案发生的第二天，就召开了全校抗议大会，率领大家上街示威游行。牺牲者是东京大学学生，叫桦美智子，现在全世界闻名。她父亲叫桦俊雄，是中央大学教授，专攻法律。好像有好几千名教授都组织起来了，妇女也赶上去了，还有和尚等宗教界人士也出来了，工人、学生是主力。明天还要有更大规模的罢工。

《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00—201页

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

目前，越南人民正在抗击着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英勇地进行着抗美救国的伟大斗争。这场斗争，不仅是为了保卫越南的独立、主权和民族尊严，同时也是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共同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越南人民坚强地屹立在反美斗争的最前线，狠狠地打击、削弱和牵制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力量和战争力量，从而也就有力地支持了全世界人民反对美帝、保卫和平的革命斗争。

现在，在越南战场上，英勇善战的越南人民越战越强；美帝国主义不断遭到失败。美帝国主义的纸老虎面目已经被英雄的越南人民进一步戳穿。越南人民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衷心赞扬和钦佩。全世界人民都站在越南人民一边，同情和支持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坚信英雄的越南人民必能击败帝国主义的侵略，取得最后的胜利。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的电报》（一九六五年九月一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448页

英雄的越南人民在以胡志明主席为首的越南劳动党的英明领导下，在抗美救国战争中，消灭了美国侵略者大量有生力量，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辉煌胜利。越南人民的英勇斗争大灭了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威风，大长了世界革命人民的志气。中国人民热烈地祝贺兄弟的越南人民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美帝国主义在越南遭到惨败，就是因为他们所进行的是一场赤裸裸的侵略战争；他们所面临的是越南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人民战争。越南人民坚强不屈、英勇奋战，极大地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威力，使美国侵略者陷入灭顶之灾，创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个国家单独抗击和战胜美帝国主义侵略的光辉典范。越南人民的胜利向全世界证明，美帝国主义这个外强中干的纸老虎是完全能够被打败的。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二十二周年的电报》（一九六七年九月一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407—408页

八年来，英雄的越南南方人民发扬了英勇顽强、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人民战争，消灭了美伪军和仆从军大量有生力量，把美国侵略者打得焦头烂额，走投无路。越南南方人民在抗美救国战争中取得的伟大胜利，为最后击败美帝国主义，实现解放南方、保卫北方、进而统一祖国的伟大目标，打下了基础，为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作出了贡献。

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战争的实践又一次证明：美帝国主义是外强中干的纸老虎，它的力量是有限的，在人民战争面前，是经不起打的，是完全可以打败的。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成立八周年的电报》（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九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612页

英雄的越南人民为了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高举胡志明主席“决战决胜”的旗帜，同美帝国主义进行了十余年浴血战斗，终于促使美国政府签订越南停战和平协定，同意限期撤出美国及其盟国的全部武装力量，并且确认越南人民的基本民

族权利和越南南方人民的自决权，从而为越南人民在没有外来武力干涉的情况下解决自己的问题创造了条件，为实现越南的和平、独立、统一、民主和繁荣开辟了前景。

巴黎协定的签订，是越南人民在军事、政治和外交战线上长期斗争所取得的重大成果，是越南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坚持持久的人民战争所取得的伟大胜利，是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团结战斗的伟大胜利，也是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国人民的共同胜利。

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的胜利就像自己的胜利一样，感到由衷的高兴。你们在长期抗战中表现出来的顽强革命精神和大无畏英雄气概，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钦佩和赞扬。你们的光辉榜样，证明了小国能够战胜大国，弱国能够战胜强国，有力地鼓舞着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反帝革命斗争。你们的英勇斗争和伟大胜利，将作为当代民族解放战争的光辉典范而载入史册。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问题巴黎协定正式签订的电报》（一九七三年一月二十九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342页

越南南方军民经过长期的英勇奋战，彻底摧毁了南越傀儡政权，终于解放了西贡。这是越南人民和印度支那人民坚持长期革命武装斗争的伟大胜利。……

英雄的越南人民，为了祖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高举胡志明主席“决战决胜”的光辉旗帜，不屈不挠，前赴后继，进行了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先后打败了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特种战争”、“局部战争”和“越南化”战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巴黎协定签订之后，越南人民在新的形势下，对于西贡傀儡集团在美国政府的支持下破坏巴黎协定、拒

绝实现民族和睦、疯狂屠杀人民的罪行，进行了坚决的自卫反击战，终于以革命战争打败了反革命战争，取得了完全解放越南南方的辉煌胜利。你们的胜利，开创了越南解放新的时代，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你们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一切斗争中的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为全世界人民的反帝革命事业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越南人民的胜利，再次有力地证明，一个国家的人民，哪怕是一个小国的人民，在维护祖国独立、自由和争取民族解放的正义事业中，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用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不怕挫折，坚持下去，就一定能够打败任何貌似强大的敌人，取得斗争的最终胜利。

《毛泽东等祝贺越南南方军民彻底摧毁南越傀儡政权解放西贡的电报》（一九七五年四月三十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29—430页

二、人 物

纣王

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完全错误的。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只是损失太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以致亡了国。说什么“血流漂杵”，纣王残暴极了，这是《书经》中夸张的说法。所以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39页

纣王是很有本领的人，后来吴王把他说得很坏。他的俘虏政策做的不大好，所以以后失败了。我们俘虏政策和他的不一样，我们对俘虏是宽大，是进行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工作的。

路经济南时在火车上召开的座谈会上的谈话（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五日）

为什么纣王灭了？主要是比干反对他，还有箕子反对他，微子反对他。纣王去打徐夷（那是个大国，就是现在的徐州附近），打了好几年，把那个国家灭掉了。纣王是很有才干的，后头那些坏话都是周朝人讲的，就是不要听。他这个国家为什么分裂？就是因为这三个人都是反对派。而微子最坏，是个汉奸，他派两个人作代表到周朝请兵。武王头一次到孟津观兵回去了，然后又搞了两年，他说可以打了，因为有内应了。纣王把比干

杀了，把箕子关起来了，但是对微子没有防备，只晓得他是个反对派，不晓得他通外国。给纣王翻案的就讲这个道理。纣王那个时候很有名声，商朝的老百姓很拥护他。纣王自杀了，他不投降。

《同吴芝圃等人的谈话》（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二日），《党的文献》
1995年第4期

孔子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伯达的指出是对的；但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理论就没有正确实践”的意思差不多。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然而事实上不是如此，所以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此点似宜在文中指出，以免读者误认“名不正言不顺”而“事”也可“成”。“正名”的工作，不但孔子，我们也在做，孔子是正封建秩序之名，我们是正革命秩序之名，孔子是名为主，我们则是实为主，分别就在这里。又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

《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日、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60—161页

依照现在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别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日、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62页

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例如“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像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像现在说的“克服困难”了（现在我们说的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像“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还有仁义对举，“义者事之宜”，可说是“知”的范畴内事，而“仁”不过是实践时的态度之一，却放在“义”之上，

成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

《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日、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62—163页

孔子在认识论上与社会论上的基本的形而上学之外，有它的辩证法的许多因素，例如孔子对名与事，文与质，言与行等等关系的说明。

《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日、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63页

自古以来真正有学问的人，不是从学堂里学来的。孔夫子的孔夫子主义，不是一下子从学堂里学到的。他的老师叫做项橐，这是有书为证的，“昔仲尼，师项橐”，在《三字经》里记载着。但是他的主义不是全部从项橐那儿学到的，他是在当先生的时候，在鲁国做官的时候，才有他的孔夫子主义的。

《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83页

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关于人的基本特性及其他》（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84页

关于孔夫子的缺点，我认为就是不民主，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吾自得意路而恶声不入于耳”，“三盈三虚”，“三月而诛少正卯”，很有些恶霸作风，法西斯气味。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期间的谈话（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六日——十八日）

郭沫若曾经用很多材料证明，孔夫子所以成为圣人，是因为他是革命党，到处参加造反。说孔夫子著春秋“而乱臣贼子惧”，那是孟子讲的。其实当时孔夫子周游列国，就是哪里造反他就到哪里去，哪里想革命他就到哪里去。所以此人不可一笔抹煞，不能简单地就是“打倒孔家店”。

《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45页

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件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迟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按语选》（一九五五年九月、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54页

孔子是教育家，也是音乐家，他把音乐列为六门课程中的第二门。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1页

我们共产党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但说是圣人，我们也是不承认的。

在武昌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

孔夫子出身贫穷，放过羊，当过吹鼓手，还做过会计。会

弹琴、射箭、驾车子，还搞历史书。他学会了“六艺”。孔子的教育只有六门课程：礼、乐、射、御、书、数，教出颜回、曾参、子思、孟子四大贤人。

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六四年二月三日）

我们中国古代的思想家是孔子、老子等。

同威尔科克斯夫妇的谈话（一九六四年二月九日）

孔门充满矛盾论。

《在一九六五年〈哲学研究〉第四期上的批语》（一九六五年），《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496页

墨子

题目

似改为“古代辩证唯物论大家——墨子的哲学思想”或“墨子的唯物哲学”较好。

《关于〈墨子哲学思想〉一文给陈伯达的信》（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56页

中庸问题

墨家的“欲正权利，恶正权害”、“两而无偏”、“正而不可摇”，与儒家的“执两用中”、“择乎中庸服膺勿失”、“中立不倚”、“至死不变”是一个意思，都是肯定质的安定性，为此质的安定性而作两条战线斗争，反对过与不及。这里有几点意见：（1）是在作两条战线斗争，用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来规定相对的质。（2）儒墨两家话说得不同，意思是一样，墨家没有特别发展的地方。（3）“正”是质的观念，与儒家之“中”（不偏之

谓中)同。“权”不是质的观念，是规定此质区别异质的方法，与儒家“执两用中”之“执”同。“欲”之“正”是“利”，使与害区别。“恶”之“正”是“害”，使与利区别而不相混。“权者两而无偏”，应解作规定事物一定的质不使向左右偏（不使向异质偏），但这句话并不及“过犹不及”之明白恰当，不必说它“是过犹不及之发展”。(4)至于说“两而无偏，恰是墨子看到一个质之含有不同的两方面，不向任何一方面偏向，这才是正，才真正合乎那个质”，则甚不妥，这把墨家说成折衷论了。一个质有两方面，但在一个过程中的质有一方面是主要的，是相对安定的，必须要有所偏，必须偏于这方面，所谓一定的质，或一个质，就是指的这方面，这就是质，否则否定了质。所以墨说“无偏”是不要向左与右的异质偏，不是不要向一个质的两方面之一方面偏（其实这不是偏，恰是正），如果墨家是唯物辩证论的话，便应作如此解。

《关于〈墨子哲学思想〉一文给陈伯达的信》（一九三九年二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57—158页

历史上只有禹王，他是做官的，他也耕田，手上也起了泡，叫做胼胝；还有一个墨子，也是一个劳动者，他不是官，而他是比孔子更高明的圣人。

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四日）

屈原

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

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六）》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党的文献》1994年第
5期

屈原是中国一个伟大的诗人，他在一千五百年前写了许多爱国的诗，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几千年来，中国人民就把他死的一天作为节日，这一天就是旧历五月五日端午节。在这一天，人民吃粽子。粽子是把糯米用一种叶子包起来制成食品。人民把这种食品投在河里喂鱼，使鱼吃饱了不伤害屈原。

同尼赫鲁的谈话（一九五四年十月二十六日）

孟轲、韩非、叔孙通

孟轲、韩非、叔孙通辈，都是纵横家。

《读〈智囊〉批语》，《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65页

秦始皇

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仍旧保留着封建割据的状态。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
2版第2卷第624页

一股风一来，本来是基本上好的一件事，可以说成不好的；本来是基本上一个人好的人，可以说他是坏人。比如我们对于秦

始皇，他的名誉也是又好又不好。搞了两千多年，封建社会没有人讲他好的，自从资本主义兴起来，秦始皇又有名誉了。但是，共产主义者不是每个人都说秦始皇有点什么好处，不是每个人都估计得那么恰当。这个人大概缺点甚多，有三个指头。主要骂他的一条是焚书坑儒。一个古人，几千年评价不下来，当作教训谈谈这个问题，同志们可以想一想。

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二月三日）

秦始皇比孔子伟大得多。孔夫子是讲空话的。秦始皇是第一个把中国统一起来的人物。不但政治上统一中国，而且统一了中国的文字、中国各种制度如度量衡，有些制度后来一直沿用下来。中国过去的封建君主还没有第二个超过他的。可是被人骂了几千年。

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的谈话（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四日）

秦始皇是好皇帝。

同各中央局书记的谈话（一九六四年八月三十日）

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

同埃及副总统沙菲的谈话（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三日）

刘邦

汉高祖是流氓，也是无产阶级推倒贵族阶级的革命，不过

在农业社会里，他们革命成功后，又做起皇帝，自己又变成贵族阶级了。

《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5页

刘邦能够打败项羽,是因为刘邦和贵族出身的项羽不同,比较熟悉社会生活,了解人民心理。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六)》(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从前有个项羽,叫做西楚霸王,他就不爱听别人的不同意见。他那里有个范增,给他出过些主意,可是项羽不听范增的话。另外一个人叫刘邦,就是汉高祖,他比较能够采纳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个知识分子名叫酈食其,去见刘邦。初一报,说是读书人,孔夫子这一派的。回答说,现在军事时期,不见儒生。这个酈食其就发了火,他向管门房的人说,你给我滚进去报告,老子是高阳酒徒,不是儒生。管门房的人进去照样报告了一篇。好,请。请了进去,刘邦正在洗脚,连忙起来欢迎。酈食其因为刘邦不见儒生的事,心中还有火,批评了刘邦一顿。他说,你究竟要不要取天下,你为什么轻视长者!这时候,酈食其已经六十多岁了,刘邦比他年轻,所以他自称长者。刘邦一听,向他道歉,立即采纳了酈食其夺取陈留县的意见。此事见《史记》酈生陆贾列传。刘邦是在封建时代被历史家称为“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英雄人物。刘邦同项羽打了好几年仗,结果刘邦胜了,项羽败了,不是偶然的。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95页

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

《读〈史记〉批语》（卷八《高祖本纪》），《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21页

项羽

楚霸王项羽在中国是一个有名的英雄，他在没有办法的时候自杀，这比汪精卫、张国焘好得多。但项羽尚有一个缺点，从前有一个人在他自杀的地方做了一首诗，问他你为什么要自杀，可以到江东去再召八千兵来打天下。我们不学汪精卫、张国焘，要学项羽的英雄气节，但不自杀，要干到底。

在抗大的讲话（一九三九年四月八日）

曹操

北戴河、秦皇岛、山海关一带是曹孟德（操）到过的地方。他不仅是政治家，也是诗人。他的碣石诗是有名的。

《致李敏、李讷》（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文艺论集》第306页

历史上说曹操是奸雄。不要相信那些演义。其实，曹营不坏。当时曹操是代表进步一方的，汉是没落的。

同人民日报社负责同志等的谈话（一九五七年四月十日）

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

《要政治家办报》（一九五九年六月），《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15页

李世民（唐太宗）

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

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读〈智囊〉批语》，《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65—66页

李隆基（唐明皇）

唐明皇不会做皇帝，前半辈会做，后半辈不会做。他是懂艺术的，……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1页

王勃

是去交趾（安南）路上作的，地在淮南，或是寿州，或是江都。时在上元二年，勃年应有二十三了。他到南昌作《滕王阁诗序》说，“等终军之弱冠”。弱冠，据《曲礼》，是二十岁。勃死于去交趾路上的海中，《旧唐书》说年二十八，《新唐书》说二十九，在淮南、南昌作序时，应是二十四、五、六。《王子安集》百分之九十的诗文，都是在北方——绛州、长安、四川之梓州一带、河南之魏州作的。在南方作的只有少数几首，淮南、南昌、广州三地而已。广州较多，亦只数首。交趾一首也无，可见他并未到达交趾就翻船死在海里了。有人根据《唐摭言》、

《太平广记》二书断定：在南昌作序时年十三岁，或十四岁。据他做过沛王李贤的幕僚，官“修撰”，被高宗李治勒令驱逐，因为他为诸王斗鸡写了一篇檄英王鸡的文章。在虢州时，因犯法，被判死，遇赦得免。这个人高才博学，为文光昌流丽，反映当时封建盛世的社会动态，很可以读。这个人一生倒霉，到处受惩，在虢州几乎死掉一条命。所以他的为文，光昌流丽之外，还有牢愁满腹一方。杜甫说，“王杨卢骆当时体，……不废江河万古流”，是说得对的。为文尚骈，但是唐初王勃等人独创的新骈、活骈，同六朝的旧骈、死骈，相差十万八千里。他是七世纪的人物，千余年来，多数文人都是拥护初唐四杰的，反对的只有少数。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发，贾谊死时三十几，王弼死时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死时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

《读王勃〈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批语》，《毛泽东文艺论集》第239—241页

韩愈

韩愈是提倡古文的，其实他那个古文是新古文，道理是没有什么的，只要文章是新的。人家说好的，他说坏，人家说坏的，他说好。

《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56页

在艺术上，周扬同志告诉我说，舞台艺术要为观众留余地，

不要把一切话讲尽了，一切动作做尽了。等这个戏看完之后，人们在那里想一想，发发议论，这是成功的戏。我看不仅是戏剧，文学也是这样，写小说也是这样，做诗也是这样。韩愈做诗，他就是统统把话讲完了。人们批评他的缺点，就是他的文章同诗都是讲完了，讲尽了，不能割爱。特别是他那首《南山诗》，搞那么多。

在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

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之类，还是可以的。

《给陈毅的信》（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421—422页

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①，一分为二为宜。

《致刘大杰》（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二日），《毛泽东文艺论集》第338页

①一九七五年八月，复旦大学刘大杰为修改自己的著作《中国文学发展史》给毛泽东写信。他认为，韩愈虽非法家，但也不是醇儒，不能一概否定。

唐玄奘（唐僧）

中国历史上也有翻译工作，唐僧就是一个大翻译家，他取经回来后设翻译馆，就翻译佛经。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18页

我们的唐三藏法师，万里长征去取经，比较后代学外国困难得多。

《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三年二月七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264页

岳飞、文天祥

文天祥、岳武穆就是为国家尽忠，为民族行孝的圣人。

在延安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一九三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李自成

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

《给李鼎铭的信》（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28页

徐霞客

明朝那个江苏人，写《徐霞客游记》的，那个人没有官气，他跑了那么多路，找出了金沙江是长江的发源。“岷山导江”，这是经书上讲的，他说这是错误的，他说是“金沙江导江”。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林则徐

中国人民不走帝国主义者道路，由来已久，不仅由今日开始，一百多年来，林则徐、洪秀全、孙中山等，都没有跟随着帝国主义，我们要继承这种事业和精神，团结广大的人民，坚

决地反对帝国主义。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洪秀全

我们知道领袖农村无产阶级向清朝贵族及地主阶级作农民革命的洪秀全，乃孙中山先生最初革命思想的渊泉。

《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九二五年冬），《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6页

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69页

曾国藩

打倒太平天国出力最多的是曾国藩，他当时是地主阶级的领袖。曾国藩是练团练出身，团练即是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武力，他们见洪秀全领导一班农民革命，于他们不利，遂出死力来打倒他。

《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35页

梁启超

伯达此文及老墨哲学诸文引了章,梁,胡,冯^①诸人许多话,我不反对引他们的话,但应在适当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说明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但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上区别的,梁基本上是观念论与形而上学,胡是庸俗唯物论与相对主义,也是形而上学,章,冯……(章,冯二家我无研究),等等。若无这一简单的申明,则有使读者根本相信他们的危险。

《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日、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64页

^①指章炳麟、梁启超、胡适、冯友兰。

康有为

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69页

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1页

严复

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69页

孙中山

我们的伟大领袖孙中山先生应乎中国被外力、军阀、买办、地主阶级重重压迫的客观环境，为我们定下了革命的三民主义。我们的伟大领袖虽死，革命的三民主义不死。

《〈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发刊词》（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15页

我们的已故领袖孙中山先生看清楚我们主要的敌人是帝国主义，于是定下了革命的民族主义。又看清楚帝国主义借以剥削中国人民的重要工具，是军阀、大商买办阶级和地主阶级，又定下了革命的民权主义与民生主义。革命的民族主义叫我们反抗帝国主义，使中国民族得到解放。革命的民权主义叫我们反抗军阀，使中国人民自立于统治地位。革命的民生主义叫我们反抗大商买办阶级，尤其是那封建宗法性一切反动势力根本源泉之地主阶级，使中国大多数穷苦人民得享有经济幸福。

《〈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发刊词》（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15—16页

孙先生的主义、遗教，绝对是为了“救苦”，绝对不是为了“发财”；绝对是使人类从压迫阶级解放出来，绝对不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无论将孙先生的主义、遗教如何曲解，这个意义绝对不能变动。

《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九二五年冬），《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29页

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曾经因为孙先生与共产党合作加以坚决执行而取得人民的信仰，成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胜利的革命的旗帜。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五月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59页

孙中山先生曾经下决心改造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因而奠定了一九二四年到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的基础。

《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71页

孙先生的伟大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他的三民主义的纲领，统一战线的政策，艰苦奋斗的精神。当我在广东会见孙先生的时候，正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先生手订的三民主义新纲领，已被通过于大会，那就是有名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这时还开始实行了以国共合作做基础的统一战线政策，这个统一战线，包括对内联合共产党与工人农民，对外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有名的“三大政策”，即建立于此时。孙先生的三民主义纲领与统一战线政策，实为处在半殖民地国家的大革命家对于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不但如此，孙先生的伟大，还在他的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

再厉的革命毅力与革命精神，没有这种毅力，没有这种精神，他的主义与政策是不能实现的。如像刚才读过的《总理遗嘱》开头一句所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在这四十年中间，经过了多少艰难曲折，然而孙先生总是愈挫愈奋，不屈不挠，再接再厉。当着多少追随者在困难与诱惑面前表现了灰心丧志乃至投降变节的时候，孙先生总是坚定的。孙先生是坚持其主义的。在他一生，他的三民主义只有发展而无弃置。孙先生从没有弃置其主义于不顾的时候，他始终坚持了三民主义，并且发展了三民主义，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就表现了三民主义的发展。对统一战线也是一样，孙先生不但坚持了而且发展了统一战线，从为着推翻清朝而联合各个革命派别与会党，发展到为着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势力而采取联合苏俄、联合共产党与联合工农的新政策。所有这些，同他的不怕艰难挫折、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毅力或革命实践精神相结合，就表现了孙先生的伟大革命家模范。……所以我们纪念孙先生，如果不是奉行故事的话，就一定要注意这样的三项：第一，为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第二，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与扩大而奋斗；第三，发扬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精神。我以为这三项是孙先生留给我们的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遗产，一切国民党员，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爱国同胞，都应接受这个遗产而发扬光大之。判断一个人究竟是不是孙先生的忠实信徒，就看他对这三项宝贵遗产的态度如何而定。

《在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三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11—113页

从孙中山组织革命的小团体起，他就进行了几次反清的武装起义。到了同盟会时期，更充满了武装起义的事迹，直至辛

亥革命，武装推翻了清朝。中华革命党时期，进行了武装的反袁运动。后来的海军南下，桂林北伐和创设黄埔，都是孙中山的战争事业。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45页

孙中山先生远在五四运动以前，就是当时政府的叛徒，他反对了清朝政府，并且推翻了清朝政府。他做的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很对的。因为他所反对的不是反抗帝国主义的政府，而是勾结帝国主义的政府，不是革命的政府，而是压迫革命的政府。

《青年运动的方向》（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62页

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已经五十多年了；至于资本主义外国侵略中国，则差不多有了一百年。……但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才有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从孙先生开始的革命，五十年来，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青年运动的方向》（一九三九年五月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63—564页

这种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

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92—693页

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民主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0页

对孙中山讲得是否太多了?不多。我们要善于引用他,这没有害处,只有好处,列宁也要我们发挥他。他的遗嘱中唤起民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这两条是基本策略,他关于民主讲得最好,要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美国共产党现在把华盛顿、林肯都当作自己的旗帜,我们就有孙中山,而且有一段姻缘,曾经和他合作过。……对党内一些人存在不尊重孙中山的情绪,应该说服。

《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一九四五年三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74—275页

孙中山这个人有个好处,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找我们。鲍罗廷说的话他都听。那时候叫做“以俄为师”,因为他革命三十九年老是失败。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3页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订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黄埔军校，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因而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扫荡了广东的反动势力，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举行了胜利的北伐战争，占领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打败了北洋军阀政府，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斗争。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1035页

孙中山是中国最早的革命民主派，他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派、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乡村农民，实行武装革命，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但是可惜，在他掌握政权的时候并没有主动地实行过土地制度的改革。

《论联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
第3卷第1075页

孙中山这位先生，要把他讲完全。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讲历史辩证法的。孙中山的确做过些好事，说过些好话，我在报告里尽量把这些好东西抓出来了。这是我们应该抓住死也不放的，就是我们死了，还要交给我们的儿子、孙子。但是 we 和孙中山还有区别，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比我们的新民主主义差，新民主主义的确比三民主义更进步，更发展，更完整。现在的新民主主义在将来还会发展得更加完整。我们党内有一种情绪，不喜欢孙中山，这种情绪在相当广大的党员中存在着。认真说，这种情绪是不大健全的，是还没有真正觉悟的表现。这是反映

了内战时期的情绪，那时候，因为环境不同，连孙中山也不要了。那个时期为什么我们不大讲孙中山？因为我们被国民党一下子打倒在地，爬起来也红眼了。蒋介石手里打着孙中山的招牌到处乱杀人，这时候，群众对孙中山也就不喜欢。在十年内战中不要孙中山，这也很难怪，因为我们的力量小得很。在抗战初期，我们的力量也还小，所以那时候我们要孙中山所发生的影响不大，因为人家还看不起我们。将来我们的力量越大，我们就越要孙中山，就越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21—322页

一九一九年，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孙中山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1页

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在十月革命以后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就进入政治斗争，经过曲折的道路，走了二十八年，方才取得了基本的胜利。积二十八年的经验，如同孙中山在其临终遗嘱里所说“积四十年之经验”一样，得到了一个相同的结论，即是：深知欲达到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孙中山和我们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观，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去观察和处理问题，但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怎样和帝国主义作斗

争的问题上，却和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基本上一致的结论。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2页

孙中山主张“唤起民众”，或“扶助农工”。谁去“唤起”和“扶助”呢？孙中山的意思是说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但这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孙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败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在帝国主义时代，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任何真正的革命到胜利，原因就在此。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9—1480页

孙先生以大半辈子的光阴从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中寻找救国真理，结果是失望，转而“以俄为师”，这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吗？显然不是。孙先生和他所代表的苦难的中国人民，一齐被“西方的影响”所激怒，下决心“联俄联共”，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奋斗和拼命，当然不是偶然的。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九四九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515页

中国人民不走帝国主义者的道路，由来已久，不仅由今日开始，一百多年来，林则徐、洪秀全、孙中山等，都没有跟随过帝国主义，我们要继承这种事业和精神，团结广大的人民，坚决地反对帝国主义。

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八日）

清朝，早被推翻了。什么人推？孙中山领导的党和人民一

起推。孙中山力量很小，清朝的官员看不起他。他多次起义总是失败。最后，还是孙中山推翻了清朝。大，不可怕。大的要被小的推翻。小的要变大。推翻清朝以后，孙中山失败了。因为他没有满足人民的要求，比如没有满足人民对土地的要求，对反帝的要求。他也不晓得镇压反革命，当时反革命到处跑。后来，他就失败于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之手。袁世凯的力量比孙中山的大。但还是照这个规律：力量小的，同人民联系的，强；力量大的，反人民的，弱。尔后，孙中山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同我们共产党合作，把袁世凯留下来的军阀系统打败了。

《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一九五六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
第7卷第71—72页

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纪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

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

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

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

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纪念孙中山先生》（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
7卷第156页

孙先生是一个谦虚的人。我听过他多次讲演，感到他有一

种宏伟的气魄。从他注意研究中国历史情况和当前社会情况方面，又从他注意研究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情况方面，知道他是很虚心的。

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纪念孙中山先生》（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57页

我们不崇拜秦始皇、汉武帝，不崇拜唐太宗、宋太祖，也不崇拜孔子。我们只崇拜孙中山，因为他搞辛亥革命有功。

同胡志明的谈话（一九六〇年八月十九日）

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

《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一九六三年九月、一九六四年十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41页

要开一个会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孙中山领导革命的时候并没有共产党嘛，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张推翻满清，也搞武装斗争。保皇党就是康有为、梁启超，两个广东人。孙中山也是广东人。所以，不要忘了孙中山。

同越南劳动党代表团的谈话（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八日）

袁世凯

一九一一年，孙中山成立了民主政府，但只存在三个月。后来袁世凯在北京先当总统，后当皇帝，也只当了三年就倒台了。袁世凯做皇帝对中国人民很有教育意义，大家都骂他。袁世凯欺骗人民，表面说要搞共和国，结果弄得民不聊生。

同阿富汗副首相纳伊姆的谈话（一九五九年九月八日）

章炳麟（章太炎）

章太炎所以坐班房，就是因为他写了一篇文章，叫《驳康有为书》。这篇文章值得一看，其中有两句：“载湉小丑，不辨菽麦”，直接骂了皇帝。这个时候章太炎年纪还不大，大概三十几岁。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三月）

章太炎青年时代写的东西，是比较生动活泼的，充满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精神，以反满为目的。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三月）

宋庆龄

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一九二七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

《给宋庆龄的信》（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41页

鲁迅

我们今天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命以很大的助力。他并不是共产党组织中的一人，然而他的思想、行动、著作，都是马克思主义的。他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尤其在他的晚年，表现了更年青的力量。他一贯地不屈不挠地与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在敌人压迫他、摧残他的恶劣的环境里，他忍受着，反抗着，正如陕北公学的同志们能够在这样坏的物质生活里勤谨地学习革命理论一样，是充满了艰苦奋斗的精神的。陕北公学的一切物质设备都不好，但这里有真理，讲自由，是造就革命先锋分子的场所。

鲁迅是从正在溃败的封建社会中出来的，但他会杀回马枪，朝着他所经历过来的腐败的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的恶势力进攻。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他近年来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与自由而斗争。鲁迅先生的第一个特点，是他的政治的远见。他用望远镜和显微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他在一九三六年就大胆地指出托派匪徒的危险倾向，现在的事实完全证明了他的见解是那样的准确，那样的清楚。

鲁迅在中国的价值，据我看要算是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我们为了永久纪念他，在延安成立了鲁迅图书馆，在延长开办了鲁迅师范学校，使后来的人们可以想见他的伟大。

鲁迅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的斗争精神。刚才已经提到，他在黑暗与暴力的进袭中，是一株独立支持的大树，不是向两旁偏倒的小草。他看清了政治的方向，就向着一个目标奋勇地斗争下去，决不中途投降妥协。有些不彻底的革命者起初是参加斗争的，后来就“开小差”了。比如德国的考茨基、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就是明显的例子。在中国这等人也不少。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最初大家都是左的，革命的，及到压迫来了，马上有人变节，并把同志拿出去献给敌人作为见面礼。鲁迅痛恨这种人，同这种人做斗争，随时教育着训练着他所领导下的文学青年，教他们坚决斗争，打先锋，开辟自己的路。

鲁迅的第三个特点是他的牺牲精神。他一点也不畏惧敌人对于他的威胁、利诱与残害，他一点不避锋芒地把钢刀一样的笔刺向他所憎恨的一切。他往往是站在战士的血痕中，坚韧地反抗着、呼啸着前进。鲁迅是一个彻底的现实主义者，他丝毫不妥协，他具备坚决的心。他在一篇文章里，主张打落水狗。他说，若果不打落水狗，它一旦跳起来，就要咬你，最低限度也要溅你一身的污泥。所以他主张打到底。他一点没有假慈悲的伪君子的色彩。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这条疯狗，还没有被我们打下水，我们要一直打到它不能翻身，退出中国国境为止。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精神，把它运用到全中国去。

综合上述这几个特点，形成了一种伟大的“鲁迅精神”。鲁迅的一生就贯穿了这种精神。所以，他在文艺上成了一个了不起的作家，在革命队伍中是一个很优秀的很老练的先锋分子。我们纪念鲁迅，就要学习鲁迅的精神，把它带到全国各地的抗战队伍中去，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奋斗！

《论鲁迅》（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2—

鲁迅的手与脑均是共产党员的，然而他自始至终不是党员，而是非党布尔什维克。

在陕北公学的讲话（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

我们对艺术应持什么观点？在这个问题上，过去中国有过很大的争论。大家可能知道，徐志摩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银针在幽谷中怎样响法，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一个艺术至上主义者。那时像他这样主张的人很多，他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另一方面是鲁迅先生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论者。他们在艺术论上的争论，有长期的历史，现在不能去细说它。

《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21页

对于艺术工作者来说，掌握语言的能力确是非常重要的。我看鲁迅先生便是研究过大众语言的。你们一定要下一番苦工夫去学习和掌握艺术技巧。

《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25页

鲁迅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他却一生都为着老百姓的利益而奋斗，甚至舌敝唇焦，生肺病而死。所以我们非常尊崇鲁迅。

在抗大纪念“七一”“七七”及突击运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三八年七月九日）

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

过农民斗争之故。

《致周扬》(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七日),《毛泽东文艺论集》第259页

文化“围剿”怎么样呢?敌人的“碉堡”是建筑在学校里、书报杂志上以及社会文教团体里,也大有“稳扎稳打、步步为营”之势。关于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鲁迅先生的杂感,就可以知道。他的抨击时弊的战斗的杂文,就是反对文化“围剿”,反对压迫青年思想的。

《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52页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98页

第三个时期是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七年的新的革命时期。……这一时期,是一方面反革命的“围剿”,又一方面革命深入的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这两种“围剿”,在帝国主义策动之下,曾经动员了全中国和全世界的反革命力量,其时间延长至十年之久,其残酷是举世未有的,杀戮了几十万共产党员和青年学生,摧残了几百万工人农民。从当事者看来,似乎以为共产主义和共产党是一定可以

“剿尽杀绝”的了。但结果却相反，两种“围剿”都惨败了。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这三者都是积极的结果。其中最奇怪的，是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一切文化机关中处于毫无抵抗力的地位，为什么文化“围剿”也一败涂地了？这还不可以深长思之吗？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2页

鲁迅处在黑暗势力统治下面，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用冷嘲热讽的杂文形式作战，鲁迅是完全正确的。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72页

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四二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77页

那个时候，国民党有两种“围剿”，即军事的“围剿”和文化的“围剿”。军事的“围剿”就是反对红军；文化的“围剿”

就是反对新文化，反对包含着革命思想的文学艺术，也就是反对以鲁迅为首的在白区的革命的文化艺术。

《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24—425页

文艺是一支军队，它的干部是文艺工作者。它还要有一个总司令，如果没有总司令，它的方向就会错的。鲁迅、高尔基就相当于总司令，他们的作品，他们说的话，就当作方向的指导。如果普通的文艺工作者没有高级的指导，他的方向就会会错，他就会长期地停留在低级阶段不能提高。

《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31页

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某一点上有独特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鲁迅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都懂，但他不轻视中国的。只在中医和京剧方面他的看法不大正确。中医医死了他的父亲。他对地方戏还是喜欢的。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1页

鲁迅翻译了《死魂灵》、《毁灭》等等，但是他的光彩主要不在这方面，是在创作。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2页

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鲁迅的小说，

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3页

鲁迅不是共产党员，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他用了一番功夫研究，又经过自己的实践，相信马克思主义是真理。特别是他后期的杂文，很有力量。他的杂文有力量，就在于有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我看鲁迅在世还会写杂文，小说恐怕写不动了，大概是文联主席，开会的时候讲一讲。

《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53—254页

你们赞成不赞成鲁迅？鲁迅的文章就不太软，但也不太硬，不难看。有人说杂文难写，难就难在这里。有人问，鲁迅现在活着会怎么样？我看鲁迅活着，他敢写也不敢写。在不正常的空气下面，他也会不写的，但更多的可能是会写。俗话说得好：“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鲁迅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彻底的唯物论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彻底的唯物论者，是无所畏惧的，所以他会写。……鲁迅的时代，挨整就是坐班房和杀头，但是鲁迅也不怕。现在的杂文怎样写，还没有经验，我看把鲁迅搬出来，大家向他学习，好好研究一下。他的杂文写的方面很多，政治、文学、艺术等等都讲，特别是后期，政治讲得最多，只是缺少讲经济的。鲁迅的东西，都是逼出来的。他的马克思主义也是逼着学的。他是书香门第出身，人家说他是“封建余孽”，说他不行，但鲁迅还是写。

《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63页

有人说，几百字、一二千字一篇的杂文，怎么能作分析呢？我说，怎么不能呢？鲁迅不就是这样的吗？分析的方法就是辩证的方法。所谓分析，就是分析事物的矛盾。不熟悉生活，对于所论的矛盾不真正了解，就不可能有中肯的分析。鲁迅后期的杂文最深刻有力，并没有片面性，就是因为这时候他学会了辩证法。列宁有一部分文章也可以说是杂文，也有讽刺，写得也很尖锐，但是那里面就没有片面性。鲁迅的杂文绝大部分是对敌人的，列宁的杂文既有对敌人的，也有对同志的。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77—278页

学习鲁迅。鲁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读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读者共鸣的。

《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55页

我是赞成朱自清的风格。朱自清是清华大学一个教授，他的文章写得好，另一个侧面不好，就是不神气。第一个神气的是鲁迅，他的话是口语。鲁迅的杂感，你看那个《阿Q正传》不是口语？“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什么“儿子打老子”之类都是口语。

在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

鲁迅的战斗方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向他射的箭，统统接过来，抓住不放，一有机会就向射箭的人进攻。人家说他讲话南腔北调，他就出《南腔北调集》。梁实秋说他背叛了旧社会，投降了无产阶级，他就出《二心集》。人家说他的文章用花边框起来，他就出《花边文学》。《申报》的《自由谈》编者受到国民党的压力，发牢骚说，《自由谈》不要谈政治，只准谈风

月，他就出了《准风月谈》。国民党骂他是堕落文人，他的笔名就用隋洛文。他临死时还说，别人死前要忏悔，宽恕自己的敌人，但他对自己的“怨敌”，“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我们要学习鲁迅的这种战斗精神和方法。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一）》（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鲁迅是中国黑暗时代的伟大革命战士、文学战线的领导者。他写的是一首旧体诗，有四句，原诗为：“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这一首诗，是鲁迅在中国黎明前最黑暗的年代里写的，说明他在完全黑暗的统治下看到了光明。

《日本人民的前途是光明的》（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484页

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

《给江青的信》（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71—72页

何香凝

先生一流人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景仰奋兴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数人而已。承志在此甚好，大家都觉得他好，望勿挂念。十年不见先生，知比

较老了些，然心则更年青，这是大家觉得的。

《给何香凝的信》（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512页

蒋介石

蒋介石氏在西安接受张学良杨虎城二将军和西北人民的抗日的要求，首先命令进行内战的军队撤离陕甘两省，这是蒋介石氏转变其十年错误政策的开始。这对于指挥内战、制造分裂、并欲在这次事变中置蒋氏于死地的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的阴谋，给了一个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的失望，已显而易见。蒋氏此种觉悟的表示，可以看作国民党愿意结束其十年错误政策的一种表示。

《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245页

蒋介石代替孙中山，创造了国民党的全盛的军事时代。他看军队如生命，经历了北伐、内战和抗日三个时期。过去十年的蒋介石是反革命的。为了反革命，他创造了一个庞大的“中央军”。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这个基点，他是抓得很紧的。对于这点，我们应向他学习。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

《战争和战略问题》（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45—546页

蒋介石也是这样，他打日本是好的，压迫人民是不好的，在他还打日本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忍一口气，不提打倒蒋介石。蒋介石搞的是半法西斯半封建的资本主义。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结论》（一九四五年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84页

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蒋介石，大家知道，是一个极端残忍和极端阴险的家伙。他的政策是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果然胜利被等来了，这位“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八年来我们和蒋介石调了一个位置：以前我们在山上，他在水边；抗日时期，我们在敌后，他上了山。现在他要下山了，要下山来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24页

此人历来是不知感恩的。蒋介石是怎样上台的？是靠北伐战争，靠第一次国共合作，靠那时候人民还没有摸清他的底细，还拥护他。他上了台，非但不感谢人民，还把人民一个巴掌打了下去，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这段历史同志们都是知道的。这一次抗日战争，中国人民又保卫了他。现在抗日战争胜利了，日本要投降了，他绝不感谢人民，相反地，翻一翻一九二七年的老账，还想照样来干。蒋介石说中国过去没有过“内战”，只有过“剿匪”；不管叫做什么吧，总之是要发动反人民的内战，要屠杀人民。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25页

至于蒋介石呢，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现在这块绊脚石却要出来垄断胜利果实，要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仍然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不许有丝毫的改变。这样就发生了斗争。同志们，这是一场很严重的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29页

蒋介石同我们相反，他完全是依靠美国帝国主义的帮助，把美国帝国主义作为靠山。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这一贯是蒋介石方针的基本点。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32页

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人，他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他将中国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因而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然后，他失魂落魄地拔步便跑，率领一群人，从黑龙江一直退到贵州省。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果然，胜利到来了，他叫人民军队“驻防待命”，他叫敌人汉奸“维持治安”，以便他摇摇摆摆地回南京。只要提到这些，中国人民就知道是蒋介石。蒋介石干了这一切，他是不是人民公敌的问题，是否还有争论呢？争论是有的。人民说：是。人民公敌说：不是。只有这个争论。

《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149页

现在我们对蒋介石的态度和抗战时期有些不同，但不是原则上的不同，在抗战时期我们同他实际上也是斗争多、妥协少。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虽有一些作用，但其妨害也很大。抗战时期，我们对蒋的政策是，把绳子套在他的脖子上拉他同我们一道走。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凡能对我们进攻之处无不进攻。如果我们不坚决抵抗，没有这个准备，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局面。我们在抗战中的主要

同盟军是农民，其次是民族资产阶级。蒋介石在抗战中有某些作用，但比起丘吉尔在英国反德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就不如。

《对中国革命新高潮的说明》（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22页

蒋介石现在的内战政策，不是偶然的，这是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贯反人民政策的必然结果。早在民国十六年（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就忘恩负义地背叛了国共两党的革命联盟，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从此建立独裁统治，投降帝国主义，打了十年内战，造成日寇侵略。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时期，中国共产党以德报怨，协同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释放蒋介石，希望蒋介石悔过自新，共同抗日。但是蒋介石又一次忘恩负义，对于日寇则消极应战，对于人民则积极镇压，对于共产党则极端仇视。前年（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中国人民又一次宽恕蒋介石，要求蒋介石停止已经发动的内战，实行民主政治，团结各党派和平建国。但是毫无信义的蒋介石，在签订停战协定、通过政协决议、宣布四项诺言以后，随即将其全部推翻。人民方面，虽则再三忍让求全，但是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援助之下，决心不顾国家民族的死活，向人民作空前的全面的进攻。从去年（一九四六年）一月停战协定宣布到现在，蒋介石先后动员了二百二十多个正规旅和近百万的杂色部队，向中国人民从日本帝国主义手里用血战夺取过来的解放区，实行大举进攻，先后侵占了沈阳、抚顺、本溪、四平、长春、永吉、承德、集宁、张家口、淮阴、菏泽、临沂、延安、烟台等城市和广大的乡村。蒋军所到之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实行三光政策，同日本强盗的行为完全一样。去年十一月，蒋介石召集了伪国大，宣布了伪宪法。今年三月，

蒋介石驱逐了共产党的代表。今年七月，蒋介石下了反人民的总动员令。对于全国各地反对内战、反对饥饿、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的人民运动，对于工人、农民、学生、市民和公教人员的争生存的斗争，蒋介石的方针就是镇压、逮捕和屠杀。对于国内各少数民族，蒋介石的方针就是实施大汉族主义，摧残镇压，无所不至。在一切蒋介石统治区域，贪污遍地，特务横行，捐税繁重，物价高涨，经济破产，百业萧条，征兵征粮，怨声载道，这样就使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以蒋介石为首的金融寡头，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则集中了巨大的财富。这些财富，都是蒋介石等利用其独裁权力横征暴敛、假公济私而来的。蒋介石为着维持独裁，进行内战，不惜出卖国家权利于外国帝国主义，勾结美国军队留驻青岛等地，从美国招致顾问人员，参加内战的指挥和军队的训练，残杀自己的同胞。内战的飞机、坦克、枪炮、弹药，大批从美国运来。内战的经费，大批从美国借来。蒋介石则以出卖军事基地、出卖空海航权、签订奴役性商约等项比袁世凯卖国行为还要严重多倍的条件，作为酬谢美国帝国主义的礼物。总而言之，蒋介石二十年的统治，就是卖国独裁反人民的统治。到了今天，全国绝大多数人民，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都认识了蒋介石的滔天罪恶，盼望本军从速反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一九四七年十月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36—1237页

孙中山死了，蒋介石起来。在二十二年的长时间内，蒋介石把中国拖到了绝境。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1页

蒋介石背叛孙中山，拿了官僚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专政作为压迫中国平民的工具。这个反革命专政，实行了二十二年，到现在才为我们领导的中国平民所推翻。

《论人民民主专政》（一九四九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78页

有一个蒋介石比较好，是不是？你们觉得有一个好还是没有好？没有蒋介石中国人民就不能进步，就不能团结起来，也不能武装起来。单是马克思主义是不能把中国人民教育过来的，所以我们除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教员以外，请了另外一个教员，这就是蒋介石。噢！这个人在中国可做了很有益的事情，一直到现在还在尽他的历史责任。他的历史任务现在还没有完结，他还在当教员，他很有益处呀！不拿薪水，美国人发薪水给他，我们一个钱都不花，可是他给我们当教员。

《杜勒斯是世界上最好的反面教员》（一九五八年十月二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355页

台湾本来就是中国的，日本人暂时占领了，日本失败后应归还中国。蒋介石失败后跑到台湾，在台湾建立政府。全世界还有许多国家同台湾当局有外交关系。我们反对“两个中国”，蒋介石也反对“两个中国”，我们有一致之处，有共同点。

《不能把台湾问题上的国际问题同国内问题混淆起来》（一九五九年十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90页

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学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

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

《给江青的信》（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第73页

汪精卫

汪精卫，“五四”以前曾慷慨激昂地去杀宣统皇帝的保护人——摄政王。他在那时候是非常英勇的。但是这几天消息不大好，他从河内溜到上海，从上海溜到日本的京城去见日本的天皇，同日本内阁的首相平沼商议事情，讨论“精卫平沼协定”。我们不讲他这个协定里的字有多少，条文有几条，总之，就是“灭亡中国”四个大字。

三十年前的汪精卫，二十年前的康白情、罗家伦、张国焘，他们都很英勇，但是都有一个缺点，就是奋斗比较差，没有“永久奋斗”的精神。

《永久奋斗》（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90页

什么是异党？日本走狗汪精卫的汉奸党是异党，因为它和抗日党派在政治上没有丝毫共同之点，这样的党，就应该限制。……现在汪精卫有三个口号：反蒋、反共、亲日。汪精卫是国共两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敌人。

《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一九三九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89—590页

在抗日战争中，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以汪精卫为代表，已经叛变，已经变成汉奸。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34页

如果有人还想从今日起，再“剿”十年，那就已经是新的“剿共”典型，同旧的多少有点区别。但是这种新的“剿共”事业，不是已经有人捷足先登、奋勇担负起来了吗？这个人就是汪精卫，他已经是大名鼎鼎的新式反共人物了。

《新民主主义论》（一九四〇年一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82页

我们共产党人屡次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灭华方针是坚决的。不管日本掉换什么内阁，它的灭亡中国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基本方针是不会变更的。中国亲日派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汪精卫，看了这种情形，吓得发疯，跪倒在日本面前，订立了日汪卖国条约，把中国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他还要成立傀儡政府，和抗日政府相对立；还要成立傀儡军队，和抗日军队相对立。他对于反蒋近来不大提了，据说已经改为“联蒋”。反共是日汪的主要目的。他们知道共产党抗日最彻底，国共合作则力量更大，他们就用全力分裂国共合作，使两党各自孤立，最好是两党打起来。这样，他们就利用国民党内部的顽固派，到处放火。

《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一九四〇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15页

陈独秀

我们对于陈君，认他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所说的话，头脑稍为清楚的听得，莫不人人各如其意中所欲出。现在的中国，可谓危险极了。……危险在全国人民思想界空虚腐败到十二分。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陈君平日所标揭的，就是这两样。他曾说，我们所以得罪于社会，无非是为着“赛因斯”（科学）和“德谟克拉西”（民主）。陈君为这两件东西得罪了社会，社会居然就把逮捕和禁锢报给他。

《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九一九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305页

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3页

对陈独秀应该承认他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是有功劳的，大体上如同俄国的普列汉诺夫。

《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3页

五四运动有中国最觉悟的分子参加，当时的觉悟分子有陈

独秀、李大钊。在五四运动中有左翼、右翼，陈独秀、李大钊是代表左翼的。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9—290页

北伐胜利，轰轰烈烈。可是这一时期的末尾一段，我们党搞得不好，出了一个陈独秀主义。后来，陈独秀反对我们，搞成托陈取消派。但是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那个时候学习作白话文，听他说什么文章要加标点符号，这是一大发明，又听他说世界上有马克思主义。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我说陈独秀在某几点上，好像俄国的普列汉诺夫，做了启蒙运动的工作，创造了党，但他在思想上不如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陈独秀则不然，甚至有些很不正确的言论，但是他创造了党，有功劳。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德苏战争以后，斯大林在一篇演说里把列宁、普列汉诺夫放在一起，《联共党史》也说到他。关于陈独秀，将来修党史的时候，还是要讲到他。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4页

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就是落后于群众的觉悟程度，不能领导群众前进，而且反对群众前进。

《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一九四八年四月二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320页

当时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抛弃了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

《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32页

开头是陈独秀搞右倾机会主义。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后，他同刘仁静、彭述之那些人，组织了“列宁主义者左翼反对派”，八十一个人发表声明，分裂我们党，没有搞成，他们跑到托洛茨基那一派去了。

《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42页

李大钊

五四运动有中国最觉悟的分子参加，当时的觉悟分子有陈独秀、李大钊。在五四运动中有左翼、右翼，陈独秀、李大钊是代表左翼的。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9—290页

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4页

萧楚女

要自学，靠自己学。萧楚女没有上过学校，不但没有上过洋学堂，私塾也没有上过。我是很喜欢他的。农民运动讲习所教书主要靠他。他是武昌茶馆里跑堂的，能写得很漂亮的文章。

《要自学，靠自己学》（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83页

瞿秋白

瞿秋白同志死去十五年了。在他生前，许多人不了解他，或者反对他，但他为人民工作的勇气并没有挫下来。他在革命困难的年月里坚持了英雄的立场，宁愿向刽子手的屠刀走去，不愿屈服。他的这种为人民工作的精神，这种临难不屈的意志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来的思想，将永远活着，不会死去。瞿秋白同志是肯用脑子想问题的，他是有思想的。他的遗集的出版，将有益于青年们，有益于人民的事业，特别是在文化事业方面。

《为〈瞿秋白文集〉题词》（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28页

李立三

在一九三〇年的立三路线时期，李立三同志不懂得中国内战的持久性，因此看不出中国内战发展中“围剿”又“围剿”、打破又打破的这种长期反复的规律（那时已有湘赣边界的三次

“围剿”，福建的两次“围剿”等），因此在红军还幼小的时代就命令红军去打武汉，命令全国举行武装起义，企图使全国革命迅速胜利。这就犯了“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195页

立三路线的错误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急性病是在小资产阶级十分广大的社会中的一种必然性，不是个人的偶然现象，而是社会现象。无产阶级的社会存在也是一种必然性，无产阶级思想是革命热情与实际精神相结合。无产阶级对小资产阶级是用改造与感化的方法，引导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进入社会主义。对小资产阶级不能采用急躁的消灭的方针。

《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一九四四年三月五日），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93页

李立三在大革命时代也有功劳。

《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3页

内战时期犯“左”倾错误的李立三同志，第一次大革命之前，曾和少奇同志一起在安源做过工人运动，后来五卅运动中在上海也起了很大作用，也有功劳。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4页

我们还有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就是李立三。他们当时的主要错误，就是教条主义，硬搬外国的经验。我们党清算了他

们的错误路线，真正找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的道路。因此，才有可能在第四个时期，在蒋介石进攻我们的时候，把蒋介石打倒，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33页

一九二八年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以后，李立三神气起来了。从一九三〇年六月到九月，他搞了三个多月的立三路线。他主张打大城市，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他搞的那一套我不赞成。到六届三中全会，李立三就倒台了。

《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43页

王明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的“左”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使得土地革命战争受到了极端严重的损失，得到了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不能战胜敌人反而丧失了根据地削弱了红军的结果。这个错误是在一九三五年一月扩大的中央政治局的遵义会议时纠正过来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85页

如何帮助王明同志改正错误？许多同志都讲了，王明同志的发言很不好。他昨天后半段的发言，比较有些进步。问题是他现在失掉了主动性，是被动的，其原因在于他没有自我批评，不愿意承认错误及其错误的基本点。他的“主动性”还停留在四中全会及十二月会议上，而那些是错误的，已经受到了批判，那是一条完整的错

误路线，“左”的右的都有。在中国产生这样一条错误路线，恐怕是不可避免的，这是社会现象在党内的反映。

至于王明是否有个人野心，这一点他是不承认的，我认为也没有十分必要一定要他承认。但他承认了个人主义，这就是说不以人民利益为第一，而以个人利益为第一了。其实，个人而成了主义，这也就很可观了。个人野心，他觉得不好承认，实际上内战时期及抗战时期两次错误路线的总司令是他，虽然他并没有总书记、总司令的称号，名称只是什么委员等等，但那是没有关系的。实质是他企图按照他的面貌来改造党，这在内战时期表现为小资产阶级的形态，在抗战时期表现为资产阶级的形态。这种现象，在世界上别的国家也发生过。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上一部分人有这种思想，王明是他们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内战时期的错误路线，讲完全一点是王明、博古路线，简单一点称王明路线也可以。抗战时期的错误路线，总司令就是王明，是他单人独枪担当的。立三路线的总司令是李立三，而不是向忠发，虽然向忠发是总书记。实际情况就是如此。

王明路线在内战时期是“左”，在抗战时期是右，但它的阵容起了一些变化。王稼祥、洛甫在遵义会议就已觉悟了，六中全会后博古等也觉悟了，经过整风和路线学习，这些同志更觉悟了，而王明仍未觉悟。七大时，王明写过声明书，但两个月后他说那是被迫写的，想不承认。直到这次发言，他还未觉悟。他昨天发言的后半段说了些老实话，我们欢迎他这一点进步，看他以后怎样做。

党内曾经有些人想按照他们的口味来改造党，但没有达到目的；可是，要是他们达到了目的，那就坏了。这个问题的性质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整风运动提高了同志们的嗅觉，缩小了教条主义的市场。有人说，这是阴谋，是要取

而代之。其实，这不是阴谋，而是阳谋，也是要取而代之。王明对党内“左”、“中”、“右”一齐打，打了“左”派（反立三路线）打“中”派（反周恩来、瞿秋白的“调和路线”），打了“中”派打“右”派，把老人打得差不多了。许多人讲篡党、篡军、篡政，是确有其事的，是从四中全会开始的，不是从五中全会开始的，一直到王明在共产国际，到他从苏联回国，到六中全会。六中全会，一滴酒精使微生物缩小了。两个钦差大臣，一个是王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来传达了所谓“国际路线”；一个是王稼祥，一九三八年夏天回来也传达了国际路线，但他传达的和王明的“国际路线”不同。……但是王明的头脑里，仍有微生物，还没有消毒。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63—265页

我们党有这样一段历史。……党内出现过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一连搞了七八年。当然，这中间也有正确的时候，例如一九二七年八七会议以后有一个短时期，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有一个短时期，六届三中全会以后有一个短时期。三中全会也有缺点。这三次“左”倾路线都跟共产国际有关系，特别是王明路线。第一次“左”倾路线同共产国际的关系不是很大；第二次“左”倾路线从共产国际学了一些东西，但那个总的路线算是中国自己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就不同了，连六届四中全会的决议案都是俄国人给写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长达四年之久，造成的损失最大，革命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以上。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50—51页

斯大林有正确的地方，也有不正确的地方。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就是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他主张打倒一切，否认同资产阶级的团结。在社会上是打倒一切，在党内则闹不团结。后来他的右倾错误也是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这一点我们没有公布，因为我们自己也有责任。

《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65页

特别是王明，他在七次大会的时候，为了应付起见，写了一个书面声明，承认中央路线正确，承认七大政治报告，愿意服从大会的决定。但是，后头我跟他谈话，他又翻了，他忘记那个东西了。他回去一想，第二天又说，我写过这个东西，是承认了错误的。我说，你那个时候承认，如果现在不承认了，你也可以撤回去。他又不撤回去。后头，在二中全会上，我们希望他讲一讲他自己的错误，但是他讲别的东西，只讲我们这些人怎么好怎么好。我们说，你这些话可以不讲，你讲一讲你王明有些什么错误，他不干。他答应在二中全会以后写反省。但是后头他又说，他有病，用不得脑筋，一动手写，他那个病就来了。也许他是故意这样，那也难说。他一直害病，这次大会也不能出席。是不是选举他呢？还有李立三同志选不选？谅解李立三的人比较多一些，谅解王明的人就比较少。像小平同志讲的，我们如果选举他们，意义还是跟七次大会选举他们一样。七次大会的时候，就有很多代表不愿意选他们（不仅是王明，还有相当几个同志）。当时我们说，如果采取这个方针，我们就要犯错误。我们不选举犯错误的人，为什么叫做犯错误呢？因为那是照他们的办法办事。他们的办法，就是不管你是真犯错误，假犯错误，一经宣布你是机会主义，就不要了。如果我们也照

这样办，我们就是走他们的路线，就是走王明路线，或者立三路线。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93—94页

过去的王明路线，实际上就是斯大林路线，它把当时我们根据地的力量搞垮了百分之九十，把白区几乎搞垮了百分之百。……中国第一次王明路线搞了四年，对中国革命的损失最大。王明现在在莫斯科养病，我们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他是我们党的教员，是教授，无价之宝，用钱都买不到的。他教育了全党不能走他的路线。

这是我们第一次吃斯大林的亏。

第二次是抗日战争的时候。王明是可以直接见斯大林的，他能讲俄文，很会捧斯大林。斯大林派他回国来。过去他搞“左”倾，这次则搞右倾。在和国民党合作中，他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一切都服从国民党。他提出了六大纲领，推翻我们党中央的十大纲领，反对建立抗日根据地，不要自己有军队，认为有了蒋介石，天下就太平了。我们纠正了这个错误。蒋介石也“帮助”我们纠正了错误。王明是“梳妆打扮，送上门去”，蒋介石则是“一个耳光，赶出大门”。蒋介石是中国最大的教员，教育了全国人民，教育了我们全体党员。他用机关枪上课，王明则用嘴上课。

《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20—121页

从内战开始到遵义会议这一时期，即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我们党发生了三次“左”倾路线，而在一九三一年至一

九三四年的王明路线最为厉害。当时苏联反托派胜利了，斯大林的地位开始巩固，在理论上又战胜了德波林学派，而共产国际远东部实际上又是米夫在负责，他的作用太大了。这些条件使教条主义得以形成。中国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差不多都是在苏联受到影响的，当然也不是所有去莫斯科的人都是教条主义者。当时去苏联的许多人当中，有些人是教条主义者，有些人不是；有些人联系实际，有些人不联系实际，只看外国。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67页

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了，我们同国民党停战，同日本帝国主义打仗。这个时候，我们的同志可以公开到国民党地区的城市里去了。原来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王明又犯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他先是执行了共产国际的最“左”的方针，这时他又执行了最右的方针。他也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教育了我们党。

《我们党的一些历史经验》（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33页

王明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发表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批评李立三“左”得还不够，非把根据地搞光就不舒服，结果基本上搞光了。从一九三一年到一九三四年，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

《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43页

张国焘

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六年的张国焘右倾机会主义，这个错误发展到破坏了党和红军的纪律，使一部分红军主力遭受了严重的损失；然而由于中央的正确领导，红军中党员和指挥员战斗员的觉悟，终于也把这个错误纠正过来了。所有这些错误，对于我们的党，我们的革命和战争，当然是不利的，然而终于被我们克服，我们的党和我们的红军是从这些错误的克服中锻炼得更加坚强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九三六年十二月），《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1卷第185页

共产党的干部政策，应是以能否坚决地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纪律，和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有独立的工作能力，积极肯干，不谋私利为标准，这就是“任人唯贤”的路线。过去张国焘的干部政策与此相反，实行“任人唯亲”，拉拢私党，组织小派别，结果叛党而去，这是一个大教训。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

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27页

由于巴西会议和延安会议（反对张国焘路线的斗争是从巴西会议开始而在延安会议完成的）反对了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得全部红军会合一起，全党更加团结起来，进行了英勇的抗日斗争。……张国焘的机会主义，则是革命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其内容是他的退却路线、军阀主义和反党行为的综合。只有克服了它，才使得本质很好而且作了长期英勇斗争的

红军第四方面军的广大的干部和党员，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统制之下获得解放，转到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面来。……至于张国焘的组织路线，则是完全离开了共产党的一切原则，破坏了党的纪律，从小组织活动一直发展到反党反中央反国际的行为。中央对于张国焘的罪恶的路线错误和反党行为，曾经尽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去克服它，并企图挽救张国焘本人。但是到了张国焘不但坚持地不肯改正他的错误，采取了两面派的行为，而且在后来实行叛党，投入国民党的怀抱的时候，党就不得不坚决地开除他的党籍。这一处分，不但获得了全党的拥护，而且获得了一切忠实于民族解放事业的人们的拥护。共产国际也批准了这一处分，并指出：张国焘是一个逃兵和叛徒。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0—531页

在反倾向的斗争中，反对两面派的行为，是值得严重地注意的。因为两面派行为的最大的危险性，在于它可能发展到小组织行动；张国焘的历史就是证据。阳奉阴违，口是心非，当面说得好听，背后又在捣鬼，这就是两面派行为的表现。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532页

三十年前的汪精卫，二十年前的康白情、罗家伦、张国焘，他们都很英勇，但是都有一个缺点，就是奋斗比较差，没有“永久奋斗”的精神。

《永久奋斗》（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90页

张国焘是向党中央闹独立性的，结果闹到叛党，做特务去了。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21页

在长征的路上，一、四方面军汇合以后，张国焘搞分裂，另立中央，没有成功。长征前红军三十万，到陕北剩下二万五千人。中央苏区八万，到陕北只剩下八千人。张国焘搞分裂，不愿意到陕北去。那时不到陕北，没有出路嘛，这是政治路线问题。那时我们的路线是正确的。如果不到陕北，那怎么能到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华中地区、东北地区呢？怎么能在抗日战争时期搞那么多根据地呢？到了陕北，张国焘逃跑了。

《在外地巡视期间同沿途各地负责人谈话纪要》（一九七一年八月—九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43—244页

王稼祥

王稼祥同志是犯过错误的，在四中全会前后犯过路线错误，此后也犯过若干错误。但是，他是有功劳的。他的功劳主要有这样几件：

第一，四中全会以后，中央派了一个代表团到中央苏区。代表团有三个人，任弼时同志、王稼祥同志、顾作霖同志。第一次反“围剿”结束后，他们就来了。王稼祥同志参加了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围剿”的战争。在当时，我们感觉到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任弼时、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反对“削萝卜”的主张就不会那样顺利。所谓“削萝卜”，就是主张不打，开步走，走到什么地方碰到一个“小萝卜”，就削它一下。那时，

我们主张跟敌人打，钻到敌人中间去，寻找敌人的弱点，打击敌人。主张“削萝卜”的人反对我们，说我们的办法是“钻牛角”。当时，如果没有代表团，特别是王稼祥同志，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虽然以后在苏区的两个大会上，即中央苏区党代表大会和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王稼祥同志是有错误的，但上面所说的那一点，却是他的功劳。王稼祥同志是在第四次反“围剿”末期负伤的。

第二，大家学习党史，学习路线，知道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义会议，一次是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会。

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但是，大家要知道，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两位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当然，遵义会议参加者还有好多别的同志，酝酿也很久，没有那些同志参加和赞成，光他们两个人也不行；但是，他们两个人是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的，作用很大。从长征一开始，王稼祥同志就开始反对第三次“左”倾路线了。

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共

产国际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在苏联养病后回国带回来的，由王稼祥同志传达的。

第三，此后，王稼祥同志就一直在中央工作。虽然他在工作中也有缺点，如在政治工作中就有很大缺点，但是他也做了很多好事，如一九三九年关于巩固党的决定，一九四一年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一九四二年关于党的领导一元化的决定、对待原四方面军干部态度问题的指示及建军的四号指示等，都是他起草的。增强党性的决定是他与王若飞同志合作，在他领导之下起草的；建军的四号指示是他与叶剑英同志合作，在他领导之下起草的。

至于他有些缺点，如对干部的关系，这是大家知道的。但上面这些是大家不大知道的，是中央内部的事，我今天在这里必须讲一讲。

他虽然犯过路线错误，也有缺点，但他是有功的。

《关于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问题》(一九四五年六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424—426页

两个钦差大臣，一个是王明，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来传达了所谓“国际路线”；一个是王稼祥，一九三八年夏天回来也传达了国际路线，但他传达的和王明的“国际路线”不同。王稼祥带回来国际文件，成了一滴酒精，滴下去，微生物缩小了。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总结》(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64页

陈毅

关于抗战时期皖南、苏南的工作，陈毅同志是执行中央路

线的，不能与项英同志一概而论。无论是内战时期与抗战时期，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

《陈毅在内战和抗战时期是有功劳的》（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五日），
《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104页

徐特立

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一九二七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奋斗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什么“老”，什么“身体精神不行”，什么“困难障碍”，在你面前都降服了。而在有些人面前呢？却做了畏葸不前的借口。你是懂得很多而时刻以为不足，而在有些人本来只有“半桶水”，却偏要“淌得很”。你是心里想的就是口里说的与手里做的，而在有些人他们心之某一角落，却不免藏着一些腌腌臢臢的东西。你是任何时候都是同群众在一块的，而在有些人却似乎以脱离群众为快乐。你是处处表现自己就是服从党的与革命的纪律之模范，而在有些人却似乎认为纪律只是束缚人家的，自己并不包括在内。你是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而在有些人却是出风头第一，休息第一，与自己第一。你总是拣难事做，从来也不躲避责任，而在有些人则只愿意拣轻松事做，遇到担当责任的关头就躲避了。所有这些方面我都是佩服你的，愿意继续地学习你的，也愿意全党同志学习你。

《为徐特立六十岁生日写的贺信》（一九三七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77—478页

吴玉章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地有益于广大群众，一贯地有益于青年，一贯地有益于革命，艰苦奋斗几十年如一日，这才是最难最难的啊！

我们的吴玉章老同志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今年六十岁了，他从同盟会到今天，干了四十年革命，中间颠沛流离，艰苦备尝，始终不变，这是很不容易的啊。从同盟会中留下到今天的人，已经不多了，而始终为革命奋斗，无论如何不变其革命节操的更没有几个人了。要这样做，不但需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而且需要艰苦奋斗的精神，不然就不能抵抗各种恶势力恶风浪，例如死的威胁，饿饭的威胁，革命失败的威胁等等，我们的吴玉章同志就是经过这样无数的风浪而来的。因此，我们要学习他的各方面的好处，但特别要学习他对于革命的坚持性。这是最难能可贵的一件事，这是我们党的光荣，这是中国革命的光荣。

《吴玉章寿辰祝词》（一九四〇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61—262页

刘志丹

刘志丹同志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

《在中央党校第二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一九四三年八月八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60页

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

为刘志丹陵园纪念碑题写的碑文（一九四三年），《解放日报》1943年5月6日

张学良

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

《给张学良的信》（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49页

冯玉祥

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当着革命军向武汉前进，以至打到武汉、打到河南的时候，发生了唐生智、冯玉祥参加革命的事情。冯玉祥于一九三三年在察哈尔还曾经和共产党一度合作，建立了抗日同盟军。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146页

冯先生连年为民主事业奔走呼号，此次归国，对于中国人民民主事业，定多贡献，今忽遭此意外，实为国家民族之损失。

同朱德悼念冯玉祥逝世的唁电（一九四八年九月七日），《毛泽东年谱（一八九三——一九四九）》下卷第342—343页

邓宝珊

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

《致邓宝珊》（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50页

傅作义

日寇西侵，国难日亟。先生统率师旅捍卫边疆，今夏小试锋芒，已使敌人退避三舍。观乎报载以死继之之言，跃然民族英雄之抱负，四万万人闻之，神为之王，气为之壮，诚属可贺可敬。

《致傅作义》（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82页

北平和平解决的又一个原因，是近二十万的国民党军队除少数几个死硬分子外，从兵士们到将军们，一概不愿打了。天津失守后的傅作义将军代表了这种情绪，下了出城改编的决心。不管傅作义过去如何反动透顶，华北人民如何恨之入骨，这件事总算是做得对的。只要他以后向有利于人民事业的方面走，愿意向人民低头，在军队改编问题上予以协助，不起阻碍作用，而不再企图高踞在人民头上压迫人民，人民解放军就有理由向人民说明，赦免他的战犯罪，并给他以新的出路。

《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一九四九年二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51页

北平问题的和平解决，贵将军与有劳绩。贵将军复愿于今后站在人民方面，参加新民主主义的建设事业，我们认为这是很好的，这是应当欢迎的。

《对傅作义通电的复电》（一九四九年四月二日），《毛泽东文集》第5卷第272页

邹韬奋

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

悼念邹韬奋逝世的题词（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题词墨迹选》第76页

闻一多

先生为民主而奋斗，不屈不挠，可敬可佩。

《给李公朴、闻一多家属的唁电》（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三日、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57页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别了，司徒雷登》（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95—1496页

李公朴

先生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今为和平民主而遭反动派毒手，是为全国人民之损失，抑亦为先生不朽之光荣。

《给李公朴、闻一多家属的唁电》（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三日、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157页

章士钊

章士钊没有过反共言论。他在重庆帮过我忙，请我吃饭。我问怎么办？他说：三十六计。

在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一日）

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

《给章士钊的信》（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417页

章士钊先生所著《柳文指要》上、下两部，二十二本，约百万言，无事时可续续看去，颇有新义引人入胜之处。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又辟桐城而颂阳湖，讥帖括而尊古义，亦有可取之处。惟作者不懂唯物史观，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以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

全书》),他日可能引起历史学家用唯物史观对此书作批判。如有此举,亦是好事。此点我已告章先生,要他预作精神准备,也不要求八十五龄之老先生改变他的世界观。

《致康生》(一九六五年八月五日),《毛泽东文艺论集》第336页

蔡元培

二十年后忽见我敬爱之子民先生,发表了崭新不同于一般新旧顽固党之簇新议论,先生当知见之而欢跃者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无数量人也!从同志从朋友称述先生同情抗日救国事业,闻之而欢跃者,更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全民族之诚实儿女,毫无疑义也。

《给蔡元培的信》(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43—444页

柳亚子

看了柳亚子先生题画,如见其人,便时乞为致意。像这样有骨气的旧文人,可惜太少,得一二个拿句老话说叫做人中龙凤,只不知他现时的政治意见如何?

《给何香凝的信》(一九三七年六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512页

广州别后,十八年中,你的灾难也受得够了,但是没有把你压倒,还是屹然独立的,为你并为中国人民庆贺!“云天倘许同忧国,粤海难忘共饮茶”,这是你几年前为我写的诗,我却至今做不出半句来回答你。

《致柳亚子》(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44页

诗及大示诵悉，深感勤勤恳恳诲人不倦之意。……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

《给柳亚子的信》（一九四五年十月四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9页

黄炎培

黄炎培、江问渔等所领导的职业教育社在江、浙两省知识分子中有颇大影响，因为黄、江等不仅在文化教育界有地位，而且是经营工商业的民族资本家著名代表。

《注意吸收民族资本家及其代表参加根据地建设》（一九四〇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00页

朱自清

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许多曾经是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的人们，在美国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国民党反动派面前站起来了。闻一多拍案而起，横眉怒对国民党的手枪，宁可倒下去，不愿屈服。朱自清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别了，司徒雷登》（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495—1496页

我是赞成朱自清的风格的。朱自清是清华大学一个教授，他的文章写得好，另一个侧面不好，就是不神气。

在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

徐志摩

徐志摩先生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诗要如银针之响于幽谷”，银针在幽谷中怎样响法，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是一个艺术至上主义者。那时像他这样主张的人很多，他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另一方面是鲁迅先生所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论者。他们在艺术论上的争论，有长期的历史，现在不能去细说它。艺术至上主义是一种艺术上的唯心论，这种主张是不对的。

《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21页

胡适

伯达此文及老墨哲学诸文引了章，梁，胡，冯^①诸人许多话，我不反对引他们的话，但应在适当地方有一批判的申明，说明他们在中国学术上有其功绩，但他们的思想和我们是有基本上区别的，梁基本上是观念论与形而上学，胡是庸俗唯物论与相对主义，也是形而上学，章，冯……（章，冯二家我无研究），等等。若无这一简单的申明，则有使读者根本相信他们的危险。

《关于〈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给张闻天的信》（一九三九年二月二十日、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64页

^①指章炳麟、梁启超、胡适、冯友兰。

再讲一个中国人的议论。此人在台湾，名为胡适。他讲，据他看，这个“革命军”（就是叛乱分子）灭不了。他说，他是徽州人，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占领了安徽，但是没有去徽州。什

么道理呢？徽州山太多了，地形复杂。日本人连徽州的山都不敢去，西藏那个山共产党敢去？我说，胡适这个方法论就不对，他那个“大胆假设”是危险的。他大胆假设，他推理，说徽州山小，日本人尚且不敢去，那末西藏的山大得多、高得多，共产党难道敢去吗？因此结论：共产党一定不敢去，共产党灭不了那个地方的叛乱武装。现在要批评胡适这个方法论，我看他是要输的，他并不“小心求证”，只有“大胆假设”。

《关于西藏平叛》（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44页

郭沫若

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的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庆贺。

《致郭沫若》（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21页

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

《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一九四四年一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88页

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

《给郭沫若的信》（一九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27页

要读历史。我赞成郭沫若先生那个古史研究。读历史的人不等于是守旧的人。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黎锦熙、杨昌济

先生^①及死去了的怀中^②先生，都是弘通广大，最所佩服。

《致黎锦熙信》（一九二〇年六月七日），《毛泽东早期文稿》第478页

①指黎锦熙。

②怀中，即杨昌济。

陶行知

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悼念陶行知逝世的题词（一九四六年八月），《毛泽东题词墨迹选》第91页

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忽闻逝世，实为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

悼念陶行知的唁电（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五日），《解放日报》1946年8月11日

萧军

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

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

《给萧军的信》（一九四一年八月二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64页

赫拉克利特

第二个伟大哲学家是赫拉克利特。他的大功，在发现了辩证法大纲。他是唯物论者，和他以前的哲学家同样，主张宇宙是水、火、气、土四种原素构成的。而他则谓火是基本的原素，这是他的唯物一元论。然而他的主要功绩，是在发现万物不断变化与变化由于内在的对立斗争这两个辩证法的根本思想。首先，他由宇宙是物质构成的这种见解，到达于万物普遍变化的主张。他说：“土灭生火，火灭生气，气灭生水，水灭生土”。又说：“宇宙是永久之火”，用以比喻万物的不断变化。又说：“人不能再渡同一河流”，也是比喻自然与社会的变动不居。据他看，宇宙在时间空间上都是无限的，不断变化着。不但如此，他还指出了变化的原因。他认为，万物由于内在对立物的斗争，而由一种形态转为另一种形态。一切都是在矛盾中进行的。他说：“斗争是万物之父”，“斗争随处都有，真理就是不和”。这样，他用一般的方法表示辩证法的思想，这是人类认识史上的第一次，所以他有辩证法父亲之称。

《读李达著〈社会学大纲〉一书的批注》（一九三八年一月——三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20—222页

苏格拉底

作为第一个同唯物论斗争而提倡了观念论的道德论与认识论的代表——苏格拉底，其积极意义是提起了从来没有被提过的道德论与认识论，把哲学引进了社会与思维两个领域，在道德论上提起了知识与行为关系的辩证法，在认识论上提起了普遍与个别关系的辩证法。这些是他的大功绩。然而他的思想是反动的与观念论的。他的道德论，主张知识决定行为，认求知是到达道德的手段，恶是无知的产物，善是知的产物，这有其一面的真理。但第一、他所谓知，就是了解祖先的风俗习惯，因而主张复古，排斥新知，主张传统的贵族主义，排斥新兴的民主主义，所以他是反动的。第二、他只知知识给与行为的影响，而不知知识的来源在行为（实践），行为是决定知识的基础，又是检查知识的标准，所以他是观念论的。他的认识论，主张认识的目的，在于从感性的个别到达于理性的普遍，这是对的。但他认为后者是前者的基础，这就是观念论了。

《读李达著〈社会学大纲〉一书的批注》（一九三八年一月——三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27—230页

苏格拉底注重伦理学，他不是唯物主义者，也不是辩证法的理论家，但是他注意研究伦理学和宪法，同敌人作斗争。他的一辈子过得不开心，结果死得也很惨。

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的谈话（一九六四年二月九日）

德谟克里特

德谟克里特的大功绩，是他的原子论的物质观。虽然是很原始的与机械的唯物论，却对后世的原子论学说给了重大的影响，发生了哲学指导科学的作用。他反对观念论哲学，提倡了完全唯物论哲学。他认物质的构成，都是由于极微小的不可入的微粒子即原子；而其运动，是由这种原子与空虚的空间相结合。不可入的原子运动于空虚的空间之中，原子们互相为种种的分离与结合，因而组成物质世界的多样性。他把物质、人类、灵魂、思想，都看作本质相同而形态互异的诸原子的种种结合。这样，他对万物都一一给以相当的特殊的形态。他认原子和空虚以外没有任何东西的存在，完全否定了神。他认运动是与物质不能分离的，而空虚是物质运动的条件。他的原子与空虚的关系，表现有与非有的统一。他的这种物质运动观，虽是机械的力学的运动，但他看成物质变化的根本法则，看成宇宙的后果必然性，他已企图在物质本身之中探求其自己运动的原因了。

《读李达著〈社会学大纲〉一书的批注》（一九三八年一月——三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22—224页

柏拉图

柏拉图的思想是客观观念论，其全部体系都是反动的与错误的。他认只有理念是永久的真实的存在，世界与人存在以前，理念就存在了的。世界与人的思维都是理念的产物，是理念的影子。这是将真实世界的头脚颠倒了彻底的观念论体系。由此，他就造出理念的论理学，主张认识的对象是理念而不是感

觉世界，认识的方法是依据空洞无物的概念以从事于思维。但是柏拉图的积极作用，也就在他的理念论理学。因为在他的理念论理学中，表示了概念对于思维的作用。这个概念在思维中的作用的指出，在人类认识史上有开创的意义。

《读李达著〈社会学大纲〉一书的批注》（一九三八年一月——三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30—231页

柏拉图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他写了一本书叫《理想国》，他发展了唯心主义，后来的亚里士多德批评了他的唯心主义。

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的谈话（一九六四年二月九日）

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是一位大学者，比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水平高。他对于自然科学的许多方面有研究，批评了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创立了形式逻辑。欧洲在中世纪时，对亚里士多德是很崇拜的。在比较近代的德国，康德的老师就是亚里士多德。

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的谈话（一九六四年二月九日）

鸠摩罗什

你们晓不晓得鸠摩罗什？他在后秦时出生在西域龟兹国，后来到长安，住了十二年，死在长安。中国大乘佛教的传播，他有功劳。西藏过去有无《金刚经》？这个经的汉译本就是鸠摩罗什和他的弟子们翻译的。

《同班禅额尔德尼等的谈话》（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209页

释迦牟尼

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是代表当时在印度受压迫的人讲话的。他主张普渡众生，为了免除众生的痛苦，他不当王子，创立了佛教。

《同达赖喇嘛的谈话》(一九五五年三月八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 114 页

释迦牟尼原来也是贵族，是个王子，但他和人民一起搞改革，得到人民的拥护，因而人民就纪念他。

《接见西藏地区参观团、西藏青年参观团负责人等的谈话》(一九五五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 126 页

从前释迦牟尼是个王子，他王子不做，就去出家，和老百姓混在一块，作了群众领袖。

《同班禅额尔德尼等的谈话》(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 209 页

克伦威尔

人民是懂事情的。终究还是人民决定问题。正因为克伦威尔代表人民，所以国王才被迫让步。

他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

在历史上克伦威尔是有威信的。

《同蒙哥马利的谈话》(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192 页

康德

康德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天文学中的星云学是他创立的。此人还搞了十二个范畴,这十二个范畴都是对立的统一,但他不能解释这些问题。他说事物的本质是不可知的,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黑格尔的先生就是康德。

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的谈话(一九六四年二月九日)

黑格尔

生活在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初期的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对于辩证法曾经给了很重要的贡献,但是他的辩证法却是唯心的辩证法。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3页

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他大大地发展了唯心主义的辩证法。他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先生,也是列宁的先生,也是我们的先生。

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威尔科克斯的谈话(一九六四年二月九日)

海克尔

海克尔写的一本书^①里头有相当丰富的材料,他不承认自己是唯物主义者,实际上是唯物主义者。

《同斯诺的谈话》(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406页

^①指海克尔的《宇宙之谜》。

华盛顿

华盛顿是代表美国人民的。

《同蒙哥马利的谈话》（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
第8卷第193页

华盛顿所起的革命作用，我们应当承认，他当时起了很先进的作用，是很进步的。还有林肯也一样。

《同斯诺的谈话》（一九六五年一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
411页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主义只能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马克思不能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就预先具体地认识帝国主义时代的某些特异的规律，因为帝国主义这个资本主义最后阶段还未到来，还无这种实践，只有列宁和斯大林才能担当此项任务。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之所以能够作出他们的理论，除了他们的天才条件之外，主要地是他们亲自参加了当时的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实践，没有这后一个条件，任何天才也是不能成功的。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
287页

直到无产阶级运动的伟大的活动家马克思和恩格斯综合了人类认识史的积极的成果，特别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合理部分，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

理论，才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3—304页

马克思不但参加了革命的实际运动，而且进行了革命的理论创造。他从资本主义最单纯的因素——商品开始，周密地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结构。商品这个东西，千百万人，天天看它，用它，但是熟视无睹。只有马克思科学地研究了它，他从商品的实际发展中作了巨大的研究工作，从普遍的存在中找出完全科学的理论来。他研究了自然，研究了历史，研究了无产阶级革命，创造了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这样，马克思就成了一个代表人类最高智慧的最完全的知识分子，他和那些仅有书本知识的人有根本的区别。马克思在实际斗争中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概括了各种东西，得到的结论又拿到实际斗争中去加以证明，这样的工作就叫做理论工作。

《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16—817页

在第三十次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会议上，我曾经提到《联共党史》结束语第二条对马克思、恩格斯就批评过。恩格斯有个别原理是错误的，应该抛弃，拿新的原理来代替它。比如，恩格斯主张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采取议会制共和国的形式，但是列宁根据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认为采取苏维埃共和国的形式比较好。可见恩格斯的看法是错误的。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当时都曾经说过，英国的革命可以采取和平革命的方式，并且估计英国革命将会早日到来。马克思、恩格斯都很想革命快

点胜利，但实际上革命却总是没有胜利，又有什么办法。古语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看这句话要改一下。人，包括圣贤在内，总是有过的，有过必改就好了。

《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一九五四年九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
第6卷第347页

唯物主义并不等于马列主义，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就已经有唯物主义，资产阶级曾经发挥了唯物主义，例如法国的唯物主义。辩证法也不是马克思发现的，例如德国过去有唯心辩证法。马克思是改造了这两种东西。他把唯物主义改造成为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联系的、发展的。为什么会有发展呢？因为有矛盾存在。他把辩证法改造成为唯物辩证法。唯物辩证法是正确的反映客观世界的辩证法，这与德国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不同。至于马克思、列宁关于个别问题的结论做得不合适，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因为受当时条件的限制，例如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在西方几个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结论。

《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一九五九年二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页

我们党里有人说，学哲学只要读《反杜林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就够了，其他的书可以不必读。这种观点是错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个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一九〇五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一九〇八年的《唯物主义和

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死了，又需要斯大林写出《论列宁主义基础》和《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9页

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40页

列宁

我们是赞成列宁的吗？如果是的话，就得依照列宁的精神去工作。不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不是无的放矢，不看对象；也不是自以为是，夸夸其谈；而是要照着列宁那样地去做。

《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42页

布尔什维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和方法，创造了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个布尔什维主义，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从前没有过，这是列宁所领导的党在俄国创造的。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造了一个布尔什维主义，用这个理论和策略搞了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斯大林接着又搞了三个五年计划，创造了社会主义的苏联。

《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一九四二年三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07页

列宁主义学说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那些地方发展了呢?一,在 worldview, 就是唯物论和辩证法方面发展了它;二,在革命的理论、革命的策略方面,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政党等问题上发展了它。列宁还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说。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开始,革命中间就有建设,他已经有了七年的实践,这是马克思所没有的。我们学的就是这些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列宁的著作,特别是革命时期的著作,生动活泼。他说理,把心交给别人,讲真话,不吞吞吐吐,即使和敌人斗争,也是如此。

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四月六日)

列宁在从事研究工作的后期,指出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帝国主义阶段,看出了资本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有可能引起世界大战,有可能首先在一国或几国爆发革命,在东方国家中也有这种可能。

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研究了这个问题,并且得出结论: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首先在一个国家取得胜利。当然,他没有预料到在什么国家首先取得胜利。

《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至今未变,个别结论可以改变》(一九五九年二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页

列宁在一九一七年二月以后的一段时间内，曾经指出俄国存在用和平手段夺取政权的可能性。当时俄国有两个政权并存，列宁根据那时特有的一些条件，设想布尔什维克通过在苏维埃中取得多数来夺取政权。后来到了七月就不行了，资产阶级政府用武力镇压群众的革命运动，于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决定准备武装起义的方针，用暴力夺取政权。

在十月革命以前，列宁对全党讲得很清楚，写了许多文章，说明革命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不用暴力是不行的。他极力反对孟什维克主张通过议会斗争进行革命的论调。

《同澳共总书记夏基的谈话》(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95页

没有哲学家头脑的作家,要写出好的经济学来是不可能的。马克思能够写出《资本论》，列宁能够写出《帝国主义论》，因为他们同时是哲学家，有哲学家的头脑，有辩证法这个武器。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40页

斯大林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的朋友。中国人民对于斯大林的敬爱，对于苏联的友谊，是完全出于诚意的，任何人的挑拨离间，造谣污蔑，到底都没有用处。

《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58页

斯大林同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对于世界

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作了极其杰出和极其广泛的贡献。中国人民在反抗压迫者的艰苦斗争中，深切地感觉到斯大林同志的友谊的重要性。

《在莫斯科庆祝斯大林七十寿辰大会上的祝词》（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册第195页

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和斯大林同志三十多年来不断的关怀、指导和支持，是完全分不开的。在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后，斯大林同志和在他领导下的伟大的苏联人民和苏联政府，对中国人民的建设事业，又给予了慷慨无私的援助。斯大林同志对于中国人民这样伟大的深厚的友谊，中国人民永远感念不忘。

《关于悼念斯大林逝世的命令和唁电》（一九五三年三月六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第90页

他骄傲了，不谨慎了，他的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对于某些重大问题做出了错误的决定，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

《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六年四月二日、四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1页

斯大林在他一生的后期，愈陷愈深地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违反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的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斯大林在这些问题上，陷入了主观性和片面性，脱离了客观实际状况，脱离了群众。

《对〈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五六年四月二日、四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62页

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〇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2页

斯大林有正确的地方，也有不正确的地方。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就是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他主张打倒一切，否认同资产阶级的团结。在社会上是打倒一切，在党内则闹不团结。后来他的右倾错误也是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这一点我们没有公布，因为我们自己也有责任。斯大林大体上是七分功劳、三分错误。如果说他是八分功劳、两分错误，同志们不会通过；说他是六分功劳、四分错误，也不会被通过。但否认他的正确的东西是不对的。

斯大林问题不是个别人、个别国家的事情，而是整个国际无产阶级事业中的事情。对斯大林的错误，大家心里都不会好

过。《人民日报》编辑部的那篇文章是由我们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经过六七次的修改才发表的。

《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65页

什么事情都不能过分，过分了就要犯错误。斯大林基本上是正确的，是有很大功绩的，但是他犯了很大的错误，做了很多错事。斯大林就是过分了。镇压反革命分子本来是好事，但是过了分，把革命同志也看做反革命分子，就是一个大错误。

《不要迷信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一切都是好的》(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0页

斯大林为什么犯错误呢？就是在一部分问题上他的主观跟客观实际不相符合。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90页

苏联发生的错误，像斯大林的错误，它的位置是什么呢？是部分性质的，暂时性质的。虽然听说有些什么东西有二十年了，但总是暂时的、部分的，是可以纠正的。苏联那个主流，那个主要方面，那个大多数，是正确的。俄国产生了列宁主义，经过十月革命变成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建设了社会主义，打败了法西斯，变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我们说过，对斯大林要三七开。他们的主要的、大量的东西，是好的，有用的；部分的东西是错误的。

《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91页

苏联可以公开批评斯大林，我们公开批评就不那么好。我们应该和苏联搞好关系。也许过一些时候可能公开提出。世界上的事总是这样，事实就是事实。那时第三国际做了许多错事。第三国际前后两段还好，中间有一大段不好：列宁在世的时候好，后来季米特洛夫负责的时候也较好。中国第一次王明路线搞了四年，对中国革命的损失最大。王明现在在莫斯科养病，我们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他是我们党的教员，是教授，无价之宝，用钱都买不到的。他教育了全党不能走他的路线。

这是我们第一次吃斯大林的亏。

第二次是抗日战争的时候。王明是可以直接见斯大林的，他能讲俄文，很会捧斯大林。斯大林派他回国来。过去他搞“左”倾，这次则搞右倾。……

第三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以后。斯大林和罗斯福、丘吉尔开会，决定把中国全部都给美国，给蒋介石。当时从物质上和道义上，尤其是道义上，斯大林都没有支持我们共产党，而是支持蒋介石的。决定是在雅尔塔会议上作出的。斯大林把这件事告诉了铁托，在铁托自传中有这段谈话。

……

第四次，就是说我是半个铁托或准铁托。不仅苏联，就是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国家中，都有相当一些人曾经怀疑中国是否真正的革命。

《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20—122页

斯大林提倡辩证唯物主义，有时也缺乏唯物主义，有点形而上学；写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但做的常是历史唯心主义。他有些做法走极端，个人神化、使人难堪等等，都不是唯物主

义的。

我在见到斯大林之前，从感情上说对他就不怎么样。我不太喜欢看他的著作，只看过《论列宁主义基础》、批判托洛茨基的一篇长文章、《胜利冲昏头脑》等。他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文章我更不爱看。他和列宁不同，列宁是把心给别人，平等待人，而斯大林则站在别人的头上发号施令。他的著作中都有这种气氛。我见到他以后就更不高兴了，在莫斯科的时候和他吵得很厉害。斯大林有脾气，有时冲动起来，讲一些不大适当的话。

我曾写过一些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一共三篇：一篇是在延安庆祝他六十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的祝词，第三篇是他死后《真理报》要我写的。我向来不愿祝贺人家，也不愿人家祝贺我。但到莫斯科去祝寿，不歌颂他，还能骂他不成？他死后，苏联需要我们的支持，而我们也要支持苏联，就写了那篇歌功颂德的文章。这不是对斯大林个人的，而是对苏联党的。延安的那篇文章，我抛掉了个人感情，把他当做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那篇文章还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不是出于内心意愿，而是出于需要。人的生活就是这样矛盾的，感情上不愿写，但理智上不这样不行。

《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25—126页

对斯大林的批评，我们人民中有些人还不满意。但是这种批评是好的，它打破了神化主义，揭开了盖子，这是一种解放，是一场“解放战争”，大家都敢讲话了，使人能想问题了。这也是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

《吸取历史教训，反对大国沙文主义》（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26—127页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是在研究资产阶级的东西,研究德国的古典哲学、英国的古典经济学、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并且跟它们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的。斯大林就比较差一些。比如在他那个时期,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说成是德国贵族对于法国革命的一种反动。作这样一个结论,就把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全盘否定了。他否定德国的军事学,说德国人打了败仗,那个军事学也用不得了,克劳塞维茨的书也不应当读了。

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他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第一条讲事物的联系,好像无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联系呢?就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各种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侧面。他第四条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又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93—194页

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他以为他

那个天下稳固了。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

在斯大林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有矛盾。他把斯大林搞得那么不像样子，我们不赞成。因为搞得那么丑嘛！这就不是你一国的事，这是各国的事。我们天安门前挂斯大林像，是符合全世界劳动人民愿望的，表示了我们同赫鲁晓夫的基本分歧。斯大林本身，你也要给他三七开嘛！斯大林的成绩算它七分，错误算它三分。这也未必见得准确，错误也许只有两分，也许只有一分，也许还稍微多一点。总而言之，斯大林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这一点，我们同赫鲁晓夫有不同意见。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

斯大林领导苏联党做了伟大的工作，他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但是他在一个长时间内发展了形而上学，损害了辩证法。个人崇拜就是形而上学，任何人不能批评他。我看苏联的四十年是一个辩证法的过程。列宁的辩证法，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观点，这些观点见之行动，达于极点，势必走到它的反面，再来一个辩证法。

《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33页

中国的革命是违背斯大林的意志而取得胜利的，“真洋鬼子”不许革命。党的七大提出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建立新中国。抗日时期我们同王明的争论，从一九三七年开始，到一九三八年八月为止，我们提十大纲领，王明提六大纲领。按

照王明的做法，即斯大林的做法，中国革命是不能成功的。我们革命胜利了，斯大林又怀疑我们不是真正的革命，我们也不辩护。抗美援朝战争一打，这种怀疑才消除了。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71页

斯大林这位同志有点老爷味道，辩证法不甚懂，唯物论也不甚懂，未用到实际工作中，相互关系没有搞好，相当僵硬。

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谈话（一九五八年四月六日）

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与季诺维也夫是一样的。

《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86页

苏联的经验要学。普遍真理要遵守，这就是《莫斯科宣言》里所写的那九条。要学习所有的经验，正确的经验要学，错误的经验也要学。错误的经验是：斯大林的形而上学、教条主义。他不完全是形而上学，有一部分辩证法，但大部分是形而上学。你们叫做个人崇拜，是一个东西。斯大林很爱摆架子。

《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87页

但在我们的关系中，也有过问题，主要与斯大林有关。有三件事：第一，两次王明路线。王明是斯大林的后代。第二，不要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第三国际已经解散了，还下命令，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国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然而我们并没有灭亡。第三，我第一次去莫斯科时，斯大林、莫

洛托夫、贝利亚就向我进攻。

《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88页

你回去以后说了我们的好话。你对斯大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斯大林还是怀疑。只是到朝鲜战争时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和其他各国兄弟党对我们的怀疑。

这种怀疑是必然的:“第一,你们反王明;第二,不要你们革命,你们非革命不可;第三,到莫斯科要斯大林订条约,要收回中长路,那么神气。”在莫斯科,科瓦廖夫招待我,费德林当翻译。我发了脾气,拍了桌子。我说,我在这儿有三个任务:一、吃饭;二、睡觉;三、拉屎。

《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88页

斯大林支持王明路线,使我们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当革命处在关键的时候,他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革命胜利后,他又不信任我们。他大吹自己,说什么中国的胜利是在他的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一定要彻底打破对他的迷信。斯大林对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

《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93页

斯大林后来也很好了,中苏订了条约,帮助了朝鲜战争,搞了一百四十一项。当然,这不都是他个人的功绩,是整个苏共中央的功绩。因此,我们不强调斯大林的错误。

《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394页

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它的社会生产也不能不断增长。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21页

把斯大林丑化,除了其他原因以外,一个重要原因是,斯大林坚决同帝国主义斗争。他们把自己和斯大林区别开来,是要得到帝国主义的赏识。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党的文献》1992年第5期

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但是,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就是在苏联,也是如此。我们同苏共领导人的争论,是同一部分人的争论。我们希望说服这一部分人,以利于推进革命事业。这就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对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六三年九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369—370页

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错误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训，使苏联共产党人和各国共产党人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这也是有益的。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只要是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

《对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六三年九月），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371页

倍倍尔、卢森堡等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远不能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

《对二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稿的批语和修改》（一九六三年九月），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371页

普列汉诺夫

普列汉诺夫以为主客统一带有与实践活动无关的直观性，这是因为他不了解辩证法的本质（对立统一法则），所以不能在辩证法上了解认识论，他的反历史主义是同费尔巴哈一样的。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一书的批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九三七年四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0—21页

普列汉诺夫在俄国做过很好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普列汉诺夫以后变成了孟什维克，陈独秀是中国的孟什维克。德苏战争以后，斯大林在一篇演说里把列宁、普列汉诺夫放在一起，《联共党史》也说到他。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4页

季米特洛夫

季米特洛夫同志是个好同志，他帮过我们很多忙。抗日战争中，他帮助我们抵抗了右倾机会主义。这个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就是过去“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人王明。

同新共主席威廉斯的谈话（一九六三年九月九日）

德波林

德波林不知主客相互渗透是在社会实践中实现的，只有机械的性质（外的、直观的），没有辩证的性质，从实践分离了认识。

《读西洛可夫、爱森堡等著李达、雷仲坚译〈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一书的批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一九三七年四月），《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21页

从苏联哲学界批判德波林学派的文章中看出，德波林学派有这样一种见解，他们认为矛盾不是一开始就在过程中出现，须待过程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出现。那末，在那一时间以前，过程发展的原因不是由于内部的原因，而是由于外部的原因了。这样，德波林回到形而上学的外因论和机械论去了。拿这种见解去分析具体的问题，他们就看见在苏联条件下富农和一般农民之间只有差异，并无矛盾，完全同意了布哈林的意见。在分析法国革命时，他们就认为在革命前，工农资产阶级合组的第三等级中，也只有差异，并无矛盾。德波林学派这类见解是反马克思主义的。他们不知道世界上的每一差异中就已经包含着矛

盾，差异就是矛盾。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06—307页

高尔基

我们都知道高尔基，他的生活经验丰富极了，他熟悉俄国下层群众的生活和语言，也熟悉俄国其他阶层的实际情形，所以才能写出那样多的伟大作品。

《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25页

至于学历短的人，我可以举高尔基为例，他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文学“博士”，但他没有进过小学，也没有进过中学，大学更没有进过，他写的文章却是天下第一。

《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一九三九年五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84页

文艺是一支军队，它的干部是文艺工作者。它还要有一个总司令，如果没有总司令，它的方向就会错的。鲁迅、高尔基就相当于总司令，他们的作品，他们说的话，就当作方向的指导。

《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31页

高尔基很高，但他和下面有着广泛的联系。他和农村有通讯联系。他看到一个十三岁小孩的信非常欢喜，改了几个字把它发表出来，在《海上述林》中便有。高级文艺工作者也只有

和普通文艺工作者，和人民发生联系，才有出路，他才有群众，才有牛奶吃，这是老百姓给他的，不然便是空的。

《文艺工作者要同工农兵相结合》(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31页

伏罗希洛夫

伏罗希洛夫同志是苏维埃国家和苏联共产党的杰出领导人之一。几十年来，他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为苏联国防力量的增强和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进行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并且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伏罗希洛夫同志是中国人民最亲密的同志和朋友。

《欢迎、欢送伏罗希洛夫的四次讲话》(一九五七年四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426页

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

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

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

他怕东欧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

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

《关于国际形势的讲话提纲》(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601页

赫鲁晓夫现在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十三个国家中，支持他的并没有占多大的多数。罗马尼亚就同他不一致，波兰也只能算半个支持。他是要控制别人，像美国人一样。他要人家搞单一经济，这行不通，罗马尼亚不干，古巴也在同他吵。

《赫鲁晓夫的日子不好过》（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58页

杜勒斯

杜勒斯比较有章程，是美国掌舵的。这个人是个想问题的人，要看他的讲话，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要翻英文字典。杜勒斯是真正掌舵的，省委要指定专人看《参考资料》。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协作区主任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三十日）

美国的政治掮客杜勒斯，爱管闲事，想从国共两党的历史纠纷这件事情中间插进一只手来，命令中国人做这样，做那样，损害中国人的利益，适合美国人的利益。就是说，第一步，孤立台湾；第二步，托管台湾。如不遂意，最毒辣的手段，都可以拿出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再告台湾同胞书》（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27页

去年，我们学了杜勒斯的“战争边缘政策”，杜勒斯当了我们的先生。他的“战争边缘政策”是对着我们的，我们也用“战争边缘政策”对付他们。

《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共产党领导人的谈话》（一九五九年三月三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9页

尼赫鲁

尼赫鲁是个什么人呢？他是印度资产阶级的中间派，同右派有区别。整个印度的局势，我估计是好的。那里有四亿人民，尼赫鲁不能不反映四亿人民的意志。

《世界上有人怕鬼，也有人不怕鬼》（一九五九年五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51页

戴高乐

我们对戴高乐有两方面的感觉：第一，他还不错；第二，他有缺点。

说他还不错是因为他有勇气同美国闹独立性。他不完全听美国的指挥棒，他不准美国在法国建立空军基地，他的陆军也由他指挥而不是由美国指挥。

法国在地中海的舰队原来由美国指挥，现在他也把指挥权收回了。这几点我们都很欣赏。

另一方面他的缺点很大。他把他的军队的一半放在阿尔及利亚进行战争，使他的手脚被捆住了。

《同蒙哥马利的谈话》（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90页

获悉夏尔·戴高乐将军不幸逝世，谨对他，反法西斯侵略和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的不屈战士，表示诚挚的悼念和敬意。

《悼念戴高乐逝世的唁电》（一九七〇年十一月十一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151页

纳赛尔

西方国家骂纳赛尔总统是个野心家，是个希特勒，说他想统治阿拉伯世界。但是我们认为，纳赛尔总统是亚非地区的民族英雄，因此帝国主义才不喜欢他。纳赛尔总统的做法很聪明，他有时硬，有时软，有时用一种很和平的办法。这次和“五国委员会”的会谈，他就用很和平的声调把他们送回去了。

《中国人民支持埃及收回苏伊士运河》（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七日），
《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248—249 页

尼克松

我欢迎尼克松上台。为什么呢？他的欺骗性也有，但比较地少一点，你信不信？他跟你来硬的多，来软的也有。

《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436 页

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

《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
《毛泽东文集》第 8 卷第 436 页

蒙哥马利

英国有个上议院议员，就是蒙哥马利元帅，他就反对北大西洋条约中美国人来称霸。他反对加拿大同美国关系太密切。我那次同他说你去找戴高乐将军。那是在一九六一年他第二次访

华时，大概他没有去，他是保守党。我问他，持你这种意见的只有你一个人吗？他说，不，还有人。他坚决反对美国在欧洲称霸，他并不是共产党员。

《中法之间有共同点》（一九六四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74页

斯诺

斯诺先生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他一生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将永远活在中国人民心中。

《悼念斯诺逝世的唁电》（一九七二年二月十六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289页

斯特朗

献给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进步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

《献给斯特朗的花圈上的挽词》（一九七〇年四月二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89页

杜波依斯

杜波依斯博士是我们时代的一位伟人。他为黑人和全人类的解放进行英勇斗争的事迹，他在学术上的卓越成就，和他对中国人民的真挚友谊，将永远留在中国人民的记忆里。

《悼念杜波依斯逝世的电报》（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第357页

柯棣华

印度友人柯棣华大夫远道来华，援助抗日，在延安华北工作五年之久，医治伤员，积劳病逝，全军失一臂助，民族失一友人。柯棣华大夫的国际主义精神，是我们永远不应该忘记的。

悼念柯棣华的挽词(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题词墨迹选》第55页

白求恩

白求恩同志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五十多岁了，为了帮助中国的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列宁主义认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要拥护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无产阶级要拥护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世界革命才能胜利。白求恩同志是实践了这一条列宁主义路线的。我们中国共产党员也要实践这一条路线。……

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每个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从前线回来的人说到白求恩，没有一个不佩服，没有一个不为他的精神所感动。晋察冀边区的军民，凡亲身受

过白求恩医生的治疗和亲眼看过白求恩医生的工作的，无不为之感动。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真正共产主义者的精神。

白求恩同志是个医生，他以医疗为职业，对技术精益求精；在整个八路军医务系统中，他的医术是很高明的。这对于一班见异思迁的人，对于一班鄙薄技术工作以为不足道、以为无出路的人，也是一个极好的教训。

我和白求恩同志只见过一面。后来他给我来过许多信。可是因为忙，仅回过他一封信，还不知他收到没有。对于他的死，我是很悲痛的。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至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纪念白求恩》（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59—660页

马丁·路德·金

最近，美国黑人牧师马丁·路德·金突然被美帝国主义者暗杀。马丁·路德·金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但美帝国主义者并没有因此对他宽容，而是使用反革命的暴力，对他进行血腥的镇压。这一件事，深刻地教训了美国的广大黑人群众，激起了他们抗暴斗争的新风暴，席卷了美国一百几十个城市，是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显示了在两千多万美国黑人中，蕴藏着极其强大的革命力量。

《支持美国黑人抗暴斗争的声明》（一九六八年四月十六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577页

三、文献、著作

望厦条约

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自从一八四〇年帮助英国人进行鸦片战争起，直到被中国人民轰出中国止，应当写一本简明扼要的教科书，教育中国的青年人。美国是最早强迫中国给予治外法权的国家之一，这即是白皮书上提到的中美两国有史以来第一次签订的一八四四年的望厦条约。就是在这个条约里，美国除了强迫中国接受五口通商等事而外，强迫中国接受美国人传教也是一条。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

《“友谊”，还是侵略？》（一九四九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
第2版第4卷第1505—1506页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这个约法很简单，据说起草时也很仓卒，从起草到通过只有一个月。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九五四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5—326页

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只有全面的民族抗战才能彻底地战胜日寇。然而要实现全面的民族抗战，必须国民党政策有全部的和彻底的转变，必须全国上下共同实行一个彻底抗日的纲领，这就是根据第一次国共合作时孙中山先生所手订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精神而提出的救国纲领。

中国共产党以满腔的热忱向中国国民党、全国人民、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提出彻底战胜日寇的十大救国纲领。中国共产党坚决相信，只有完全地、诚意地和坚决地执行这个纲领，才能达到保卫祖国战胜日寇之目的。否则，因循坐误，责有攸归；全国丧亡，嗟悔无及。

《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54页

共产党在卢沟桥事变之后，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这个十大纲领，符合于马克思主义，也符合于真正革命的三民主义。这是现阶段中国革命即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初步的纲领，只有实行了它，才能挽救中国。一切和这个纲领相抵触的东西，如果还要继续下去，就会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369页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个决议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而且是全党性质的，同全国人民有关联的，对全党与全民负责的。哪些政策或者其中的哪些部分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如果讲得合乎事实，在观

念形态上再现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就对今后的斗争有利益，对今后党和人民有利益。正确和错误的标准自然是马克思主义，但人民利益同样是标准。人民对于各党派的情形并不很了解，但懂得根据他们的政策来作判断。国民党致力国民革命凡五十年了，其中做了些好事，但做了更多的坏事，所以人民不喜欢它。我们做了好事，但也犯了些错误。现在的决议就是说这些问题，所以是关系于全国人民的。

这个决议有两个问题：做不做？如何做？不做就是怕犯错误。看趋势是要做，但决议现在还有缺点，还需要修改，所以今天也只要求基本通过。我想决议的基本思想是不错的，党内的小资产阶级思想需要纠正，使革命不受损失。至于各个历史问题的叙述是否完全正确，那就不一定了。我们现在只能准备在二三十年后来看，这个决议还是功大过小，那就很好了。

《对〈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说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82页

我们在这个短短的历史决议案中，要把二十四年的历史都写进去，那就更不容易。自然我们还不是修党史，而是主要讲我们党历史上的“左”倾错误，讲党史上一种比较适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与一种有些适合但有些不适合于中国人民利益的路线的斗争，无产阶级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这个问题经过了几年的酝酿，现在比较成熟了，所以写出决议案把它解决了。至于抗战时期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成熟，所以不去解决它。这个历史决议案，在将来来看，还可能有错误，但治病救人的方针是不会错的。

历史决议案上的问题，是关系到多数人的问题还是少数人的问题？我说是关系到多数人的问题，关系到全党和全国人民

的问题。所以我们要谦虚谨慎，不要骄傲急躁。这是多数人的问题，也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少数人的问题是容易解决的，比如提名字，提上一两个人的名字，那并不难，但多数人的问题并不是那样容易解决的。我们这次写历史决议案是很谨慎的。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工作方针》（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296—297页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

中美商约是不平等条约，准许美国人在中国随便购置房屋、地产，建工厂，开商店，美国船只可以到中国内河航行。以前日本人在“二十一条”中曾要求在中国的一部分——满洲做到这些事情，结果遭到全中国人民的反对。

《同三位西方记者的谈话》（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05页

我们公开表示将来一定要废弃，解放区现在就没有实行这一条约。对于中美商约，我们表示反对，十一月四号是中国新的国耻纪念日，这个商约应该废止，另订平等商约。

《同三位西方记者的谈话》（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05页

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签订的中美商约，是要把中国变为美国的殖民地，这不会因美军撤出中国而发生变化。

《对中国革命新高潮的说明》（一九四七年二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4卷第219—220页

蒋介石政府所长期施行的极端反动的财政经济政策，现在

被空前的卖国条约即中美商约所加强了。在中美商约的基础上，美国的独占资本和蒋介石的官僚买办资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控制着全国的经济生活。其结果，就是极端的通货膨胀，空前的物价高涨，民族工商业日益破产，劳动群众和公教人员的生活日益恶化。这种情形，迫使各阶层人民不得不团结起来为救死而斗争。

《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一九四七年五月三十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4卷第1225—1226页

共同纲领

新政协讨论通过我们提出的《共同纲领》，是我们同资产阶级直接交锋的开始。资本家想要我们只搞农业，由他们搞工商业和交通运输，这怎么行？

《同绥远负责人的谈话》（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4—15页

我们有伟大而正确的《共同纲领》以为检查工作、讨论问题的准则。《共同纲领》必须充分地付之实行，这是我们国家现时的根本大法。

《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四日、二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77页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在

国际上我们可以有更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

《准备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一九五〇年一月二日、三日），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8页

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废除旧约，重订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准备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一九五〇年一月二日、三日），
《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40页

我们曾经指出，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和团结国际友人是巩固革命胜利的两个基本条件。这次缔结的中苏条约和协定，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

《缔结中苏条约和协定的重大意义》（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一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31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我们的政府做了一件重要的工作，签订了中苏条约。这件工作对于我们国家，有重大的意义。全国人民对此都有所表示。在座的同志们中间，今天有许多人说了话，都说是有伟大的意义的。我们是处在一种什么情况之下订这个条约呢？就是说，我们打胜了一个敌人，就是国内的反动派，把国外反动派所扶助的蒋介石反动派打倒了。国外反动派，在我们中国境内，也把他赶出去了，基本上赶出去了。但是世界上还有反动派，就是我们国外的帝国主义。国内呢，还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有朋友……。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我们

同苏联的友谊，应该在一种法律上，就是说在条约上，把它固定下来，用条约把中苏两国的友谊固定下来，建立同盟关系……。帝国主义者如果准备打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好了一个帮手。这个条约是爱国主义的条约。同志们刚才提到这一点，这是对的。这个条约又是国际主义的条约，它是国际主义的。

《缔结中苏条约和协定的重大意义》（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一日），《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132 页

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新的中苏条约，巩固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一方面使我们能够放手地和较快地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一方面又正在推动着全世界人民争取和平和民主反对战争和压迫的伟大斗争。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毛泽东文集》第 6 卷第 67 页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不但对新中国的建设有了极大的帮助，而且在反对侵略、维护远东及世界和平与安全上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一周年给斯大林的贺电》（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二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2 册第 123 页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一个伟大的和平条约，是中苏两国间伟大友谊的标志。五年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个条约在促进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方面的伟大作用，今后的生活 and 实践将更加显示出这个条约的巨大力量和无限光辉。

《毛泽东等祝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五周年的电报》（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二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5 册第 37 页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缔结，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它对于中苏两国的繁荣和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的事业，已经发挥并且还将继续发挥巨大的影响。

《毛泽东等祝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周年的电报》（一九六〇年二月十三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27页

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根据中苏两国人民传统的革命友谊和团结对敌的共同愿望而签订的。这个条约符合中苏两国人民、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伟大的中苏同盟的巩固和加强，有利于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有利于确保我们两国的共同安全，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共同事业。

《毛泽东等祝贺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十五周年的电报》（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三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第333页

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现在，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和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在友好基础之上，经过多次商谈，已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这个协议是符合于西藏民族和西藏人民的利益，同时也符合于全中国各民族人民的利益。从此，西藏地方政府和西藏人民在伟大祖国大家庭中，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得以永远摆脱帝国主义的羁绊和异民族的压迫，站起来，为西藏人民自己的事业而努力。

《给达赖喇嘛的信》（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170页

第一个五年计划

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实现党的总路线的一个重大的步骤。这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应该根据实际经验，认真地讨论这个计划草案，使它的内容能够比较妥当，而成为切实可行的计划。

《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五年三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90页

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不是正确?我赞成这种意见,就是说,从前四年的情况可以看得清楚,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本正确。至于错误,确实有,这也是难免的,因为我们缺少经验。……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限额以上的建设项目,一部分是苏联帮我们设计的,大部分是我们自己设计的。

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

这个宪法草案所以得人心,是什么理由呢?我看理由之一,就是起草宪法采取了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广大群众的意见相结合的方法。这个宪法草案,结合了少数领导者的意见和八千多人的意见,公布以后,还要由全国人民讨论,使中央的意见和全国人民的意见相结合。这就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领导和广大积极分子相结合的方法。过去我们采用了这个方法,今后也要如此。一切重要的立法都要采用这个方法。这次我们采用了这

个方法，就得到了比较好的、比较完全的宪法草案。

在座的各位和广大积极分子为什么拥护这个宪法草案呢？为什么觉得它是好的呢？主要有两条：一条是总结了经验，一条是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

第一，这个宪法草案，总结了历史经验，特别是最近五年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它总结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革命的经验，总结了最近几年来社会改革、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和政府工作的经验。这个宪法草案也总结了从清朝末年以来关于宪法问题的经验，从清末的“十九信条”起，到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到北洋军阀政府的几个宪法和宪法草案，到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一直到蒋介石的伪宪法。这里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我们这个宪法草案，主要是总结了我国的革命经验和建设经验，同时它也是本国经验和国际经验的结合。我们的宪法是属于社会主义宪法类型的。我们是以自己的经验为主，也参考了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宪法中好的东西。……我们的宪法是新的社会主义类型，不同于资产阶级类型。我们的宪法，就是比他们革命时期的宪法也进步得多。我们优越于他们。

第二，我们的宪法草案，结合了原则性和灵活性。原则基本上是两个：民主原则和社会主义原则。我们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的民主，而是人民民主，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人民民主的原则贯串在我们整个宪法中。另一个是社会主义原则。我国现在就有社会主义。宪法中规定，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原则性。要实行社会主义原则，是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一天早晨一切都实行社会主义呢？这样形式上很革命，但是

缺乏灵活性，就行不通，就会遭到反对，就会失败。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九五四年六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5—326页

我们的宪法草案公布以后，将会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用宪法这样一个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使全国人民有一条清楚的轨道，使全国人民感到有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可走，就可以提高全国人民的积极性。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九五四年六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8页

我们的宪法有我们的民族特色，但也带有国际性，是民族现象，也是国际现象的一种。跟我们同样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的国家很多，人口在世界上占多数，我们有了一个革命的宪法，人民民主的宪法，有了一条清楚的明确的和正确的道路，对这些国家的人民会有帮助的。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九五四年六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9页

我们的这个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还不是完全社会主义的宪法，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我们现在要团结全国人民，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和应当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这个宪法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写的。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一九五四年六月），《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29—330页

屈原《天问》

《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

关于哲学问题的谈话（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

李斯《谏逐客书》

李斯的《谏逐客书》，有很大的说服力。那时候各国内部的关系，看起来是领主和农奴的关系，每个家族都有自己的战车、武士。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六）》（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司马迁《史记》

像《史记》这样的著作和后来人对它的注释，都很严格、准确。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六）》（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贾谊《治安策》

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原》、《鹏鸟》二赋不阅。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固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

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

《致田家英》（一九五八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39页

枚乘《七发》

此篇早已印发，可以一读。这是骚体流裔，而又有所创发。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据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你看，《七发》的气氛，不是有颇多的批判色彩吗？“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一开头就痛骂上层统治阶级的腐化。“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这些话一万年还将是真理。现在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无论是知识分子，党、政、军工作人员，一定要做些劳动，走路、游水、爬山、广播体操，都是在劳动之列，如巴甫诺夫那样，不必说下放参加做工、种地那种更踏实的劳动了。

《骚体有民主色彩，属浪漫主义流派》（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文艺论集》第201—202页

“客曰：今如太子之病，可无药石、针刺、灸疗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说而去也，不欲闻之乎？”指出了要言妙道，这是本文的主题思想。此文首段是序言。下分七段，说些不务正业而又新奇可喜之事，是作者主题的反面。文好。广陵观潮一段，达到了高峰。第九段是结论，归到要言妙道。于是太子高兴起来，“忽然汗出，霍然病已”。用说服而不用压服的方法，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见效甚快。这个法子，有点像我们的“处理从

宽”。首尾两段是主题，必读。如无兴趣，其余可以不读。

《骚体有民主色彩，属浪漫主义流派》（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毛泽东文艺论集》第 202 页

枚乘，苏北淮阴人，汉文帝时为吴王刘濞的文学侍从之臣。他写此文，是为给吴国贵族们看的。后来“七”体繁兴，没有一篇好的。《昭明文选》所收曹植《七启》，张协《七命》，作招隐之词，跟屈、宋、贾、枚唱反调，索然无味了。

《骚体有民主色彩，属浪漫主义流派》（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毛泽东文艺论集》第 202—203 页

陈寿《三国志·张鲁传》

大约有一千七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以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张鲁的祖父创教人张陵，一名张道陵，就是江西龙虎山反动透顶的那个张天师的祖宗，《水浒传》第一回描写了龙虎山的场面。三国时代的道教是遍于全国的、群众运动的。在北方有天公将军张角三兄弟最为广大的革命的群众运动，他们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苍天，汉朝统治阶级。黄天，农民阶级。于吉在东吴也有极大的群众运动，是那时道教的一派。张道陵、张鲁是梁、益派。史称这派与北方派的路线基本相同。其后，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

脱贫困，丰衣足食。在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助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从天公将军张角到天王洪秀全。宋朝的摩尼教，杨么、钟相，元末的明教、红军，明朝的徐鸿儒、唐赛儿、李自成，清朝的白莲教、拜上帝教（太平天国）、义和团，其最著者。我对我国历史没有研究，只有一些零星感触。对上述性质的分析，可能有错误。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是就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张角、张鲁、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儿、李自成、朱元璋、洪秀全等等）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

《读〈三国志集解〉批语》（卷八《魏书·张鲁传》），《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43—147页

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张陵（一称张道陵，其流风余裔经千年转化为江西龙虎山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极端反人民的张天师道，《水浒传》第一回有洪太尉误走魔鬼戏极神气的描写，一看使人神旺，同志们看过了吧？）、张衡、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米道。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

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读〈三国志集解〉批语》(卷八《魏书·张鲁传》)，《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48—151页

裴松之注《三国志》

李贤贤于颜师古远甚，确然无疑。裴松之注三国，有极大的好处，有些近于李贤，而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爱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此之谓欤？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章太炎说，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英豪巨眼，不其然乎？

《读〈后汉书〉批语》(卷一《光武帝纪》)，《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29—130页

范晔《后汉书》

《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

《读〈后汉书〉批语》，《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31页

酈道元《水经注》

我看《水经注》作者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不到处跑怎么能写得那么好？这不仅是科学作品，也是文学作品。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

慧能《六祖坛经》

我不大懂佛经，但佛经也是有区别的，有上层人的佛经，也有劳动人民的佛经。如唐代六祖（慧能）的佛经《六祖坛经》就是劳动人民的。

《同班禅额尔德尼等的谈话》（一九五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209页

施耐庵《水浒传》

金圣叹把《水浒》砍掉了二十多回。砍掉了，不真实。鲁迅非常不满意金圣叹，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见《南腔北调集》）。

《关于〈水浒〉的评论》（一九七五年八月十四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第457页

《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13页

吴承恩《西游记》

“千日行善，善犹不足；一日行恶，恶常有余。”乡愿思想也。孙悟空的思想与此相反，他是不信这些的，即是说作者吴承恩不信这些。他的行善，即是除恶。他的除恶，即是行善。所谓“此言果然不差”，便是这样认识的。

《读〈绘图增像西游记〉批语》，《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74—75页

笑笑生《金瓶梅》

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这部书写了宋朝的真正社会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揭露了统治者和被压迫者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细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女性的。

《谈〈红楼梦〉》（一九五九年——一九七三年），《毛泽东文艺论集》第206—207页

《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

《谈〈红楼梦〉》（一九五九年——一九七三年），《毛泽东文艺论集》第207—208页

冯梦龙《东周列国志》

《东周列国志》值得读一下。这本书写了很多国内斗争和国外斗争的故事，讲了很多颠覆敌对国家的故事，这是当时社会的剧烈变化在上层建筑方面的反映。这本书写了当时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的尖锐的斗争，缺点是没有写当时的经济基础，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剧烈变化。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六）》（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东周列国志》基本上是正确的，按照《左传》编写的。写这本书的是民间一个作家。

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三日）

蒲松龄《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的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

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

表现作者的封建主义，然亦对农民有些同情。^①

《读〈聊斋志异〉批语》，《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81页

①批在《聊斋志异》中的《白莲教》开头的文字旁。

一篇好文章，反映了个性解放的强烈要求，人与人的关系应是民主的和平等的。^②

《读〈聊斋志异〉批语》，《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82—83页

②批在《聊斋志异》中《小谢》开头的文字旁。

曹雪芹《红楼梦》及《红楼梦》研究

《红楼梦》这部书，现在许多人鄙视它，不愿意提到它，其实《红楼梦》是一部很好的小说，特别是它有极丰富的社会史料。比如它描写柳湘莲痛打薛蟠以后便“牵马认镫去了”，没有实际经验是写不出“认镫”二字的。

《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123—124页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付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

《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毛泽东文集》第6卷第352页

《红楼梦》里有这样的话：“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在蓬窗上。”这段话说明了在封建社会里，社会关系的兴衰变化，家族的瓦解和崩溃。

《谈〈红楼梦〉》（一九五九年——一九七三年），《毛泽东文艺论集》第205页

《红楼梦》中就可以看出家长制度是在不断分裂中。贾琏是贾赦的儿子，不听贾赦的话。王夫人把凤姐笼络过去，可是凤姐想各种办法来积攒自己的私房。荣国府的最高家长是贾母，可是贾赦、贾政各人又有各人的打算。

《谈〈红楼梦〉》（一九五九年——一九七三年），《毛泽东文艺论集》第206页

《红楼梦》不仅要当作小说看，而且要当作历史看。他写的是很细致的、很精细的社会历史。他的书中写了几百人，有三四百人，其中只有三十三人是统治阶级，约占十分之一，其他都是被压迫的。牺牲的、死的很多，如鸳鸯、尤二姐、尤三姐、司棋、金钏、晴雯、秦可卿和她的一个丫环。秦可卿实际是自杀的，书上看不出来。贾宝玉对这些人都是同情的。你们看过《金瓶梅》没有？这部书写了宋朝的真正社会历史，暴露了封建统治，揭露了统治者和被压迫者的矛盾，也有一部分写得很细致。《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

《聊斋志异》是尊重女性的。

《谈〈红楼梦〉》（一九五九年——一九七三年），《毛泽东文艺论集》第206—207页

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的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还是封建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一群小说人物的社会背景。

《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01—302页

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红楼梦》就不同，写得有点希望么。

《谈〈红楼梦〉》（一九五九年——一九七三年），《毛泽东文艺论集》第207—208页

《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作历史读的。开头当故事读，后来当历史读。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第四回“葫芦僧乱判葫芦案”，讲护官符，提到四大家族：“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

如铁。”《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来有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有搞清楚，可见问题很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还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谈〈红楼梦〉》（一九五九年——一九七三年），《毛泽东文艺论集》第208—209页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还是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矛盾。曹雪芹的家是在雍正手里衰落的。

《关于人的认识问题》（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393页

许世友同志，你现在也看《红楼梦》了吗？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呢。他那是把真事隐去，用假语村言写出来，所以有两个人，一名叫甄士隐，一名叫贾雨村。真事不能讲，就是政治斗争。吊膀子这些是掩盖它的。第四回里边有一张“护官符”，那上面说：“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中国古代小说写得好的是这一部，最好的一部。创造了好多文学语言呢。

《谈〈红楼梦〉》（一九五九年——一九七三年），《毛泽东文艺论集》第209—210页

李宝嘉《官场现形记》

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

《谈〈红楼梦〉》（一九五九年——一九七三年），《毛泽东文艺论集》第207页

邹容《革命军》

四川有个邹容，他写了一本书，叫《革命军》，我临从北京来，还找这本书望了一下。他算是提出了一个民主革命的简单纲领。他只有十七岁到日本，写书的时候大概是十八九岁。二十岁时跟章太炎在上海一起坐班房，因病而死。

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鲁迅《阿Q正传》

大家知道，死去不久的鲁迅，在他的一篇小说上，描写了一个叫做阿Q的人，这个阿Q，在任何时候他都是胜利的，别人则都是失败的。让他们去说吧，横直世界上是不少阿Q这类人物的。

《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第490页

《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

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 Q 革命。其实，阿 Q 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我看在这点上，有些人很有点像假洋鬼子。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

《论十大关系》（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39—40 页

赫胥黎《天演论》

《天演论》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

《对姚文元关于最近学习情况等问题的批语》（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3 册第 193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一八四八年《共产党宣言》出版，只是马克思主义体系形成的开始，还不是马克思主义体系的完成。

《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一九五七年三月十日），《毛泽东文集》第 7 卷第 264 页

马克思《资本论》

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写成的，先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各部分，然后加以综合，得出资本主义运动的规律来。

《关于农村调查》(一九四一年九月十三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80页

写出一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现在说来,还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有英国这样一个资本主义发展成熟的典型,马克思才能写出《资本论》。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7页

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9页

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

列宁为了批判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后在俄国党内兴起的有神论(卢那察尔斯基、波格丹诺夫)而去系统地研究哲学史,写出了《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费了巨大的精力。

《关于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批语》(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二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270页

《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就是列宁批判马赫的,不容易读,然而必须读。此书反对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他们悲观失望。一九〇五年党涣散,列宁自己长期研究多少年,

才写出来的。因为理论基础不一致。

在庐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九年八月一日）

俄国一九〇五年革命失败之后，社会民主工党的大部分人悲观失望，出现了“造神派”，如卢那察尔斯基等人。这些人都是唯心主义者，列宁为了批判他们，写了一部哲学著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日本人民斗争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四日），

《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44页

列宁写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只讲清楚了唯物论，没有完全讲清楚认识论。

《关于人的认识问题》（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

第8卷第389页

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

斯大林在他的名著《论列宁主义基础》一书中说明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的时候，他分析了列宁主义所由产生的国际环境，分析了在帝国主义条件下已经发展到极点的资本主义的诸矛盾，以及这些矛盾使无产阶级革命成为直接实践的问题，并造成了直接冲击资本主义的良好的条件。不但如此，他又分析了为什么俄国成为列宁主义的策源地，分析了沙皇俄国当时是帝国主义一切矛盾的集合点以及俄国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国际的革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的原因。这样，斯大林分析了帝国主义的矛盾的普遍性，说明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又分析了沙俄帝国主义在这一般矛盾中所具有的特殊性，说明俄国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和策略的故乡，而在

这种特殊性中间就包含了矛盾的普遍性。斯大林的这种分析，给我们提供了认识矛盾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互相联结的模范。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1卷第318—319页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

斯大林主持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比较厚一点。这本书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又有历史，又有理论，它是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成功的历史，这本书要读。

《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50页

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应以《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为中心的材料。《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要读本》是一百年来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最高的综合和总结，是理论和实际结合的典型，在全世界还只有这一个完全的典型。我们看列宁、斯大林他们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苏联革命的具体实践互相结合又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就可以知道我们在中国是应该如何地工作了。

《改造我们的学习》（一九四一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3卷第802—803页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要再看一遍。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要研究一下，都要研究这本书的第

一章、第二章、第三章。过去看，不感兴趣，现在不同了。这三章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也有一些写得不妥当，再有一些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

第二章、第三章，讲商品和价值法则，你们有什么看法？我相当赞成其中的许多观点，把这些问题讲清楚很有必要。斯大林认为在苏联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在我们国家就不同，生产资料又是商品又不是商品，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我们把农业机械卖给合作社。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十日），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435页

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要好好读，要多读几遍。过去看这本书，不感兴趣，现在不同了。为了我们的事业，结合当前的实际问题，学习经济理论著作，比脱离实际专门读书，要好得多，容易懂。目前研究政治经济学问题，有很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省委常委、地委常委以上干部都要研究，花几个月时间，好好组织一下这个学习。

《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本书，我认为正确的方面是主要的，一、二、三章中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也有一些写得不妥当，再有一些恐怕他自己也没有搞清楚。不要轻易否定这本书。书要从头到尾读，要逐章逐节读，并且进行讨论。单看《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不看后边的几封信，有些问题不易了解。

《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记录》（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十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25—26页

斯大林说雅罗申柯的经济学，是没有经济问题的政治经济

学。这个批评是对的。但他自己的这本书，根本不谈政治，结果成为没有政治的政治经济学。他不谈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不谈上层建筑如何适应经济基础，不谈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是一个重大的缺点。

《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记录》（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十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66—67页

斯大林是第一个写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本书中讲的许多观点，对我们极为有用，愈读愈有兴趣。但是，他这本书，只谈经济关系，不谈政治挂帅，不讲群众运动。报纸上讲忘我劳动，其实每小时都没有忘我。在他的经济学里，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阴阴森森的。……他讲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好处是提出了问题，缺点是把框子划死了。

《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谈话记录》（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十日），《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上卷第69—70页

坚决退赔就是教育我们党，教育我们的干部。我看现在就是要拿六十条之类，加上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那本书，作为学习材料。斯大林的书是什么时候写出来的呢？他是从一九一七年起，经过三十五年，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写出来的。斯大林是在他们干了三十五年以后写成那本书的。我们还只干了十一年，现在如果由我们写那样的书，我就不相信能写好。现在不是到处在编教科书吗？我看编出来也用不得，还要用斯大林那本书。

《总结经验，教育干部》（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277页

罗森塔尔、尤金主编《简明哲学辞典》

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辞典里说：“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这就是说，这些根本对立的现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它们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

《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94页

建议读两本书。一本，哲学小辞典（第三版）。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两本都在半年读完。这里讲《哲学小辞典》一书的第三版。第一、二版，错误颇多，第三版，好得多了。照我看来，第三版也还有一些缺点和错误。不要紧，我们读时可加以分析和鉴别。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样，基本上是一本好书。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

《关于读两本书的建议》（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五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446页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

学习苏联，要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教科书有缺点，但比较完整。缺点如第一章讲和平过渡，通过议会夺取政权，哪有那回事？在西藏都不可能，一定要有武装。

《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七月二日），《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76页

教科书不承认现象和本质的矛盾。本质总是藏在现象的后面，只有通过现象才能揭露本质。教科书没有讲人们认识规律要有一个过程，先锋队也不例外。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5页

看来，这本书没有系统，还没有形成体系。这也是有客观原因的，因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身还没有成熟，还在发展中。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5页

世界上没有不能分析的事物，只是：一、情况不同；二、性质不同。许多基本范畴，特别是对立统一的法则，对各种事物都是适用的。这样来研究问题、看问题，就有了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这本教科书就没有运用这样一贯的、完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事物。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06—107页

这本书提到了国家，但没有加以研究，这是这本书的缺点之一。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1页

不能说这本书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也不能说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因为书中有许多观点是离开马克思主义的。特别是写法不好，不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出发，来研究

问题，不从历史的叙述和分析开始自然得出结论，而是从规律出发，进行演绎。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8页

这本书的另一个缺点，是先下定义，不讲道理。定义是分析的结果，不是分析的出发点。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但是，搞出了一本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总是一个大功劳，不管里面有多少问题。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9页

这本书的写法很不好，总是从概念入手。研究问题，要从人们看得见、摸得到的现象出发，来研究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从而揭露客观事物的本质的矛盾。《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分析，就是用这种方法，总是从现象出发，找出本质，然后又用本质解释现象，因此，能够提纲挈领。教科书对问题不是从分析入手，总是从规律、原则、定义出发，这是马克思主义从来反对的方法。原理、原则是结果，这是要进行分析，经过研究才能得出的。人的认识总是先接触现象，通过现象找出原理、原则来。而教科书与此相反，它所用的方法，不是分析法，而是演绎法。形式逻辑说，人都要死，张三是人，所以张三要死。这里，人都要死是大前提。教科书对每个问题总是先下定义，然后把这个定义作为大前提，来进行演绎，证明他们所要说的道理。他们不懂得，大前提也应当是研究的结果，必须经过具体分析，才能够证明是正确的。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9页

教科书的写法，不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没有说服力，没有吸引力，读起来没有兴趣，一看就可以知道是一些只写文章、没有实际经验的书生写的。这本书说的是书生的话，不是革命家的话。他们做实际工作的人没有概括能力，不善于运用概念、逻辑这一套东西；而做理论工作的人又没有实际经验，不懂得经济实践。两种人，两方面——理论和实践没有结合起来。同时作者们没有辩证法。

《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节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9—140页

教科书说到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说到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都没有提到对敌人的镇压，也没有提到阶级改造的问题，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三）》（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党的文献》1992年第5期

苏联教科书的整个结构是从所有制变革开始，这样一种写法，原则上是可以的。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一）》（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这本书虽然有些地方也承认矛盾，但不过是附带地提起。说明问题不从分析矛盾出发，是这本书的一个特点，一个最大的缺点。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一）》（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写书要有批评对象，就会有生气。这本书，没有展开对错

误观点的批判，所以看起来很沉闷。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一）》（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这本教科书有点像政治经济学辞典，总是先下定义，从规律出发来解释问题。可以说是一些词汇的解说，还不能算作一个科学著作。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一）》（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教科书只批评人家，对苏联发生了什么错误和缺点，却一句不讲。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一）》（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这本书看起来是书生的话，不像革命家的话。文章不讲逻辑，甚至形式逻辑也不讲，表明经济学家不懂经济实践，他们对经济问题不很内行。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一）》（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这本书有严重缺点，有原则错误，但是现在还不能说它完全错误，不能说它完全离开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一）》（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斯大林在世时定下的这本书的架子，就不太高明。他死后的修改本，内容上删掉了斯大林的一些好东西，增加了二十次代表大会

的不少坏东西，这是一个很大的退步，而书的架子没有什么大的变动。但是，出了本书总有好处，可以供我们发议论。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一）》（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是若干观点有严重错误，部分地又是严重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还不能说是完全地脱离了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是有严重错误的马克思主义的书。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一）》（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分工合作，集体写书，可以是一种方法。看起来，这本书是几个人分工写的，你写你的，我写我的，缺少统一，缺少集中。因此，同样的话反复多次讲。而且常常前后互相矛盾，自己跟自己打架，没有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体系。要写一本科学的书，最好的方法，是以一个人为主，带几个助手。

《毛泽东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选载（一）》（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九六〇年二月），《党的文献》1992年第1期

后 记

长期以来,广大读者特别是从事理论宣传和社会科学教学、研究工作的读者,希望有一部选摘毛泽东各方面的重要论述,比较全面、系统、准确地反映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和基本内容的工具书出版。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毛泽东选集》第二版、《毛泽东文集》和毛泽东其他重要著作集陆续出版,编辑这样一部书的条件更加成熟。我们从一九九八年开始编辑工作,经过五年时间,编成了这部大型理论工具书《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

本书由逢先知任主审,杨胜群、汪裕尧任主编,卢洁、张民、边彦军、刘芳莲任副主编。张积毅、赵福亭、唐洲雁、薛培松、李顺义、张秀娟、陶永祥、王朝祥、梁营、邵忠勇按分工任有关编的编辑。主编和副主编按分工承担或参加了有关编的编辑工作。

在编辑过程中,滕文生、金冲及、龚育之、侯树栋、李捷、冯蕙、刘武生、鲁振祥、张诚、陈晋等同志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的有关同志,参加了编辑提纲或部分书稿的审读工作,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本书编辑工作可能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